

炎黄春秋

9

1998

总第78期



两鬓染霜为国操劳的程思远石泓夫妇

程思远：我为李宗仁归来五上北京

冯玉祥将军遇难前后

巨星在“文革”序幕中殒落

同“两个凡是”论争的来龙去脉

张闻天忧国至死不渝

从康生制造“谋杀苏枚”冤案

引起的联想与思索

季羡林：“文革”教训应继续探讨

从井冈山走来的女中英才曾志

炎黄春秋

- 2 我为李宗仁归来五上北京 程思远
- 8 巨星在“文革”序幕中陨落 苏双碧 王宏志
- 16 冯玉祥将军遇难前后 李维民
- 20 从井冈山走来的女中英才曾志 陈干群
- 25 同“两个凡是”论争的来龙去脉 胡绩伟
- 34 张闻天忧国至死不渝 冯雅新
- 39 从康生制造“谋杀苏枚”冤案引起的
联想与思索 凌 云
- 46 “文革”教训应继续探讨 季羨林
- 51 一代师表季羨林 张 彦
- 55 翁文灏从秀才到博士 吴继路
- 57 热心振兴我国围棋的金明 郝克强
- 59 乌干达历险追记 徐明远
- 62 杨朔离去留冤魂 韩毓丽
- 66 白石弟子女篆刻家刘淑度 牛欣芳
- 68 挣扎奋斗不倒的白薇 白 岩
- 71 台静农与启功的笔墨情缘 罗会祥
- 74 龙骨坡“母女”出山记 徐自强
- 77 古人拒贿诗四首 陆茂清
- 78 关于《重读 1940 年延安一次大会的
名誉主席团名单》的两封信 王景山 曾彦修
- 79 《谢王炎午生祭文》系后人假托文天祥之作 耿艳鹏
- 79 关于“陈毅亡妻肖菊英之死”的作者答疑 陈干群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镔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陈 渊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法律顾问: 程振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 100007

电话: 64072452

64031144 转 2191 或 2004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M

出版日期: 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 4.80 元

我为李宗仁归来 五上北京

● 程思远

李宗仁思想转变的原因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就台湾问题阐明了中国的立场，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周总理郑重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李宗仁在美国报纸上看到周总理的声明，非常兴奋，他认为这个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他为此写信给我，嘱我同香港爱国人士交换意见。我与前中央大学教授，写过《福利宣言》而出名的罗梦册倾谈，准备了一些资料给他参考。1955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公开发表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

李宗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瞩目。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幸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乱出现中国。”他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一直采取“等尘埃落定”的政策。“试看今日中国，尘埃已经落定，室内红光耀目，焕然

一新。”而美国当局却视而不见，他呼吁美国当局，改变对华政策。

至于台湾，李宗仁认为，蒋介石“未能在大陆实行三民主义，今日在台湾已做到党政军清一色的局面，理应发挥理想，把台湾治成一三民主义的实验区”。但是蒋介石到台湾以来，“小朝廷内的一切作风似仍沿袭大陆时代的恶习”，“独裁作风且有甚于大陆时代”。

李宗仁说：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清末甲午战后，台湾割归日本五十年。然珍珠港变起，中国对日本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失效，按照国际公法，台湾遂复还于中国。1943年开罗会议，更经同盟国领袖正式承认，故台湾绝无独立的法律依据，任何中国人自皆不愿接受。”

李宗仁认为，台湾局势拖下去，可能引起世界严重的问题，对中国不利，对友邦（按：指美国）亦无益。鉴于此，李宗仁提出，今后解决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经过谈判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第二条，美国应正式声明它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它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自治州。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海峡地区非军事化。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能免除台湾海峡的战争危险。经过长期的和平，两个敌对政府间的彼此仇视就会逐渐消失，然后就能够为国家统一作出安排。”

对李宗仁的态度立场上的变化，中共中央注意到了，于是争取李宗仁回国的的工作便积极

开展。

1956年4月下旬，周恩来授意李济深：想法以你的名义告诉程思远，让他到北京来谈谈。

李济深按照周恩来的意思，当即给香港方面的朋友打长途电话，请转告程思远希望他到北京一谈。

我从香港首次晋京

1956年4月23日，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由我的一位广西老乡陪同到荔枝角九华新村来看我，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4月底我到北京，才知道此事不是李任公策动的，而是周总理决定的。

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后，连续几天受到李济深、蔡廷锴、黄绍竑的宴请。5月6日晚，我在张治中先生家里吃饭，他是我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当处长时的中央团部书记长，彼此共事多年。此外，他又是李宗仁代总统时的和谈代表团团长，所以对我特别照顾。临行时，他说：“明天下午3时，政协礼堂三楼有一个酒会。通常周恩来总理是不参加的；但是明天他要去那里同你会面。”

5月7日下午3时，刘仲容陪我到政协礼堂，他对我说：“周总理曾问过我：‘程思远怎样？你三言两语答复我。’我说：‘当年在白崇禧那里，我们有明确分工，他做右派工作，我做左派工作，但他并不妨碍我。’”

在酒会上，张治中要我同他在一起，不多时周恩来进来了，全场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周先生一面扬起左手打招呼，一面径直地走到我们面前。张文白正准备介绍，周公已同我握手，说：“程先生，欢迎你回来，我们1938年在武汉见过面。”

是的，我与周公在武汉见过面。那是1938年初，我在副总参谋总长办公室当秘书。一天，白崇禧要我去请周公对驻在蛇山玉冰堂的广西学生军讲话，这是仅有的一次。而今事隔18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这表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

周总理又问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说：“47岁了。”

总理说：“身体这样好哇！”

我说：“很好，我在海外常常游水。”

周总理再次问我：“你这次来有什么计划吗？”

我回答：“没有，我听候总理指示。”

周总理笑着说：“我希望你到各地多走走，多看看。比如东北，那是我们的工业基地，你可以去看看嘛！多看点地方，回到海外就多些材料讲嘛！”但立即改口说：“至少要看北京吧！”

我说：“我这次来得很匆忙，不准备到外地参观了，下次再去吧。”

周总理笑着点了点头，当场招呼刘斐、余心清、屈武他们，说：“你们这几天多花点时间，陪程思远到附近去看看，大家谈谈，谈谈祖国这几年的情况。过几天，我们再详细谈谈。”

5月11日晨，我接到通知，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请我吃饭。上午11时，我依照预先的安排，由中南海西北门入去，到右面一间平房拜望外交部副部长兼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他在抗战时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而我当



1963年程思远在香港浅水湾

时是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兼三民主义广西支团书记。在我主持的工作部门中,没有引起任何国共之间的摩擦,所以他很知道我的为人。深信我此次来京,他是起了影响作用的。

中午在李克农陪同下走进紫光阁,周恩来首先迎上来同我握手。在那里,一些过去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都赫然在座,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还有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群贤毕集,真一时之盛。

周恩来首先讲话,他说:“这一次程思远先生到北京,是建国以来我们同国民党人第三次会晤。第一次是叶帅(剑英)在广州与张公权接谈,我们保留他在中国银行的董事职位,希望他回到祖国来,结果他到澳洲后,一去不返了。第二次是我接见龙绳武,希望他到海外做些有益于祖国统一的工作,后来他去香港,却溜到台湾去了。这一次程先生到北京,我们很想藉此机会深入地谈谈。现在首先吃饭再说。”

周恩来在宴会上,高度评价李宗仁先生的对台建议。但有一点,他不赞成李先生主张台湾非军事化。周公说:“台湾重新归还祖国以后,还需要国民党的军队保卫嘛。”他对白崇禧批评说:“白健生颇自负,其实政治上急功近利,没有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信,因此被骗到台湾去了。”

午饭后,周总理在客厅里同我进行了三个小时的长谈,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国共两次合作谈到现在国家对国民党人的希望。他说:“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的国共合作。有人说,过去两次国共合作,结果凶终隙末,但是追源究始,责任不在我们。这是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的。”

周总理针对海外一些人士对祖国的错误看法,说:

“现在海外有很多人,对我们国家情况不

大了解。你告诉他们嘛,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经过多年的战斗打出来的江山。第一,我们是自己打出来的;第二,我们国家没有外国驻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民党当局同苏联签订了一个条约,把旅大让给苏联共同使用。1950年,我同毛主席到莫斯科,重新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把旅大收回来。我们这个国家,完全是一个独立的,领土完整的国家。国家统一,各民族的团结,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大好的局面。希望海外知识分子要充分了解这个情况,我们国家是大有可为的。”

后来,谈到李宗仁先生,周总理说:“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我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内心十分兴奋。尤其是周总理让我把他谈话精神转达给海



李宗仁(右)回国后,与程思远合影

外人士，并且邀请李宗仁先生在适当的时候回来看看，这是周总理给我的光荣任务。我当即表示愿为此而努力。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香港，便把周总理见面的经过写信告诉了李宗仁先生。他回信批评我，说我北京之行，事关重大，事先应当同他充分商量。事实上，我事先不能同他商量，因时间来不及，同时也考虑到，先去信告诉他，他不同意怎么办？岂不是进退两难，所以我只好做了再说。

二上北京

1956年，无疑是大陆自解放以后最好的年头之一。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如疾风骤雨的政治风暴以后，开始向海外招手，在中共“八大”中且确认阶级斗争已非主要矛盾，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前途充满光明和希望的一年。

可是曾几何时，风云突变；1957年的反右运动搞得太过火，把一些本来是正确的言论（如龙云先生批评苏联）作为右派言论，把一些党外知名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且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片面化、绝对化。从此“左”的指导思想开始抬头，党外人士不敢讲话了。我对劝请李宗仁回国一事只好暂时不提。

1958年末，我的长女林黛（原名程月如，在香港当电影演员）在取得两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头衔之后，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每周周末，她都到李家作客。李宗仁先生写信给我说：“一晤月如，如见亲人，一种思乡怀旧之情，顿时浮现心头，久久不能平息。”次年，林黛回到香港，缕述李先生生活情况，她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惯，所以总想回国。”李宗仁又来信说，他藏有许多书画，不忍将其流落异邦，拟献给祖国以寄故园之思。与此同时，他又托一个广西同乡，带信给李济深先生（后来知道经由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转），明示他有叶落归根之想。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海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回国参加庆祝活动，我也被邀参加。9月25日，代表团进入深圳时，《循环日报》社长林霭民告诉我，我的名字

是在代表团组成后由于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才临时加上的。庆祝活动结束后，我接到通知，先随代表团去东北参观，然后回京等候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那时由于时间上紧还没有来得及去看李济深，他已于10月6日因患脑瘤去世了。

10月25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我们，在座的有张治中、邵力子先生，国务院罗青长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童小鹏主任。我汇报了参观东北的观感。周总理说，你转来李德邻先生信，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周总理又说，德邻先生另有信给任潮先生，表示将回国定居。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因为当时李宗仁在美国被监视，周为他出主意，让他绕道欧洲，再回国。辞出时，总理约我明天同他一道去参观密云水库。

26日上午9时，乘总理的专列从北京站出发，总理座车中还有日本的松村谦三先生以及侨委廖承志主任。我们参观怀柔水库后，到密云时，总理在工地总指挥部亲自讲解了水库的设施与进行概况。是日，艳阳当空，疏云淡抹，碧波倒影，群山苍翠欲滴。总理于饱览风光之际，指着水面对我说：“9月16日，毛主席曾在这里游泳。”这一天我们完全不谈政治，显得非常轻松。

11月初，我回到香港，即将此行经过函告李宗仁先生。

后来，我把李宗仁存在美国的字画运到香港来，然后送到北京。这些古董有12箱，他说是他在北平当行辕主任时花11万美元购买的，要运回祖国。据童小鹏后来回忆，这批画经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仅值3000美元，大部分是假的。周总理说给他3万美元。当时童小鹏和罗青长感到已够大方了。但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后，毛主席说这叫做“投石问路”，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我们就给他12万美元。

不久，我得到周总理寄语，李先生献给国家的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我即函李先生，派他的夫人郭德

洁来香港领取这 12 万美元。

1960 年秋，李夫人郭德洁回到香港。事前我没有得到任何讯息，她到后才打电话给我，约我偕石泓于深夜到荃湾林园看她。林园是郭德洁建造给她母亲养老的一座平房。我俩到荃湾林园时，郭德洁已在大门等候。她说，她行前曾经写两封信给我。可是我一封也没有收到。

郭德洁以探亲为名在香港住了一个月。我们同郭德洁接触，总是在汽车上同她会晤，只有一次，在郊区一间饭店里同她吃过一次便饭。为了谈话方便，每次都是以游玩为名，由石泓开车，在约定的地方等她。我同郭德洁女士在飞奔的汽车里交谈，主要是商量李宗仁先生在欧洲会面的地点、日期，以及如何联系躲避美蒋特务盯梢等一系列问题。商定了会面地点在瑞士的苏黎世，那里是中立国，又是著名的风景游览区。李宗仁先生可以探亲、旅游名义前往，不致引人注目；我则以参观罗马古迹名义飞往罗马，然后转道瑞士，在约定的时间里同李宗仁先生见面。

之后，郭德洁飞回美国，把我们交谈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李宗仁先生；我等候李先生的答复，再向周总理汇报。

郭德洁返美不久，美国大选结果揭晓了。

1960 年的美国大选，肯尼迪以十万票的微弱多数战胜了尼克松入主白宫。李宗仁以为麦卡锡已经死了，国会援蒋集团的头目诺兰也不在了；在 60 年代进入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大多数是温和得多的维新派，如果肯尼迪要重新检查对华政策，是时候了。

当时与李宗仁时相过从的是哈佛大学教授张颜海。张早年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得哲学博士。回国后，曾任国民党政府驻葡萄牙、捷克大使。这时李宗仁接纳了张的建议，给肯尼迪一封信，一方面贺他就任总统，一方面促他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复了李宗仁一函，敷衍了事。李将肯尼迪复函寄给我并嘱我送呈周总理核阅。

1961 年 6 月上旬，我第三次来到北京，周总理接见我时，重申派我到欧洲去同李宗仁谈话，希望李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四上北京

1962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维护领土完整，对印度扩张主义者的挑衅进行了自卫反击。帝国主义颠倒黑白，借此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李宗仁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指出：自隋唐以来，中国政府即享有对西藏的宗主权。近百年来，英国人觊觎西藏，但从未对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提出任何异议。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为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组成的国家，藏族是中华民族主要成员之一，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李宗仁又说：“中印边界线几世纪以来都未划定，尼赫鲁先生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随后入侵中国边境了，为什么又拒绝与中国谈判划界？看来他在边界问题之外，还另有动机。第一，想利用边界问题解决印度内部困难。第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美国朝野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这样做对美国毫无裨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宜三思之。”

1963 年夏。李宗仁接见了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纵谈天下大势与中国问题，由张歆海担任翻译。7 月 14 日，《欧洲周报》发表了奥克斯托·玛赛丽的《李宗仁先生访问记》。文中引用了记者与李宗仁的一段谈话。

记者：“如果我可以引用一句古老的谚语，将军，那么我就要说，无风不起浪。你不会说蒋的神经过敏是无缘无故的。”

李：“完全不会。我已经对你说过，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任何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了骗，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

经过长期的商量，李宗仁决定依照周总理

的安排，到瑞士苏黎世同我会晤。我于1963年11月14日回到北京，向周总理请示。15日深夜，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我。他要我向李先生转达的意见，怕我忘记，要我一再复述，最重要的是“四可”：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第二、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第四、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此外总理还谈到李先生在政治上一些应当注意的问题。这次接见，谈到东方欲晓。临别之际，总理一直从紫光阁送我到阶下的汽车旁，殷殷嘱咐，令人感动。

圣诞节前一星期，我飞抵苏黎世，李宗仁先生在欧洲南部休养了一个时期，也到这里来了。我直接走到天堂广场 savoy 饭店找他，见面之顷，千言万语一时涌上心头，不知从何说起。他头秃了一些，两鬓皆白，但精神很好。午饭后，我们到圣彼德饭店前面的咖啡馆，在靠街走廊尽头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座位，彼此畅谈阔别后的情形。

李先生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者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我向他转达了周总理对他的问候和“四可”的意见，李先生听完后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我问：

“李夫人如何？”他说：“还没有同她谈过这个问题。她不同行，我就一个人先回去。”

12月23日，李先生和我同一天离开苏黎世。我回到香港，立即把同李先生会见的经过，写信报告了周总理，李先生回到纽约，下飞机时对亲友说：“好险，几乎赶不及回来过圣诞节！”

五上北京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离美飞欧。此行将是回国的第一程。我接到电报，即电石泓于15日到广州向北京报告。

16日，石泓回到香港，说周总理要我立即北京一行。

6月17日，我离开香港，18日到北京，被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见到统战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以及平杰三，冯铨，童小鹏。周荣鑫说：周恩来总理已于今晨飞往非洲访问，临行将有关李宗仁先生回国的安排事宜，由我们代为转告。这些安排是：

一、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我带往苏黎世面交；

二、同时发给我一笔旅费，请我把李先生接回来；

三、我到苏黎世时将有负责同志同我联系，帮助我解决有关问题。

次日我即离京南返。作赴欧迎李宗仁先生归来的准备。

(责任编辑 洛松)

1985年程思远率团访问美国夏威夷(二排居中戴花环者为程思远，其左戴花环者为程夫人石泓女士)



巨星殒落在“文革”序幕中

● 苏双碧 王宏志

邓拓是党的优秀领导者，杰出的人民新闻家。他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杂文、诗词为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邓拓又是著名的意识形态专家，在理论、历史、哲学等方面都有独到建树。是一位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终生的革命者。在十年动乱拉开序幕之时，邓拓出于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显然希望能够借助当时党中央一部分具有清醒头脑的领导者的支持，把由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而拉开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重新关上。为此，邓拓在彭真等同志的支持下，进行了巨大的努力，直到最后在大势无可挽回之时，用生命来作最后的抗争和维护人格的尊严。这颗文化学术界的巨星终于殒落在“文革”的序幕中。

邓拓不同意转载姚文元的 评《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最后一部分无限上纲，说吴晗是鼓吹“单干”的“优越性”，是搞“翻案风”，是“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并说，吴晗的《海瑞罢官》就是这

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断言《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

姚文元文章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天翔手头没有《文汇报》，让范瑾送来，这时已是下午五六点钟。郑天翔匆忙看过，就给范瑾打电话，让她第二天转载。理由有两条：一是此前北京市委已经布置过，说上面提出要批吴晗，咱们得批，别人批了，咱们转载也好；二是，当时是讲阶级的，这种事要阶级分析。郑天翔是分管工业的，用他的话说：“是搞具体事，是搞砖瓦灰沙石的，什么盖个工厂啦，弄个房子啦，修个马路啦，忙个不可开交。”一个正直的党的领导者，按常规办事，这样处理是很正常的。况且姚文元是一家之言，他的无限上纲在讨论中是不会有这么多人同意的。天翔同志说：“姚文元的文章后面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我很反感。”他让范瑾转载，并说“登了再说”。“再说”就是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可以讨论。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给范瑾打电话，范瑾说：“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

志再说。”彭真不在北京。邓拓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但不分管新闻，而郑天翔分管《北京日报》，而不分管意识形态。之所以这样分工，是因为邓拓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逐出了《人民日报》之后，市委不让邓拓过于为难，就把新闻这一块摘出来让郑天翔管。

邓拓不同意转载，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泽东提出来要批吴晗，彭真早就向市委打过招呼。但是，对于市委领导，包括彭真在内对批吴晗至少有这么三点心理障碍：一是吴晗为人正直，一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吴晗是明史专家、教授，但又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历史观上不免有许多旧的东西。因此，从学术的观点上批判吴晗可以，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不能接受；三是中央过去曾说过：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吴晗要保。现在公开点名，至少也应向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或中宣部报批，姚文元的文章没有迹象说明是经过批准的。尽管在1965年9月，即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前两个月，在有各大区同志参加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见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以后凡引此文称“大事记”）彭真说“有些问题”主要是指学术问题。其实，这次谈话，毛泽东不仅是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而且明确地告诉彭真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但没有说明性质。彭真当即向北京市委的几位书记作了传达。对姚文元无限上纲的文章，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中央的意思，更没有想到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市委的几位主要领导都知道毛主席曾经提倡海瑞精神，也就不认为吴晗有关海瑞的文章能有多大问题。对这件事，郑天翔同志作了生动的回忆：1965年冬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我和万里在出席会议期间，彭真对我说，毛主席要批吴晗，还让批《海瑞罢官》，你要准备准备，总之是一句话：毛主席要批判《海瑞罢官》，并让我转告万



邓拓同志

里。《海瑞罢官》剧本我没有看过，戏我也没看过。我赶紧找宣传部的张大中，让他找了两本，一本给万里。我很忙，硬着头皮看，但看不出问题。在一次会上，要我谈谈对《海瑞罢官》的意见，我说看不出问题，确实看不出所以然。后来这成了我的罪状，说‘毛主席要批《海瑞罢官》，你说没有问题，这不是包庇吴晗吗？’”其实，不只郑天翔、万里，刘仁也是一样，他们都不以为《海瑞罢官》有什么重大政治问题。所以，北京市委对姚文元文章的抵制，在开初只是一种意念，是无形的，即无计划、无组织的抵制多于有思想准备的抵制。但邓拓、彭真则有所不同，邓拓是管意识形态的，他对这场批判运动应当怎样搞才是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当有更多的考虑。

邓拓不赞成转载姚文，并不等于他不赞成批吴晗。因为批吴晗是毛主席定的，他只有认真去执行。而当时姚文元的文章发自上海的《文汇报》，况且姚文元是一根棍子，贯于写批判文章，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这篇文章是毛主席让发的。他同样只能按常规办事，即各批

各的。就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即11月13日,邓拓召集市委宣传部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开会决定:一是摸摸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的由来,有什么背景。这一条因上海方面严密封锁而一无所获;二是决定批判吴晗的历史观。即由邓拓写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由李琪写批判吴晗的历史观。三是请示在外地的彭真同志,彭真明确表示暂不转载。邓拓不同意批吴晗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如果按这个思路去走,被姚文元文章拉开的“文革”的序幕,便可以悄悄地关上。

邓拓披甲上阵

邓拓凭着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凭着他对党、对人民事业的耿耿忠心,他抱着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想扭转局面。但他所能做的,只是摆事实、讲道理,只是相信老上司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彭真回到北京后,形势所然,北京对批判吴晗不得不有所动作。但他认为中央报刊是否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还要考虑一下再说,并再一次申明: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至于《北京日报》是否转载,市委书记处讨论后认为:一、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第四部分从政治上批判吴晗的观点;二、如果必须转载此文,则应在“编者按”中表明自己的态度。11月28日,由于周恩来的建议,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会议,讨论转载姚文元文章事。会上,彭真问邓拓:“吴晗现在怎样?”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11月29日,《北京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是由邓拓、范瑾修改审定,并由彭真亲自定稿的。按语强调提倡毛泽东倡导的“百家争鸣”,并说:“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明显地抵制了姚文元对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诬陷。但既然转载,北京市委就得参与这个“争论”,彭真和邓拓都得

站出来,指挥并影响这场争论。

按照彭真的意见,由邓拓来主持这个“争论”。邓拓当时做了两件事:一是和范瑾一起抓《北京日报》有关《海瑞罢官》的讨论。并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北京师院以及北京市历史学会抽调七八个人,成立一个讨论《海瑞罢官》的写作组,办公地点设在《北京日报》四楼。邓拓亲自担任组长,范瑾负责具体联系和领导工作。二是赶写批评吴晗“道德继承论”的文章,认认真真地准备从学术上和吴晗讨论。

12月3日,邓拓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了写作组全体成员会议,范瑾和《北京日报》几位同志出席了会议。当时我是写作组成员之一,据我的记忆,邓拓一开始就说:“《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想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结论,可以讨论。姚文元文章的引文和结论多有歪曲吴晗的原意之处。当然,吴晗这几年写的文章,也有可讨论之处。把你们找来,可以研究些问题,写些文章。要提倡好的学风,摆事实、讲道理。学术问题要采取商榷的态度,不要扣帽子。有什么看法就写什么。”并说:“我们不采取出题目做文章的办法。因此,不研究选题,也不集体写文章,以个人的名义写好。”邓拓还一再强调“要在学术讨论中提倡好的风气。《海瑞罢官》的讨论还是当作学术探讨为好”。邓拓的讲话和吴冷西当天给首都新闻单位传达彭真意见是一致的。彭真说:“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学术问题,一是政治问题,两个问题都可以讨论,估计政治问题的讨论不可能发表太多文章,主要放在学术问题讨论。通过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贯彻‘二百’方针的空气,要贯彻自由讨论的方针。在讨论中,批评吴晗的文章可以发,批评姚文元的也可以发。”邓拓和彭真都把《海瑞罢官》的讨论当成正常的学术讨论,希望通过这场讨论繁荣祖国的文化与学术,借以扭转和纠正由姚文元开创的以势压人、扣政治大帽子的恶劣学风。至于有人说邓拓关于吴晗问题的学术性质的说法是为了包

庇吴晗、掩盖吴晗的政治问题，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邓拓是讲究实事求是的。他确实认为吴晗有些观点是可以讨论的。关于在“道德继承论”的问题上，邓拓就不同意吴晗的观点。至于姚文元说吴晗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邓拓没有发现过，他当然不能轻信姚文元的诬陷。所以谈不上是有意替吴晗“掩盖”政治问题。这一点，邓拓如此，彭真也是如此。直到12月21日，毛泽东在和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谈话时，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并说：“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明白无误地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挂上钩。彭真听了还非常坦然地告诉毛泽东：“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说明有人把吴晗和彭德怀挂上钩完全是一种政治需要。不论是彭真还是邓拓，都不是有意要包庇吴晗的“政治问题”，而是认为吴晗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

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之争，包含着有关祖国前途和命运的一场争论，在当时绝大多数善良的人们并不太清楚。至于后来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此严重的性质，更不可能认识到。但对姚文元任意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则很少有人敢于苟同，甚至非常厌恶。所以，彭真断言“政治问题的讨论不可能发表太多文章。”范瑾在一次会议上也说：他们（指姚文元等人）从政治上批判吴晗，我们有我们的做法。”即主要谈学术，但“不可避免涉及政治”。邓拓和北京市委其他领导，当时态度是鲜明的，《海瑞罢官》的讨论主要应是学术问题，而不应是政治问题。

为争取更多的人来参加《北京日报》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北京日报》召开一次北京文科大学生座谈会，邓拓要求这些青年学生解放思想，下决心练练笔。邓拓说：“我们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指示，按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参加讨论。”那么，毛主席的指示是什么呢？在有关学术问题的讨论时，当然是指“百

家争鸣”的方针。作为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姚文元颠倒黑白对吴晗的指控竟是出自毛主席的本意。在邓拓看来，他心目中的巨人是绝对不会同意姚文元对吴晗进行诬陷的。所以，在会上，他对这些青年谆谆善诱，他说：“姚文元的观点不一定都对，难道没有一点错误，或不确切的地方？都对的话那就做结论了，还讨论干什么？吴晗同志的观点有许多根本性的错误，但是否就一无是处？是不是一棒子打死？根据吴晗的表现，还不能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真的，不是唬弄大家。”根据他对吴晗的了解，市委对吴晗的调查，他向青年学生交了底，表现出一位党的领导者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他要求青年学生参加这场讨论，他说：“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你的观点是否与姚文元不同，不要怕和吴晗有共同点。不要扣帽子，要摆事实讲道理，力求创造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气，改变过去讨论中的紧张气氛，要养成畅所欲言的习惯。”邓拓抱着一种善良的愿望，希望青年树立一种平心静气进行学术讨论的良好学风。但这些后来都被指控为“毒害拉拢青年的铁证”，并在他去世的前四天，即5月14日报纸公布这些谈话，对他进行讨伐。问题是，三十多年过去，即使完全抛开吴晗、姚文元的是非，邓拓的讲话仍然是无可挑剔的，仍然在闪烁着对祖国学术文化高度负责的思想光辉。他是一位学者，也是一名战士，他当然知道这场斗争的复杂性，据《前线》编辑部的同志回忆，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后，邓拓就说过：“听人说，《海瑞罢官》和彭德怀有关，不知是怎么回事。”虽然“不知是怎么回事”，但问题的复杂性，事关重大，邓拓却是不可能不想到的。即使这样，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正义和真理，邓拓还是站了出来，站在“有来头”的姚文元之流的对立面上，指挥这场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有关《海瑞罢官》的讨论。

关于“向阳生”的文章

彭真、邓拓既然认为《海瑞罢官》的讨论

是学术问题。邓拓除组成一个写作小组,写一些参加《海瑞罢官》讨论的文章外,还必须有几篇有份量的,即作者和文章内容都有份量的学术批判文章。邓拓之所以选择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批判,当然也不是偶然的。吴晗先后在1962年5月至1963年8月在《前线》杂志和《光明日报》发表了《说道德》、《再说道德》、《三说道德》等三篇文章,中心意思是说:“道德是阶级的道德,道德是随着阶级统治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是,也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批判地吸取其中某些部分。”他指出那些“以为古人一无足取,没有值得批判继承的东西,看来也是不正确的。”吴晗的“道德继承论”发表后,当时在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吴晗居然主张封建、资产阶级道德可以批判继承,这还了得。许多论者认为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能够继承的道德也只有到“劳动人民”中去寻找。批判几乎是一边倒。其实吴晗除了论述不够周密外,立论却基本上是正确的。

1964年,由康生之流发动的对“合二而一”的批判、对李秀成的批判,对“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电影《北国江南》等等的批判,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要不要拿出来公开批判,北京市委压力很大。是年8月间,在北戴河开了一次有彭真、刘仁、邓拓等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了吴晗的“道德继承论”并特地把吴晗请到北戴河,让他就这个问题作检讨,并写出检讨文章。由于吴晗的“道德论”有两篇发表在《前线》杂志,市委对此要承担责任。会上决定由邓拓通知《前线》编辑部李筠,要他在两天之内写出一篇对吴晗“道德继承论”的批判文章。两天之后,李筠写成文章初稿,标题是《是革命,还是继承?》,并派专车送到北戴河。邓拓为这篇文章写了按语,正式作了自我批评,其中特别说到“三家村”专栏的名称是随便起的,发表了两篇“说道德”,编辑部有责任。邓拓把文章连同按语退回编辑部,发不发表,让李筠等电话。邓拓还为这篇文章署上“金世伟”的笔名,“金世伟”

的谐音是“京市委”,即以“北京市委”的名义批判“道德继承论”。可见,当时邓拓处境已很难,如果公开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就必然要涉及《前线》编辑部,作为主编的邓拓就只好开脱。后来中央说不公开批判为好,作内部处理,“金世伟”的文章也就没有发出来。吴晗为此作了三次检讨,才通过,并写成一篇《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后来吴晗曾经说:“关于道德讨论的检查最难了,总是想不通。”检查是迫于形势,思想上并没有想通。不过,当时上面不作公开批判,对吴晗是出于保护,还是怕“打草惊蛇”,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如果在1964年就公开批判吴晗的道德论,吴晗也就不会在一年后被当作“文革”开刀祭旗的对象了。而彭真、邓拓因主动批评了吴晗的道德论,并在按语中主动作了检讨,“文革”初期也就不会被说成包庇吴晗而受到挞伐了。

邓拓从学术观点上批判吴晗,选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这样一个题目,是有其特殊用意的:其一,道德能不能继承确实是个学术问题,或者是个认识问题,不好上升为政治问题;其二,邓拓确实认为剥削阶级的道德不能继承,尽管他的观点未必正确,但他从道德论来批评吴晗却是善意的,是真心的,并非违心作假;其三,上面在1964年就曾经有过考虑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在正常情况下,容易和中央保持一致。因此,邓拓撰写此文时是认真的、说理的。邓拓认为《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继承论”。理由是“吴晗同志企图通过他所加工塑造的舞台上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尽力宣扬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一整套的封建的道德,要今天的人们去学习、去提倡。”并通过剧中人物极力宣扬“一整套封建道德观念”。认为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是吴晗许多文章的中心思想,当然也是他创作《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邓拓对吴晗的批评不论是写作动机还是对问题的提出都是严肃的。邓拓在文章的开头,特地写了这样一段说明:“我看过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之后,重新翻阅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吴晗同

志 1960 年 11 月 13 日七稿、1961 年 8 月 8 日改定剧本，同时参看了从 1959 年到 1962 年这个期间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晚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所刊登的有关海瑞的其他文章和几种剧本，加以比较，反复探索”，才得出《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继承论”的结论的。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说法的。那么《解放日报》、《文汇报》不是也登过许多有关海瑞的文章吗？这又算什么呢？

这篇署名向阳生的文章发表后，邓拓大约是希望这个论点能得到呼应，也减轻吴晗一点压力，他提出“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同大家见面。”同时，又让《前线》编辑部的同志去找吴晗，让他把在 1964 年写成的《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拿出来发表，全文只改了一句话，即“金世伟的文章发表后”改成“向阳生的文章发表后”。应该说，吴晗不论是有关《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还是有关“道德继承论”的自我批评，态度都是好的、认真的。如不抱偏见，读者都会欢迎的。而向阳生的文章，如果作为正常的一篇学术文章，也确实可以起到争鸣的作用。但当时一股不可阻挡的势力已经把吴晗、邓拓推到绝对的被告席上了。他们的文章被禁止转载，被说成是假检讨真进攻。邓拓对吴晗的招呼表现出邓拓的真诚和善意，他是以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来看待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就在 12 月 12 日当天，即向阳生文章发表的当天，康生的“大事记”写上这么一段话：“《北京日报》、《前线》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这篇文章是在彭真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亲自修改，经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这个记事从政治上否定了邓拓的文章，又把邓拓和彭真、市委书记处都拉在同一政治态度上，可谓一箭三雕。其实在既定方针是要以批吴晗为突破口把矛头指向“三家村”和彭真

的，在这种情况下，邓拓再作多大的努力，写出再有说服力的文章也是无济于事的，而吴晗同样是不必作任何检讨的，不检讨恐怕比检讨还好些，省得给人以口实。

最后的岁月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发表，即 1965 年 11 月 10 日到 1966 年 1 月 5 日邓拓被停止工作进行检查，通共只有 55 天。在一个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姚文元的文章作为序幕拉开，序幕也就是准备阶段，这个阶段长达 6 个月零 6 天，邓拓的抗争只是在这 6 个多月中的 55 天。时间虽然短暂，但邓拓的所作所为，不管主观意识如何，都是起到力图把制造十年动乱的序幕关上，不希望朝着疯狂的、无原则的政治批判方向发展。在这段时间，他发表过演说，组织过写作组写学术批判文章，亲自出马写了“向阳生”的文章。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一步一步被人把矛盾推向激化，都被当作加罪于邓拓、彭真的口实。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表上。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穆欣同志，他在近作《十年长忆》一书中写道：“从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开始，进一步以邓拓为突破口，锋芒直指彭真。江青当时就兴高采烈地说：‘一个吴晗挖出，后面就是一大堆啊！’”张春桥讲得更露骨，他在 1966 年 11 月 24 日一次讲话中说：“因为批《海瑞罢官》，就要带到吴晗，提出吴晗，就要提到邓拓，把邓拓提出来，‘三家村’就揭出来了。”可见，提出吴晗和提出邓拓几乎是同时的。在我的记忆中，邓拓主持写作组时间很短，通共只主持过两次会。但写作组的文章他是都要看的，并由他签署意见。记得有一天我来到他家里取样稿，有一篇是我写的，题为《吴晗强迫

海瑞站在农民一边》，另一篇是别的同志写的杂文，其中谈到吴晗写《海瑞骂皇帝》的“险恶用心”。邓拓对前一篇文章签了“可以用”三个字，后一篇文章他很犹豫，神情很严肃，自然他不相信吴晗会“骂皇帝”。最后他写了让编辑酌定的意见。此后不久，他和写作组就没有什么联系了。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下午临下班前，李琪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立即到宣传部找他。十分钟后，我从北京日报赶到市委宣传部。李琪让我坐下，神情很不好，过了一会才说：“上面决定要批邓拓，老邓这几年写了不少东西，我们先准备一下，看看他的作品。从明天起你就不用到北京日报了。”善良的李琪还以为上面仅仅是要批邓拓呢？他说：“老邓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日子就好过些了。”他哪里知道连同彭真、连同他自己都早已被牵涉其中了。由李琪、范瑾、张文松主持的批邓拓写作组，一共四五个人。每人抱着一本《燕山夜话》、一本《三家村札记》，翻来复去地看，谁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要害”问题来。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小组几乎没有什么作为，至少我是连一篇短文都没有写出来。

邓拓是一位坚持原则，讲求实事求是的人。让他检查自己的错误，其实，他写了那么多杂文，涉及历史题材的不少，本来都是宣传历史的光明面，他自然不能接受对他不怀好意的政治指控。1月5日之后，大约在1月底，由《前线》、北京日报、晚报等单位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让邓拓检查。邓拓只检查了他写文章“厚古薄今”，无非是说写古代的题材多，用古代的材料多。这只是一种学风，而且不能说是坏的学风，事实上《燕山夜话》许多文章“古为今用”都很得体。事后，大约在4月初市委又组织一次会对邓拓的批评，刘仁、郑天翔、李琪、范瑾、宋硕等都出席了会议。邓拓仍然没有违心地检查出什么政治性的问题来，而参加会议的也只是说他写了那么多文章，“到底举的是什么旗，是灰旗，还是白旗。”作为北京市委，他们不得不有这些举动，但说实话，他们也不知道上面为什么要批邓拓，邓拓有什么问题，所以也提不出什么“要害”的意见

来，况且刘仁、郑天翔在发言中还肯定了邓拓的政治立场。

然而，这个批判的基调和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批判是不一致的。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并把它和彭德怀挂上钩，这当然也包含着对12月12日向阳生文章的批评，是对邓拓认为《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继承论”的反驳。随后，上海的罗思鼎，以及北京关锋、戚本禹等一起出动，狠批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并说“骂皇帝”是吴晗研究海瑞的“一味极其重要的药方”。上政治纲上到这个份上，吴晗确实是罪责难逃了，而把这种严重问题说成是学术问题，是“道德继承论”的邓拓，当然也难逃对吴晗政治上的包庇责任。1966年3月28日到3月30日，毛泽东“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北京市委包庇坏人，所指当然是明确的，当时被揭出来主要是吴晗，还有邓拓、廖沫沙。所有这些，对邓拓的处境当然是更为艰难了。

在毛泽东严厉地批评北京市委之后，彭真在4月3日召开了市委常委会，在传达毛泽东的上述批评之后，还谈到“邓拓政治上是拥护总路线的”，并说“邓拓已在1月5日开始检讨”。我很赞成一位当时处在旋涡中的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写了这么一段话：“那时候，江青一伙的锋芒正对准邓拓，意在以邓拓为突破口冲击彭真。毛泽东在谈话中也点了邓拓的名。彭真毕竟是久经风霜的政治家，面对十二级台风的侵蚀，依然沉着冷静。邓拓闻讯找他询问时，彭真曾劝慰邓拓说：‘事情并没有最后下结论。我还要再向毛主席解释，希望他能调查研究，改变他的看法。’这里，彭真仍然把邓拓列入左派，对他在思想上严厉批评，意在使他免受政治伤害，极力给予保护。”但是，此后6天，即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便奉命召开会议，由康生传达毛泽东3月28日到3月30日的三次谈话，并由康生、陈伯达等在会上对彭真进行批判，他们说“党的最大威胁来自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来自

邓拓、吴晗、廖沫沙一类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彭真在检讨中，表示拥护毛主席对他的批判。他申明：“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也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并说，关于《二月提纲》“我只是想突出一下毛主席多年来强调的‘放’的方针，让大家多了解各方面的意见，不存在着反党问题。”表现出彭真的高度原则性和实事求是的大无畏精神。

形势所逼，彭真只好同意在4月16日公开发表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的文章和按语以及有关材料。声势很大，《北京日报》整整用了三个版。彭真此举当然是想让市委争取主动，但实际上此时他已经被揭发批判，北京市委被拟议中要解散。因此彭真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当天，康生、江青就认为《前线》《北京日报》旨在包庇邓拓，是假批判真包庇，并立即通知各报不能转载。但是，不管怎样报上公开点名批判邓拓却是第一次。彭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天他给邓拓打电话，要他正确对待，不要过于紧张，还让他“保重身体、注意健康”。刘仁也特地派人去看他、安慰他。

邓拓处在被批判、被挞伐的地位，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抗争，他当然是清楚的。但促使他走完最后的人生之路，主要并不仅是他被批判的处境，而应是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其一，彭真的被批判，并打入彭、罗、陆、杨的反党集团之中，他从感情上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不仅是因为彭真是他的领导和知己，彭真在关于《海瑞罢官》讨论中的一系列主张是以党、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都是正确的。彭真的被打倒，说明这场讨论的正确主张已被扼杀；其二，士可杀，不可辱，在邓拓思想中有相当地位。优秀传统文化铸成了他的刚正气节，使他接受不了康生、江青等这股恶势力，任意践踏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行为。5月8日《解放军报》高炬的文章诬蔑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说他以《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为阵地“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同一天《光明日报》何明的文章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随后，于5月8日、5月10日、5月14

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诬陷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并且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地声称：“邓拓是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邓拓当然知道这种诬陷是欲把他置于死地，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才这样说的。邓拓当然也知道，姚文元、戚本禹等这股恶势力在当时是无法抗拒的。其三，上引“大事记”4月10日到15日条称：“彭真同志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指五·一六通知——引者）草稿交北京市委的同志传阅。”据《前线》编辑部的同志回忆，也说“五·一六通知的草稿，在市委常委传阅过。”邓拓是否看过这个《通知》，现在不得而知，但既然在市委常委传阅过，邓拓就有可能知道《通知》的内容。特别是这个《通知》在16日通过之前毛主席加进去许多性质十分严重的内容，指明这次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通知》并且点了彭真的名，“五·一六通知”中央正式通过，这种压力，邓拓是很难承受得了的。

鉴于上述，邓拓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以死来作最后的抗争。之前，邓拓给“彭真、刘仁和市委同志们”写了一封长信，此时彭真早已被批判，并在5月16日这一天失去了自由。邓拓临死之前给彭真等人写信，表明了他对彭真和市委的信赖。同时申明自己绝不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的人。并坦然地相信那些构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的杂文，到底是“什么性质”，“一定会搞清楚的”。信的最后他诚挚地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这不仅是表示他对革命事业的一种理想和信念。同时也如同彭真在1966年4月9~12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申明的：“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也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这是彭真的本意，也是邓拓的本意。

（责任编辑 杜 晋）

冯玉祥将军 遇难前后

● 李维民

1956年9月，我作为解放军报社记者，在停泊青岛的鞍山舰采访期间，与当时任副舰长的冯洪达同志相识。他是冯玉祥将军的儿子，1948年随冯将军一道乘船返国。他曾向我说过冯将军在海上遇难的经过。1981年我再次去青岛时，洪达到宾馆看我。后来他送给我一本他与夫人余华心合著的《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一书，这本书详细记载了冯将军的最后岁月。今年9月1日，是冯将军遇难50周年。这使我想起前几年不幸去世的洪达，想起冯玉祥将军。当年与冯将军一同返国的共八人：冯将军和夫人李德全、秘书赖亚力，女儿理达、颖达、晓达，儿子洪达和女婿罗元铮。如今八人已有六人作古，只有冯理达和罗元铮夫妇健在。不久前，我去海军医院访问冯理达同志，她又说起冯将军抗战胜利后被迫出国和回国遇难的经过。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将军从重庆回到南京。这时，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大搞白色恐怖，积极准备内战，久受蒋介石迫害的冯玉祥，深感在国内很难再呆下去，便借蒋曾要他治理黄河的话，提出赴美“考察水利”。蒋介石给他一个水利特使的头衔，同时指使国防部给他办了退伍手续。1946年9月，冯玉祥一行离开上海赴美。

冯将军离开上海之前，在《大公报》上发表致蒋介石的公开信，劝蒋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冯将军抵美后，国内战争愈演愈烈，蒋介石

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更加变本加厉，并派特务跟踪监视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冯将军不屈从压力，接连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演说，发表声明，表明他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坚定立场。他在一批旅美进步青年拥戴下，1947年10月在纽约成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被公推为主席。他致函美国总统、国务卿和美国国会，反对美国援蒋打内战，并到美国各地发表演讲，争取美国人民的支持。1947年11月15日，冯将军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了《我为什么与蒋决裂》的檄文。蒋介石老羞成怒，命令冯玉祥于1947年12月底回国，接着又以“冯玉祥在美国肆意诋毁元首”之罪名，撤掉冯的水利特使职务，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1948年1月7日，蒋介石复以“违反党纪，不听党的约束”的罪名，将冯玉祥开除出国民党。1月14日，冯将军在美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声明“必须像对待清朝、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一样，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以便在中国能最终实现和平与民主”。2月5日，冯将军又发表了他致蒋介石的最后一封公开信，在揭露蒋的种种罪行后，要蒋“下野，立刻离开中国，把所有的交还人民”。他还坦率地指出：“现在我已感到支持你的罪过，而要向中国人民负起责任，协助他们把你赶走”，“从现在起，我将攻击和反对你到底”。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李济深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冯玉

祥任政治委员会主席，并负责驻美国分会筹备工作。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揭露蒋介石的罪行，他在夫人李德全协助下，夜以继日地赶写出《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在海外一版再版，引起很大反响。冯玉祥被剥夺官职后，成了没有身份、没有护照的“非法”旅人。

他在公开讲坛上发表演说受到美国政府限制，他的文章在美国报纸上也不容易发表了。为了揭露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罪行，抨击美国政府援蒋内战的立场，争取美国人民的支持，冯玉祥干脆走上街头，向群众演讲。有一次他还与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史沫特莱等朋友一起在街头演讲，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使企图干涉的警察也无法阻止。

在蒋介石集团日暮途穷、分崩离析的时候，美国政府阴谋纠集中国的第三种势力，另组一个代表美国利益的中国政府，并把冯玉祥作为收买笼络的一个对象。美国官员还亲至冯的住处游说，被冯断然拒绝。杜鲁门政府对冯玉祥用软的不成，又来硬的。移民局官员找到冯的住处，要检查他的护照（其实美国政府早已知道，冯已没有护照了），接着移民局又通知冯玉祥的几个在美读书的子女，说他们的护照即将期满，不准继续留在美国。这意味着冯玉祥将被驱逐出美国。这时，国内的解放战争正在迅猛发展，冯玉祥感到没有必要继续留在美国，毅然决定返回祖国。

李济深曾告诉冯玉祥，如果冯在美国呆不下去，就到香港去。但是，冯玉祥感到那时香港是国民党特务最集中的地方，安全没有保障。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携全家途经苏联回国。有一天，冯玉祥和李德全坐着女儿理达开的汽车，秘密到苏联驻美大使馆，提出途经苏联回国的打算。之后，李德全又几次去苏联使馆，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亲自接见了她。抗战时期，潘友新曾任苏联驻中国大使，常驻重庆，是冯玉祥的老朋友。不久，苏联使馆通知冯玉祥，欢迎他们全家去苏联，并设法为他们办理护照。



冯玉祥将军在美国街头演讲

冯玉祥离美前夕，于1948年7月30日和31日，分别发表了《告留美侨胞书》和《告别美国人士书》，他公开宣布：“这次回国是为了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31日，冯玉祥一行八人登上由苏联驶抵美国的“胜利号”。这艘排水9000吨的豪华客轮，是苏联从希特勒德国手中缴获的。船上宽敞舒适，富丽堂皇，在欧洲客轮中可算首屈一指。冯玉祥至死都不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他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特地拨专款租用这艘客轮的。李德全也是在1958年加入共产党后才听说此事的。

这艘客轮共分四层，头等舱在顶层。冯玉祥一行八人住了四间，在走廊两面，并排相对。冯玉祥夫妇住一间，隔壁是罗无铮和冯理达夫妇。冯玉祥对门是女儿颖达和晓达，隔壁是赖亚力和冯洪达。在顶层的头等舱中还住着四位苏共中央委员。其他三层客舱里住着四百多名苏联公民，其中有许多是苏联驻美外交人员的子女。

头等舱的外面是宽阔的甲板，冯玉祥有时在舱房里看书、作诗、写信，有时到甲板上漫步，观看时而波涛汹涌、时而风平浪静的大海。他走上回国的归途，如释重负，心情无比

舒畅。船上饮食丰盛,娱乐活动丰富多采,晚上还放电影或举行音乐会、舞会,冯玉祥与家人一起,生活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8月10日,胜利号越过大西洋进入直布罗陀海峡,17日抵达埃及北岸的亚历山大港。船靠码头后,冯玉祥发现紧靠胜利号停泊着一艘国民党的军舰。他分外警惕,足不出舱。李德全和冯理达在18日上午到亚历山大邮局,将冯玉祥在船上写给李济深的信和一首题为《小燕》的诗寄往香港。这是后来得以保存下来的冯将军的最后遗作。胜利号在亚历山大港停泊了6天,其间有三千余名被埃及政府驱赶回国的苏联亚美尼亚人,登上胜利号返国。他们为返国兴高采烈,有时竟举起火把在船上欢歌狂舞,冯玉祥看到此情此景,很担心会失火,但船方却不加禁止。船到苏联黑海东岸的高加索海口巴统后,3000乘客离船而去。巴统地方官员邀请冯玉祥登岸参观。他们还曾建议冯将军改乘火车去敖德萨,但大家都认为只剩两天的海程就可到达敖德萨,便没有改乘火车。事后家人追悔莫及,因为如果改乘火车,或可免于海上罹难。

胜利号在巴统停靠了一周左右,重又启航横渡黑海,驶向敖德萨。8月31日,船上从无线电中得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去世,9月1日中午,在船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船长对大家说,经过一个月长途旅行,明天就到达目的地敖德萨了,他建议大家午饭后各自回舱收拾东西,好好休息一下,准备明天下船,这天午饭后,船上的苏联儿童不像往常那样欢蹦乱跳,都各自回船舱去了。各游艺室的门也都锁上了,船上异常安静。颖达、晓达跟着进了父母的舱室,李德全开始收拾东西,冯将军半倚在床上,给两个女儿讲述他1926年访问苏联的情景。正说着,晓达忽然闻到一股气味,四下一看,发现从没有关严的门缝里涌进一股烟。“着火了!”她惊呼着从屋里往外跑,颖达随着也朝外跑,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她忽然想起应当通知理达,于是急往回跑。冯玉祥在两个女儿之后也出了房间,奔向过道。李德全抓起

丈夫的大衣,紧跟在后面。这时,过道里已是烟雾腾腾,一片漆黑,充满一氧化碳的热浪。李德全隐约听见丈夫的呻吟声,但她已被浓烟呛得头昏眼花说不出话,无力再往前走,又踉踉跄跄地回到房间,跌倒在沙发上。

与此同时,躺在床上休息的冯理达,忽然发现舱顶的壁缝间,钻进缕缕黑烟,正在整理东西的罗元铮还以为是小孩在上面跑步扬起的灰尘。正说着,满脸烟熏火燎的颖达,突然推门进来,说了声:“着火了!”又想往外跑。心急手快的理达一把把她拖回来,紧紧把门关上。罗元铮迅速打开舷窗:“赶紧从窗口出去!”理达和元铮先把颖达托起来从窗口塞出去,接着,他们也相继从窗口爬了出去。住在他们对面的冯洪达和赖亚力,也是从天花板冒出的烟中发现火情后,从舷窗中爬出来的。洪达一到甲板上,马上想到住在对面一排室内的爸爸、妈妈。他跑到另一面甲板上,看到刚刚爬出来的理达、元铮和颖达。大家一致的想法是赶紧救父母。洪达在父母住舱的舷窗外面向里看,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用双拳猛砸玻璃,手都破了,玻璃却纹丝不动,他用元铮递过来的太平斧,奋力将能抗强风巨浪的舷窗玻璃劈开,不顾窗框上残留的尖利的玻璃断片,从窗口爬进舱去。舱里浓烟弥漫,洪达睁不开眼,呼不出气。他憋住气,伸手到处乱摸,床上是空的,在沙发上摸着已昏迷的母亲,他抱起来送到窗口,理达和元铮把母亲接了出去。洪达探头向窗外大口吸了几口气,浓烟也从窗口窜出来,洪达被浓烟裹住,几乎昏过去。这时,元铮递给他一个消防栓,他从半昏迷状态中稍稍清醒了一下,艰难地抱起消防栓,左右扫动,驱赶着浓烟,这才隐隐绰绰看见父亲高大的身子面朝下扑倒在进门的地方。洪达猛扑过去,把父亲翻过身来,托起他的头,想把父亲抱起来,但身躯比洪达还要高大的冯将军,一点反应都没有,身子沉得像石头。正在洪达一筹莫展时,四个身穿消防服的苏联船员冲进舱来,他们一个人拉起洪达,三个人托起冯将军,想从窗口送出去,但冯将军身躯高大,从窗口出不去。清醒

过来的洪达，抡起斧子，向窗框横劈竖砍，在苏联船员帮助下，出口扩大了，冯将军终于被送出窗外，安放在甲板上。但这时冯将军已完全失去知觉，船医赶来后，发现他的瞳孔已经扩散，脉搏也找不到了。持续进行人工呼吸，心脏也不起搏。医生想注射强心剂，但医务室已被燃烧，什么药品都拿不出来了。历尽沧桑、饱经忧患、不断追求进步的冯玉祥将军，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冯将军的夫人李德全，经过抢救苏醒过来，但是最先出去的小女儿晓达，再也没有回来。船上共有二百多名旅客在大火中丧生。和冯将军同住头等舱的四位苏共中央委员，三人殉难，一人重伤。9月2日夜幕降临时，苏方侦察机发现了“胜利号”在海上的位置，随即派出军舰救援，3日凌晨抵达出事地点。经过几小时抢救，船上的大火被扑灭，活着的旅客被接上军舰。伤势较重的李德全和颖达、洪达，被快艇送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一所疗养院进行治疗。其他人护送冯将军的遗体去敖德萨。9月6日，苏联政府派专机去克里米亚接李德全去莫斯科。第二天，苏方又派两架专机到敖德萨，一架接冯将军的遗体，一架接赖亚力、冯理达、罗元铮。在莫斯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遵照冯将军生前遗嘱，遗体火化。火化前，按照苏军传统的最高葬礼举行了告别仪式。灵堂内摆满了苏联党政军各有关方面送的花圈，四名持枪的红军战士，肃立在由苍松、翠柏、鲜花环绕的冯将军遗体的四角。仪式由苏联高级将领主持，李德全同冯将军作最后的告别。哀乐声中，仪仗队鸣枪致哀。火化后，莫洛托夫接见了李德全，对冯将军的不幸遇难深表哀悼。

冯将军海上遇难的噩耗震惊中外。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出唁电：“惊悉冯先生及令媛不幸遇难，至深痛悼，冯先生置身民主，功在国家。尚希勉抑哀思，并为实现冯先生遗志而奋斗。”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发了唁电，李济深、马叙伦等许多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也发了唁电。1948年11月，李德全伤愈出院，抱着冯

将军的骨灰盒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2月26日，李德全回到北平，参与创建新中国的筹备工作。在冯将军逝世周年纪念日来临前，周恩来、宋庆龄、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薄一波、聂荣臻、李维汉、邓颖超、李济深、郭沫若等171人，在北京联名发表了“发起冯玉祥先生追悼大会启事”。9月1日午后2时，冯玉祥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在北平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亲题挽词：“冯玉祥将军逝世周年纪念谨致悼念”。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等先后致悼词，最后由李德全致词。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将军骨灰安放仪式，在山东泰安他的陵墓前隆重举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题写了挽词，李济深、李德全等八百余人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冯玉祥将军长眠于他曾隐居多年，也是他喜爱的巍巍泰山脚下。

（责任编辑 文贤）



冯玉祥、李德全与子女合影于南京

从井冈山走来的 女中英才 曾志

● 陈干群

一

6月23日上午，忽然接到彭儒大姐的电话：“曾志大姐前天晚上走了……”彭大姐哽咽着说不下去。曾大姐比彭大姐年长两岁，她俩一起参加了湘南暴动，又一起上井冈山。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女同志，现在就只剩彭大姐一人了，她怎能不格外悲伤！

我陪同欧阳毅老、陈珉大姐夫妇来到曾大姐家吊唁。客厅异常简朴，在挂着披有黑纱的曾大姐亲切慈祥的遗像前，摆有几盆菊花，墙上还有诗词挽联。我们以崇敬的心情向曾大姐遗像深深鞠躬……

斯亮告诉我们：“遵照妈妈的遗愿，她的骨灰将撒在江西井冈山和广州白云山，不举行任何送别仪式，只以告别卡形式，分送给她敬重的领导、战友和亲人们，作最后的告别。”

7月1日，陶斯亮和哥哥石来发、曾春华兄妹三家三代人，到了井冈山，把曾大姐的一半骨灰埋在小井红军烈士墓地中一棵小柏树下。这里正是曾大姐1928年工作过的红军医院旧址。

7月4日，陶斯亮和二哥曾春华带领子

女来到广州，把曾大姐的另一半骨灰与陶铸同志的一部分骨灰同装在一个骨灰盒里，深埋在白云山上一块名叫“松风石”的下面。

曾大姐就这样悄悄地走了！与我们静静地永别了！

二

曾志大姐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6岁上学，她聪慧体壮，性格倔强。1924年8月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26年8月，年仅15岁的她，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继毛泽东在广州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第二个培训党的干部的场所。农讲所学员都穿军装，过军事化生活。这年10月，她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曾志大姐从农讲所毕业后，任衡阳农协妇女部干事和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1927年5月21日，长沙军阀许克祥公然破坏国共合作，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即“马日事变”），湖南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时，上级指示：准备暴动，攻打长沙！曾志执行暴动的联络任务。1927年8月，曾大姐转到



1933 年的曾志



1991 年的曾志

郴州做地下工作，任中共郴州中心县委书记，参加策动湘南暴动。

湘南暴动后，她与红七师党代表蔡协民结为革命伴侣（1933 年蔡被叛徒出卖，在漳州英勇就义）。1928 年 4 月，她跟随七师上了井冈山，4 月 22 日在砦市朱毛井冈山会师后，她担任了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1929 年 1 月，曾大姐跟随毛泽东转战赣南，传播革命火种。

1929 年 9 月以后，她又担任了中共闽西团特委书记，厦门、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闽南特委、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和福霞中心县委书记等职。她出生入死，机智勇敢地完成各项艰巨任务。

1937 年 9 月，曾大姐在去延安途中，在武昌与刚从国民党监狱获释的陶铸重逢，终于有了个小家。党组织同意她留在武汉，担任湖北临时省委妇委书记和汤池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在鄂豫边区开展抗日统战工作。

1939 年 12 月，曾大姐到达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妇委秘书长，被选为党的七大候補代表。1945 年 6 月，随部队深入两湖、两广，开展敌后武装斗争。

日本投降后，她奉命北上，先后担任中共沈阳市委委员，辽吉省委委员，铁西区委书记，辽吉一、五地委副书记，沈阳市委常委、职工部部长等职，为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支援东北地区的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 年 5 月，曾大姐随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她先后担任武汉市军管会物资接管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广州电业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兼工业部长，广东省委候补书记等职。

她担任中南工业部部长时，经常到煤矿井下向工人问疾问苦。她担任广州电业局长和市委书记后，在电厂的工人宿舍安了家，她把精力用在抓生产上。

回到市委后，曾大姐有专车，但她每天坚持坐公共汽车上班。

三

在战火硝烟的革命斗争岁月里，曾大姐一次次付出过许多大的牺牲。

在井冈山，曾大姐带着七个月的身孕坚



1960年，曾志与陶铸在广州。

持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她第一个儿子遇到难产，三天三夜才生下。孩子出生后26天，因行军打仗只好送人收养。

在福州，她生下第二个儿子后，第六天就下床忙活了。孩子两个多月长得又黑又壮又乖，取名“铁牛”。当时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曾志生了一个男孩，就由组织决定，将“铁牛”送给了厦门一个有钱的医生，换了100块现大洋。孩子送走前，曾大姐和蔡协民抱着孩子，特意去中山公园玩了一次，然后又一起去照相馆照了张相。不料“铁牛”送出去不到一个月，就染上天花夭折了。

在闽东，她生下的第三个儿子才十三天，又因环境险恶，也不得不送给人。全国解放后，才先后找到了扎根在井冈山的石来发（跟养父姓）和在广东乐昌干环卫工作的曾春华这两个儿子。

1941年，曾大姐在延安生下了女儿陶斯亮，产后大出血，差点丧了命。

“文化大革命”中，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陶铸同志惨遭迫害。从1966年6月他奉命进京上任，到1969年10月他被“监护”后抱病被强迫离京“战略疏散”，三年多的时间，曾大姐与他日夜厮守，相依为命。作为报答，陶铸在监护室利用旧报纸写诗一首，诗中道出了一个共产主义伟大战士坦白的襟怀，也谱写出了那崇高的松树风格。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1969年10月15日，做过胰腺癌手术不久的陶铸被强迫“疏散”到安徽合肥。曾大姐强压悲痛，为他收拾行装，还替他洗了澡。陶铸只身离京的那一天，这对近40年的战友和伴侣，凭着深深的理解和信任，只是相互勉励和安慰，没有说什么凄切的话，也没有伤感掉泪。曾大姐问陶铸还有什么话交待？他只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此时陶斯亮在甘肃省一所军队医院当医生），你要告诉她，爸爸在历史上是清白的，对得起党。希望她要坚强……”

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蒙冤含愤辞世。

几天之后，曾大姐带着小外孙被强令下放到广东翁源县，在一个叫邱屋村的小山村落户。年已花甲的曾大姐在这个贫困的粤北老区，与农民同劳动，耙地、插秧、上山植树……农民干什么她干什么。

1972年，周恩来总理批示，将曾大姐安排到陕西省临潼干休所。

四

“文革”动乱，在全国制造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祸及上亿人口。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依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大量冤

假错案得不到平反昭雪。当时，仅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就有 6000 多干部闲在家中无事可做。文化界一大批社会名人被当作社会糟粕弃之不用。

1977 年 12 月，曾大姐恢复工作，她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参加了“老干部接待组”工作，后任“安排分配干部工作组”组长（不久成立了“干部分配办公室”）和副部长（分管经济干部局的工作）。在这段时间，曾大姐担负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

当时，上访人流如潮，每天都有数百人涌到中组部上访，每天都可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大批的申诉信。面对这种情况，曾大姐夜以继日的工作，有时累得她带病坚持工作。她热情接待每一位来访者，大家都亲切的称呼她“大姐”。她坚持原则，勇于斗争，敢顶歪风邪气。

曾大姐曾撰写了一篇“胡耀邦主政中组部纪实”的文章，下面摘录几段，从中可见曾大姐和她的同事们在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的业绩。

“耀邦同志在上任后第一次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指出：现在可以说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要求组织部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如何难，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

“为此，耀邦同志向大家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大家共同努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扫除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受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

“他当场宣布：请长期靠边站的陈野苹、章蕴、曾志、杨士杰、贾素萍等同志出来工作，首先组成‘老干部接待组’。他反复强调要关心群众疾苦，体察民间冤情。他大声疾呼：‘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希望’。

“大会结束后，耀邦同志又把我们几十位部局老干部请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说，现在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你们帮助我分担一些重担吧！首先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中组部的风气彻底转变过来，我们要打开大门热情接待好每一位来组织部申诉冤屈的老干部，给他们关心和帮助。耀邦同志提议，由陈野苹同志牵头成立了‘老干部接待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干部。不久，又成立了‘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由我任组长，负责安排中央国家机关 6000 多名待分配工作的干部；还成立了由杨士杰同志任组长的‘右派改正工作组’。这三大工作组的成立，为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奠定了组织基础。

“耀邦同志上任后的一个月，每天都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一个月的来信多达 6 麻袋。耀邦同志每天批办 30 多件群众来信，他经常利用吃饭、午休等时间找人谈话、批阅文件，不论是在机关还是在家里，他都热情地接待每一位来访者。”

在曾志主持下，召开了第三批中央与国家机关三十多个部委疑难案例座谈会，研究了



曾志在病中为老区题匾名

80多个疑难案子。经过五个多月的时间,中央国家机关6000多名长期靠边站的干部,安置分配了5344名,占待分配干部的85.6%。耀邦同志在接见干部分配办公室全体同志时称赞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分配5300多人,等于动员了一个干部师上前线。接着,曾大姐又参加了调整配备中央各部委的领导班子和考察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

当时,曾大姐住在南长街中直机关宿舍,她每天总是步行几华里,到中组部上班,不让轿车接送。

这个时期,曾大姐在中组部的业绩有口皆碑,她在胡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为全党的拨乱反正,全国的安定团结,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决好党的组织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

1983年8月,曾大姐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并任中顾委临时党委副书记。

1990年7月,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成立时,根据伍修权、陆定一、裴丽生等领导的建议,聘请曾大姐担任了中国老促会的顾问。多年来,她对老促会的工作开展和举办的各项

活动都积极参加、热情支持和指导。中国老促会成立后的一项紧迫工作,是要向全社会介绍老区,宣传老区,弘扬老区的优良传统,推广老区建设的经验。为此,老促会牵头组织编写了《中国革命老区》专著,此项工作也得到曾大姐的热情支持,我登门请她为专著题词,她欣然命笔题写了“井冈精神,代代相传”,表达她对子孙后代的殷切期望。

中国老促会妇女委员会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举办“继往开来,再作奉献”座谈会。那天,曾大姐早早赶到会场,她在会上即席讲话,深情地回顾了中国妇女在保家卫国伟大斗争中作出的特殊贡献和重大牺牲,谆谆告诫姐妹们,不能忘记先烈,今天应继续发挥好半边天的作用,为老区的建设、为消灭贫困,走共同富裕道路,为教育好子孙后代,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为纪念八一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70周年,江西和上海有线电视台联合摄制《共和国之魂》大型专题电视片,摄制组的同志来到北京医院。曾大姐带病接受了采访,她表示这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是我们应尽的历史责任。大姐拿起粗塑笔为该片题写了“大山女儿”一集的片名。



作者与欧阳毅、陈珉夫妇到曾志家吊唁,右为陶斯亮。

曾大姐在逝世前就留下遗嘱,丧事从简,把个人存款捐献“希望工程”和建立机关老干部活动基金。当年,陶铸同志逝世后,留下的稿费、公债连同后来组织上补发的抚恤金,大姐和孩子们都没有要,已全部交了公。大姐曾说过:“我想,我们这样做,一定更符合陶铸同志的意愿。克己奉公、艰苦朴素,也是陶铸同志传下的家风。”

(陈干群: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革命老区》执行副主编)

(责任编辑:仲文)

同『两个凡是』论争的来龙去脉

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六人联合发言

● 胡绩伟

编者按：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三中全会前，我国上下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我刊特邀请这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胡绩伟同志，以他亲身的经历，把“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这件大事，作如实的叙述。

胡绩伟同志来信说：

《炎黄春秋》的编者约我写一篇纪念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我因轻度中风，在医院里卧床 28 天，没有写成。对这场讨论，我有很多话想说。特别是一想起胡耀邦同志，我就很激动，好多话涌上心头。耀邦同志是这场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策划者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他不仅是一位站在时代先锋行列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他还是一位很善于和勇于运用宣传舆论工具来推动和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的杰出的宣传组织领导者。当时，我仅仅是他的一位志同道合的助手。那时，党校的理论动态组、《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能够密切联合起来，成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强大号角，全靠耀邦同志的强有力的领导。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病中反复研读了 19 年前，即 1979 年 1 月 19 日我代表杨西光、曾涛、华楠、于光远、王惠德等同志，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第一组的小组会上所作的长篇发言。我以为这篇发言稿把真理标准讨论的历史背景和进展情况，把当时热烈争论的不同观点和交锋情况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特别是对于这场讨论的意义，作了比较深刻的阐明，肯定“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这个话是周扬同志 1978 年 7 月间在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上说的，以后小平同志和中央文件都肯定了这句话。我们六个人的联合发言，特别对于“为什么说这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的答辩和论述。

我以为这个联合发言是一个很宝贵的历史资料，很值得推荐给 20 年后的今天的读者，比我自己现在写什么文章都更有说服力和启发意义。所以，我现在就向贵刊推荐发表这一篇文稿，来纪念 20 年前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就还了贵刊约我写稿的“笔债”。

我们完全同意胡耀邦同志讲的开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和开会方法,对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以及在全党工作中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些精神,努力把这次会议开好。

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争论,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胡耀邦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引言中讲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统一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些同志,可能对这场争论的许多经过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因此,我们作这个联合发言,将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作简要的介绍。我们的观点不一定都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我们提出的材料也不一定都准确,请同志们纠正、补充。

关于“两个凡是”争论的由来

这场争论,最初是从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引起的。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的出处。这篇社

论,名义上是两报一刊的社论,实际上,不但两报一刊事先不知道,连当时的中央宣传口事先也不知道,是由××同志领导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2月4日××同志在社论清样上批:“这篇文章,经过××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论。社论发到中宣口后,耿飊同志找几个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讨论,他认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被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的做法,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可是,因为这篇社论是中央批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是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以前,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希望邓小平同志赶快出来工作,看到这篇社论的“两个凡是”提法,认为是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信号,纷纷责问报社,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

事实上,在这以前,就有许多令人担忧的迹象,最突出的是1976年11月18日,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汪××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就对邓小平同志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他说:“他(指邓小平同志)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他还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办“朝农”,要放映电影《决裂》,说这都是“主席讲过”,“是主席的指示”。同年11月30日,北京市的××同志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讲话中也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



在胡耀邦的组织和支下,《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好。”汪××在谈到“四人帮”时,甚至还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还说过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等等错话。

从此以后,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争论。例如,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纪念周总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汪××同志却一再加以阻挠。在理论问题上,1977年初,《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刚开始批判张春桥写的《论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红旗》杂志向汪××同志请示,对张春桥的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评?2月4日,汪××同志指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只能不点名批评文内的错误观点。实际上就压制了对这两篇在国内外都起了很大恶劣影响的文章的批评。1977年5月份,《人民日报》查对了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文章的原稿,事实证明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关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都没有经过中央正式讨论,而是根据康生讲话,由陈伯达、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其中关于“全面专政”的提法,不是毛主席的原话,是陈伯达、姚文元写的,排成黑体字,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后来,《人民日报》就此写了份材料登在中宣部的简报上。×××同志看到后,打电话责问朱穆之、胡绩伟同志,说不应该登这个材料。此外,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分歧。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农业政策的宣传。1978年初,《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四川、安徽落实农业政策的经验,政治局主管农业工作的同志认为是“右”了。后来,在所有制过渡、集市贸易、自留地等问题上,《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其他报刊宣传党的政策,山西省委认为这是“宣传资本主义”,是“同学大寨对着干”,发生了许多争论。一年多来,在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冤案、错案问题上,也发生了许多争论。

正是由于这种种情况,许多同志认为,“两个凡是”的观点是产生这一系列争论的总根源。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实际上是在维护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如果不

打破这个禁区,大家就不能大胆提出新问题、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就无法前进。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的。

《真理标准》一文的发表经过

早在1976年冬天开始,中央党校一千多高、中级干部讨论我们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时,就得出这样的认识:分清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只能是革命的实践。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就提出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篇思想评论很短,没有引起普遍重视。但文章发表之后,报社收到二十几封读者来信,除一部分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外,大多数是提出疑问的。写这些信的人大多不是理论工作者,他们主要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认为标准是两个,而不是一个(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答复了这个问题)。此外也还提出一些理论上需要进一步阐述的问题,如: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检验的关系,等等。

这时候,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同志给《光明日报》投了一篇稿子,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时杨西光同志刚调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认为这篇文章不错,编辑部在原稿上加上了“马、恩、列、斯、毛从来不认为凡是他们的决策都要维护,凡是他们的指示都要遵循”这两句。后来,《光明日报》编辑部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一起修改这篇文章时,保留了作者的原意,但是考虑到2月7日的社论是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审阅过的,还是删去了《光明日报》编辑部加上去的这句话,避免正面批评“凡是”的提法。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于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当天,新华社立即全文转发了《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第二天,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

报》同时转载,全国各省市报纸绝大部分都转载。当时没有转载的报纸,以后也都陆续转载了。广大读者普遍反映很好,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

×××说:《真理标准》一文“很坏很坏”

就在5月12日晚上,×××同志打电话给胡绩伟同志,批评这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他说:“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举出列宁关于一国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和十一大路线在提出来时就是真理的例子,硬说“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他还说:“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文章结尾以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教条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他说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恩、毛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话,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吗?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这位同志在电话中虽然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要外传,当时胡绩伟同志就回答他:“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5月13日,《红旗》杂志总编辑××也打电话给曾涛同志,说新华社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当时就被曾涛同志顶了回去。但是他还是对别人说《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

社和人民日报转发这篇文章,犯了错误”。

5月17日,汪××同志在一次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他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按劳分配》这篇文章,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同志审查过的)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第二天,5月18日,×××同志在中宣部召开的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上,专门讲了《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问题。他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表了,就成了定论。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情,可以活跃思想,展开辩论。不仅这篇文章,还有另外的文章如《人民日报》批‘顶峰论’,还有一些文章,省市委同志小范围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他还说,“毛主席生前对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是从哪里来的东西,也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最后还向到会的同志拱手说:“拜托,拜托!”

此后,社会上就传说《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了。

五、六月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开幕,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小平同志还针对当时这种本本主义的错误思潮,很鲜明地指出:“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小平同志特别指出,这不是偶尔的、孤立的。这是一种“思潮”。邓小平同志讲话后,×××同志也在会议上讲话,他认为这次会议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为指导思想这句话中提“新的历史条件”,不符合华主席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提法,“和中央的口径不一致”;他还反对提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说什么毛主席没有提过。他认为凡是毛主席、华主席讲过的话都是不能改动的。

汪××极力维护“两个凡是”

6月15日,汪××同志召开了一个宣传单位负责人的小会。他在讲话时批评报纸“党报要有党性。党性和个性的关系,是个性要服从党性。”他说,宣传要注意被国内外敌人“利用,挑拨关系”。他批评人民日报社的一位同志(按:指余焕春)在全国政协会上讲的天安门事件应该翻案,说:“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他还说:“有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对干部问题评得很不对,只讲了一面,凭感情,不凭党性。要出气,利用文章出气不对。”他特别批评4月10日《人民日报》登的一个老干部给青年的信(按:这封信是胡耀邦同志写的),汪××说,这封信的“提法有问题。报社的按语捧得那样高。这封信不符合马列主义,对青年起煽动作用,引导青年犯错误。”

汪××同志还特别批评《人民日报》在报道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用的标题是引用新华社消息的导语《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他说:“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不标‘精辟阐明’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在汪××同志批评以后,七月份《红旗》杂志评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章中,就按照等级作了报道,说华主席是“极其精辟地阐述”,叶副主席是“指示我们”,邓副主席是“讲话中强调指出”。)

在这次会上,汪××同志还批评《长江日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报》不应该批极左,他说“主席说过:什么极‘左’,右得不能再右嘛。”

罗瑞卿支持《解放军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不指名地回答了×××同志那些批评意见,说:某些人拘守旧口号,“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缘故。”

这篇文章,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写的,罗瑞卿同志亲自修改过两次,审阅定稿。韦国清同志也看过,表示同意。罗瑞卿同志不幸逝世了,但是我们想到他那种反对本本主义思想的坚定立场,那种支持报纸维护真理的战斗性的坚定态度,我们是十分感动的。

7月5日开始,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中国



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召开理论讨论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7月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了全国各省、市同志参加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周扬同志讲了话。周扬同志说：“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据说，7月21日，邓小平同志找中宣部部长×××同志谈话，向他详细介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争论经过，并提出要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七月份，汪××同志去山东，据萧望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汪××同志对山东省负责同志讲过三句话：“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七月底，胡绩伟同志到医院去看望×××同志。×××同志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胡绩伟同志说，“你可以写文章来进行答辩和批判嘛。”×××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

该讨论这个问题。”

八月初，×××同志去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都讲了话。大家希望他讲讲真理标准问题，他不仅避而不谈，反而在吉林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这句话实际上是针对邓小平的。因为邓小平同志曾经讲到过列宁说党的领袖是多数人，而不是只有一个人。这个提法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而有些人却不赞成，他们总是要突出个人。这位同志接着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作神了，那就是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作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他还说，“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同志的讲话，在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吉林省委宣传部的同志讨论时提出：现在中央强调要宣传实事求是，而×××同志讲话的精神与此完全不同。他们提出六点意见，要求省委转给中央。

林乎加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说过×××同志曾经批评北京市的贾庭三同志，要他处理问题一定要按照本本办事，使北京市一系列问题不好解决。林乎加同志说：“群众提出要解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17年的问题，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等等。在处理中使我们都处在两难的地位。”

小平在东北讲话阐明 什么是“高举”

九月份，邓小平同志视察东北，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小平同志说：“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

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小平同志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

8月4日，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同志在省委扩大会上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批评本本主义，还结合实际工作，阐明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搞好工作、实现四个现代化等问题。

九月初，《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出版，但立即被汪××同志批评，以没有登毛主席的诗词、没有登华主席的题词，以及宣传天安门事件的英雄韩志雄和刊登了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等等为理由，不许发行。这件事引起《中国青年》编辑部和许多群众的不满，纷纷写信、贴大字报提出责问，以后大字报越来越多……

《红旗》杂志的消极态度

九月份，《红旗》杂志在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长期保持沉默之后，起草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

文章虽然也讲了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等观点，但没有着重阐述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却大批什么怀疑论、不可知论，批有人说“毛主席也有错误”等观点是所谓“海外奇谈”。文章结尾说：“批评家们的袭来，对我们倒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它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的时候，阻力和干扰是不可少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扰，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

这篇文章的草稿送给哲学研究所征求意见时，哲学研究所总支书面提了六点意见，不同意文章的主要论点。

他们又把文章送到中央审查，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大家把意见提出来，在充分民主评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样《红旗》没有发表这篇文章。但以后在

中央工作会议上，××同志对此还很不满意，说《红旗》长期没有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写了文章，中央不让他们发表。

《红旗》杂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一直迟迟不表态，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许多群众去信提出责问，说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红旗》杂志一直迟迟不表态，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宣部，也一直不表态，这是为什么？

国外评论也纷纷议论，认为《红旗》与《人民日报》态度不一样，以此来推论我们党中央内部有分歧。

胡耀邦提出三个“不管”

10月3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胡耀邦同志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实事求是改正过来”，进行了毫无道理的批驳，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这几句话。他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在压中央嘛！”他说：“现在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就有问题……用主席的话



积极支持真理标准的罗瑞卿大将在联邦德国海德堡骨科大学医治腿伤

批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这股风很大，要顶得住是不容易的。”

1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开会初期，《红旗》杂志社就谭震林同志写的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同志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如果登了，就是要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对此，邓小平同志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看来不卷入本身就是卷入。”李先念同志也批示：“《红旗》不登，太被动，现在已经很被动了。”

××同志还不甘心，又向汪××同志请示，汪说：“只好如此。”这才在《红旗》第十二期上发表了谭震林同志的文章。

11月22日，《红旗》杂志社有两位同志贴大字报批评××同志，说：“当杂志社内部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很被动时，××同志很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被动’，‘有人跳得很高，其实，他做了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这张大字报还说：××同志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了呢？……”他竟然在一次全社大会上号召全体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矛头对着谁？其用意何在？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争论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发言都讲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问题，但主张“两个凡是”观点的人一直不表态。直到11月27日，会议已转到讨论经济问题时，××同志却出来谈有关实践的问题了，他说：有人说“现在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种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

他的发言遭到与会很多同志的批驳。同志们批评他在会议开始时不表态。现在会议转入讨论经济问题时，他们又都出来说话了，是扭转

了会议的方向。

11月30日×××同志也在会议上发言说，他对实践问题的讨论没有公开表态，“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二是到中央机关工作不久，对于中央领导活动的过程不了解，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希望中央能够有个正式的文件，这也是我迟迟没有表态的重要原因。”

×××发言后，同志们批评他，说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经过中央讨论过的，是既发了中央文件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怎么还不算中央文件呢？何况小平同志还专门找他谈过这个问题，他应该了解情况，为什么不听呢？

×××说，胡绩伟歪曲了他的意思

11月29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了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一些看法，继续坚持他原来的意见，他说胡绩伟同志歪曲了他的意思，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12月3日他又发言说当时他在电话中讲了四点意见：一、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实践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二、文章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三、文章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这样，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全国能安定团结吗？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要砍旗；四、文章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说现在主要是批教条主义，这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大家听了他的讲话以后批评他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那篇文章，首先是讲了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的；第二，那篇文章明明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这怎么能说是“怀疑一切”和“不可知论呢”；第三，那篇文章说，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这怎

么能说是“修改”和“砍旗”；第四，毛泽东同志也曾讲过，批判修正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修正马列的。林彪、“四人帮”用“顶峰”、“句句是真理”等教条主义的手法搞修正主义，批判他们，怎么能说是“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有的同志提出，就拿×××同志自己讲的这四点讲，可以证明胡绩伟同志的电话记录是可信的，并没有歪曲了他的意思。

12月3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问题，都涉及到毛主席。国外早就有猜测，以为我们在实行‘非毛化’。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又提出了重新评价毛主席的问题，大肆宣扬毛主席的错误，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

他说，在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的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后果是不好的。”

他还说：“《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确实是太迟了。不过，《红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的是说我们在实行什么‘非毛化’，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我们《红旗》能够负责的。”

同志们对××同志的发言，特别是他所说的“非毛化”，进行了驳斥。有的同志说，他们这些同志在对待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的主张实际上是“按既定方针办”，“句句是真理”的翻版。“实际上是一股错误思潮，不容忽视。”

华国锋作自我批评

12月13日，华国锋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即将闭幕时都讲了话，华国锋同志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而汪××同志作书面发言时只说：“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开始我没有引起重视，当听到有些不同的看法以后，我对开展这一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同志们对汪××同志的这个发言很不满意，认为：在1977年开始对“两个凡是”的提法展开争论之后，华国锋同志很快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部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接着又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采用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提法。而汪××同志却一直坚持“两个凡是”观点，不贯彻十一大路线，而且一直不作自我批评，这是极不应该的。

推行“两个凡是”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

为什么说这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争论，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呢？这就要从面临的形势和实际情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打着“高举”、“句句是真理”的旗子干了不少坏事。林彪、“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一些同志仍然坚持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他们给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志扣大帽子，什么“砍旗子”、“丢刀子”、“非毛化”等等。在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上发生的分歧，根子都在于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他们的许多言论和行动，都是阻碍揭批“四人帮”，阻碍拨乱反正，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害于党和国家的前途的。

我们从下面十个方面列举事实加以说明：第一，阻碍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编者注：具体内容从略，下同）；第二，阻碍广大群众要求悼念周总理；第三，阻碍天安门事件平反；第四，阻碍陈云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参加中央工作；第五，阻碍悼念朱德、陈毅、贺龙等同志；第六，阻碍大量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第七，利用起草文件，制造错误理论；第八，保护康生；第九，阻碍揭批“四人帮”；第十，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他们多次同小平同志作对，不同意中央的大政方针。

（原文较长，本刊编者有删节。文中有些人名用×××或××代替，是胡绩伟同志的建议，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 方徨）

张闻天忧国至死不渝

● 冯雅新

1976年7月9日，江苏无锡。

中国共产党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党内公认的理论家张闻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凄凉的氛围中进行。与张闻天风雨同舟数十年的伴侣刘英献的花圈上，只能写着“献给老张同志”，按照“上面”的指示，连张闻天的真实姓名都不允许出现，仅有的几个花圈也用化名。各大新闻媒体对这一事件亦表示着长久的沉默。

一代伟人悄然逝去。

一代伟人的最后足迹，却是这样充满着悲怆与无奈。

回京愿望的最后破灭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切中时弊的长篇发言，换来了两顶沉重的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此时，毛泽东把党内外的批评和不同意见当作对党的攻击，尽管张闻天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实际上他看不到中央文件，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已被迫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经过张闻天的努力，被批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担任特

约研究员。如果仅仅如此，那么学者出身的张闻天，仍有可能在他所熟悉和喜爱的经济研究领域一展身手，至少可以安度晚年。但现实要残酷得多，随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更大的厄运终于降临到张闻天头上。

1968年5月，自“文革”开始一直被批斗的张闻天的处境恶化了。按照中央有关领导的批示，张闻天、刘英夫妇被宣布实行“监护”，不许自由出入，实际上开始了长达523天的监禁生活。

据刘英同志后来回忆：

“我们两人分别关在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屋子里。门窗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门上挖了一个小方洞，警卫日夜窥望监视。屋里只有一张木床、一个木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审讯处贴满对敌斗争的语录，有几个军人对我们轮流审讯，反复逼供。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间小屋，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

“但盥洗室还是合用一个，我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那时每天早晨天还未亮，我们就要被吆喝起来拖地，大拖把浸了水，拿起来很重……

“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时，我只能从他的咳嗽声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的吆喝声得知他的坚定。安静下来，不闻声息，我就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几天没有动静了，我上卫生间时细细察看，发现有一痰盂血，已经上了冻了。后来才听闻天告诉我，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作，鼻子流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同我见一次面的要求，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真是毫无人性。”

1969年中苏关系极为紧张，双方在边界的冲突时有发生。为防备对方向我发动突然袭击，“上面”决定将一批受审查的人紧急疏散。直到这时，张闻天、刘英夫妇才被解除了“监护”，遣送广东肇庆，并下令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这时的张闻天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头发、胡子又长又乱，脸色苍白，全身浮肿。他对刘英说：“既然我们是普通劳动者了，我就叫‘张普’吧。直到逝世，张闻天的名字也未得以恢复。

被疏散到肇庆以后，张闻天对国内政局依然十分关注。越来越



1962年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在江苏

离奇的极左言论，越来越严重的个人迷信，使他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忧心忡忡。“九·一三”事件在张闻天的内心深处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促使他要思考和探究：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肌体上会产生林彪集团这样的毒瘤？为什么个人迷信在中国会得到如此的膨胀？张闻天拿起笔，在受到“监管”的情况下，秘密地写作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先后写下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等文章。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问题，他深入地分析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这些关

系存在的各种矛盾，从经济、社会、历史、传统等方面寻找产生的原因，力图从根本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极力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打击残害老干部的做法，力所能及地解放了一批干部，对不能解放的，则设法改善他们的处境，张闻天从中看到了希望。他于1972年4月，给毛泽东、周恩来并党中央写信，在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情况和生活情况后，提出两点请求：一是早日在政治上、组织上解决问题；二是希望能回到北京，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信中同时转达了刘英“希望中央对她的问题也能早日做个结论”的请求。作为对这封信的回应，到6月，张闻天被告知：中央决定恢

复张闻天、刘英原有的工资待遇，但对张闻天申请回京的要求未予答复。

1973年3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张闻天闻之非常高兴。他于9月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重申了回北京工作的愿望。这封信的结果是使张闻天、刘英的组织生活得以恢复，允许在肇庆市委领导下做些调查研究，但对张闻天回京的请求仍未理睬。

1974年初，张闻天又一次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央，请求能回到北京度过晚年，并能被批准到各地看看。张闻天在信中写道：“我已经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身体不大好，思想和行动很迟纯，眼睛的白内障大有发展，阅读文件和书报日益困难，因此，我想在我不能走动或变成瞎子之前，看看我所热爱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新面貌。至于旅途中的费用，都可用我们的存款来支付，不用另外花公家的钱。”催人泪下的言辞没有打动任何具有决策权力的决策者，回答的仍然只有沉默。

1974年7月，刘英获准回家参加她的弟弟、原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刘彬的追悼会。在京期间，刘英看望了王震。素有“王胡子”之称的王震将军对张闻天的处境十分同情，鼓励刘英劝说张闻天向毛泽东上书，尽力争取回北京。10月，张闻天最后一次致书毛泽东，希望到北京生活和养病，并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去看着。这封信通过王震转交给毛泽东。得到的回音是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个地方居住。

张闻天回京的愿望终于破灭了。

既然回京的愿望已无法实现，张闻天提出回自己的老家上海，但数月之内不见音信。张闻天明白，回自己家乡的愿望也无法得到满

期的英勇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在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使人民生活得更好。谋求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更好的生活，是无产阶级政治的归宿点。针对当时的现实，张闻天指出：“现在有人却怕谈或有意回避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经济的、物质的利益，似乎这样说了，就是离经叛道，就应该戴上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福利主义、改良主义之类的大帽子。”对这种状况，张闻天大声疾呼：“同志们，再没有比这更糊涂、更愚蠢、更有害的了。”

在阐明经济决定政治观点的同时，张闻天论述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张闻天指出：“代表无产阶级经济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指南针”。“这样的政治，必然会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所接受，受到他们的拥护，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作用于经济”。

关于共产党的领导，张闻天指出：“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离开了经济，离开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就失去了基础，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目的，失去了真理与错误的界限”；“反映和维护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实现他们的利益服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产党的领导。”“任何离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的所谓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一切好听的言论、声明和主张，都必须考察其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而不能抱轻信的态度。”

针对当时盛行于世的“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观点，张闻天写道：“抓革命保险吗？如果你抓的革命，不从发展生产出发，并归结为推动生产力的提高，那么，这样的‘抓革命’就不保险。抓生产危险

吗？人们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方面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社会活动。当政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努力发展生产，自己的政治统治就一天也不能存在。这样的‘抓生产’谈何危险。”

在文章的结尾，张闻天指出：“我这里所说的，不过是一些唯物史观的常识。所以要不厌其烦地重温这些常识，是因为现在有些人已经把它遗忘得所剩无几了。”张闻天进而指出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危害：“如果连这样一些常识都丢掉……那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他的这种担忧，早已为“文革”的灾难性结果所证实。

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它与我国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他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高人一筹的悟性和理论家的远见卓识，也影响到他所遭致的政治磨难。今天，当我们重读这篇文章时，很难不为它所阐明的问題所撼动，这确实是一篇当之无愧的传世之作。尤其是它完成于“文革”的黑风恶浪中，在政治决定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张闻天重提“唯物史观的常识”，给了那些“连这样一些常识都丢掉”，却“天天自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们以迎头痛击。在当时被“文革”搞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园地中，这确实是伫立于狂风中的一朵奇葩。

对许多老干部被打倒和排斥的现实，对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张闻天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讲老实话，我不相信战争年代的许多老同志都变修了。让他们谈谈心里话，讲点不同意见，哪会影响大局呢？把他们都打倒，对党的事业有什么好处？过去我们党内搞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很希

望现在不要再重蹈覆辙。”

1974年10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宣布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同时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此后，因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全面整顿。这不仅遭到了“四人帮”的强烈反对，而且到后来，毛泽东也不能容忍邓小平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6年初，“四人帮”再次兴风作浪，在社会上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对此，张闻天怒不可遏。“怎么搞的？国内经济、政治形势才好转一点，又折腾起来了。一忽儿说人才难得，一忽儿又说右倾翻案，真是莫名其妙！据我看，按‘八大’的路线和精神行事，根本上没有错嘛！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那就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了。……把许多‘靠边站’的老同志重新安排一下，让他们干点工作，这也算是‘右倾翻案’吗？谁没有一点错误，不是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吗？犯了点错误就打倒，这哪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在血雨腥风、人云亦云的年代，遭受多年迫害和不公正对待的张闻天没有被现实所击垮，确实做到了“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看那些因出卖自己的良知而飞黄腾达的人，更加反衬出张闻天的伟大。

绝情悖理的葬礼

到达无锡之时，张闻天已是75岁的高龄，而且经过长期的迫害和流放，他的身体状况已是每况愈

下。多年的冠心病和眼疾一直在折磨着他。尽管无锡市委对张闻天夫妇给予了相当程度的照顾，但无锡的冬季湿冷异常，张闻天难以适应。1975年11月2日，张闻天因心脏病发住进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病情是严重的冠心病并发急性肺水肿。张闻天告诉医生“你们放开手脚给我治疗好了，不要到处请会诊，这样反而不利于治疗”。在医务人员的护理下，张闻天于12月中旬好转出院，脱离了危险。但是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波：反击右倾翻案风、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给张闻天的刺激很大，他忧国忧民，心情越来越沉重起来，不断犯病。

1976年1月9日，张闻天在收听广播时，得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心情沉重，坐在沙发上长久不语。接连几天，张闻天密切关注着新闻消息。当他从电视上见到周总理的形象时十分激动，见到在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上江青不脱帽的丑恶表现极为气愤。就在那几天，张闻天的睡眠很不好，时常在睡梦中惊醒，醒后感到胸闷、心跳、胸前区隐痛。病情加重了。

1976年清明节前后，群众性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达到高潮。当张闻天从电视上看到镇压“天安门事件”的新闻时，心绞痛突然复发。此后，张闻天的心绞痛和肺水肿不断发作，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用氧气。4月底，张闻天连续几次发病，十分危险。他意识到将不久于人世，对夫人刘英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一再重复：“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

197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清晨，张闻天默默地打开收音机，听完新闻节目，喝了几口米汤，躺下休息。

下午4点45分，张闻天心脏病猝发，当场昏倒在警卫员身上。在场的医护人员全力进行抢救，均告无效。

下午7点30分，张闻天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代伟人悄然逝去。

他想回北京居住，“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了。

他想到处“看看我所热爱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新面貌”也是不可能的了。

张闻天逝世后，江苏省委立即向中央汇报，请示丧事处理事宜，并请中央来人主持。有关部门向中央提出“遗体在无锡火化，并在无锡开个追悼会”，由江苏省委领导主持，无锡市委领导讲话。同时报送了一份讲话稿，说张闻天“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位老同志。他在南京参加过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迟至张闻天逝世后的第8天，江苏省委才接到中央的指示，否定了江苏方面提出的方案：一、不开追悼会，可由江苏省委和无锡市委各派一位领导同志及少数工作人员向遗体告别。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然后将遗体火化；二、张闻天的骨灰盒放在无锡市革命公墓；三、由江苏《新华日报》发一消息（附消息稿）；四、张闻天丧事所需经费在中央办公厅报销，他的遗属按国家规定发给抚恤金；五、张闻天的爱人刘英由江苏省予以安置。

7月13日，江苏《新华日报》在第三版右下角以“本报讯”的方式刊登了“上面”拟定的张闻天逝世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

效，于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73岁。”中央级报刊一概保持缄默。

……

历史是公正的。在张闻天逝世后不到一百天，嚣张一时的“四人帮”被粉碎了。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为张闻天平反。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悼词中肯定“张闻天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悼词中庄严宣布：“现在，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张闻天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总书记胡耀邦在讲话中将张闻天的名字列入同毛泽东等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

1985年，《张闻天选集》公开出版。在“编辑说明”中高度评价了张闻天的历史功绩和理论贡献：“张闻天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对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代英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责任编辑 木易）

从康生制造“谋杀苏枚”冤案 引起的联想与思索

● 凌 云

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已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只是因为“已经死亡”，依照我国法律，决定对他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整人，是康生的看家本领，直接、间接挨过他整，遭他阴谋诬陷，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托派”……而被捕坐牢，甚至丧失生命的，难以数计，他亦以此出了名。人们谈到康生时，都想刨根究底弄个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坏？为什么这样狠毒？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刨根究底，康生何人 先看“谋杀苏枚”案

延安时期，我曾在康生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工作了五年，接着又随他领导的中央土改工作队一起到达山东，其间约有大半年的时间当过他的秘书；从1950年起到“文化大革命”，又长期遭康生和他老婆曹轶欧的诬陷与迫害。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有些同志常希望我谈谈康生的情况。其实我也不清楚康生的底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回答不了。最近我有机会比较系统地了解到康生制造的“谋杀苏枚”案的详实情况，由此联想起我亲身经历或间接听闻的一些往事，回忆和思索，使我有话想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以为，经1948年以后我所接触的事实看，康生整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左”，搞什么

“逼供信”；也不能简单解释成为了抓权，排斥异己，结党营私。我认为康生的整人与他和曹轶欧这家夫妻店的利害紧密关联着。在他们俩看来，周围的人都不可信，总有人想整他们，不是“坏人”，就是“特务”；而他们自己总像是在紧张地保护着什么隐私，生怕被人发现或抓住他们见不得人的什么秘密。而康生与曹轶欧制造的这起“谋杀苏枚”案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佐证。

现在就从这起骇人听闻的“谋杀”案说起。

苏枚，原名曹文敏，是曹轶欧的亲妹妹。1928年由康生介绍入党。历史上曾被捕，出狱后，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1950年春夏间，康生与曹轶欧在杭州疗养，苏枚同他们住在一起，有一天忽然跳了楼。康生硬说是保卫人员把她推下楼去的，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还把“残害苏枚”作为当时任秘书的沙韬的一条罪状。苏枚跳楼无恙，回到北京，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在中央政法干校任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正当造反派组织到处“揪叛徒”的时候，苏枚竟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了。时间是1967年4月6日。上午十时余，她的儿子回家，见房门紧锁，呼叫没有人应，便从厨房破窗而入，发现苏枚睡在床上，已深度昏迷，无法叫醒，当即报告校方，叫救护车送往北京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3时47分死于医院急救室。

尸检自杀，偏说他杀 此案一度不了了之

为了查明苏枚死因，北京医院进行了尸体解剖和药物检验，于4月18日对苏枚之死作出结论。结论报告说：“根据患者处于昏迷状态，各种反应均消失，血压下降，唇印紫绀及心电图检查有心肌缺氧等临床现象，死亡后病理解剖在胃内发现有多量药物存留，经过验定该药物为导眠能。小便检验导眠能为阳性。因此患者之死亡原因为安眠药（导眠能）中毒”。另经总后勤部、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等单位多次化验、鉴定，结论是一致的：苏枚是服安眠药自杀身死。接着，公安部又组织公安部治安局、政法干校和北京市公安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尸体检验和现场勘察，未发现外人作案的任何痕迹，排除他杀的可能，认定苏枚确属自杀无疑。

但是，康生与曹轶欧坚决不接受苏枚自杀身亡这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他俩不等医院的结论，也不等公安部门现场勘察的结果，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医院向政法干校造反派的人讲述起苏枚的生平，说她在白区工作如何英勇，如何有贡献，“是个好同志，不会自杀。”责令公安部成立“苏枚被害案件调查组”，并要立即为苏枚开追悼会。康生说：“你们不开追悼会，我们开家庭追悼会。”开追悼会时，康、曹特意带一个警卫班，威风凛凛，到场示威。

追悼会前后，康生、曹轶欧多次接见政法干校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还连续召见联合调查组听取汇报。在1967年5月12日的第五次汇报会上，康生讲了很长一番话，他说：苏枚“既然站在革命方面，保守势力打击她是必然的。”“她虽然受到打击，不等于动摇革命信心”，强调“要从一个具体问题看出阶级斗争”。康生最害怕的是医院检查和现场勘察作出的科学结论。他摆出理论权威的样子，假惺惺地说：要“通过这个案件学会用辩证的方法，不是主观片面，是实事求是，全面、客观、辩证的看问题，作调查工作。”接着，话锋一转，说“调查中涉及很多技术，凡是接触到技术，就很容易形而上学，如法医、化验、侦察，越是技术专家，越容易形而上学，片面。”把

医院和公安部门做出的科学结论，全都不予承认。

曹轶欧配合康生，随心所欲，信口制造“谋杀”的论据，提出了一大堆“谋杀”的疑点。如说：苏枚尸体的药斑是“外伤”；厨房窗子的小破洞是“人为的”；铝壶底有两个凸起，是“凶手”为吓唬苏枚敲打水壶形成的；奶锅里残渣发臭，有点水底，是“有人冲刷毁灭罪证”。最恶毒无耻的是说“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解剖时放进去的”等等。这些为了掩盖真相而制造出来的奇谈怪论，当然经不起核证，被调查组一一否定了。

曹轶欧还乱指乱咬“谋杀”嫌疑人。她说，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住在苏枚楼下，苏枚死的当天，她在苏家就见到石家的人两次上楼归还借用的小磨，看水管漏水，这是打听动静。又说，干校卫生科长闻伯俊在北京医院抢救苏枚时“出来进去，一定是在策划什么”。公务员段学思“不能因为是贫农就排除他，他同石磊住在一起，要联系起来看。”先后被指名为“谋杀案”嫌疑人的共八位，强令调查组进行重点调查。

这个调查组还是实事求是的，根据事实依然确认苏枚是自杀。对此，康生、曹轶欧极为不满，一再指责“不突出政治”，“单纯技术观点”。调查组把苏枚自杀的证据材料汇总写成书面报告，送给当时公安部的负责人李震。李不得不承认苏枚是自杀。但李震耍了个花招，他要调查组“一次不要报这么多材料，一件一件的慢慢报，时间长了，不了了之”。

风波再起，直接操纵 滥捕无辜严刑逼供

能不了了之吗？1967年底又风波突起。李震接到政法干校某人的诬告，说王久成（政法干校主任教员）私下到辽阳东北民警干校调查苏枚历史上的被捕问题。曹轶欧得知后，神情激动，全身颤抖。第二天，康生与曹轶欧经由谢富治和李震下令捕人。被捕的有石磊、闻伯俊，罪名是“谋害苏枚”。还以“进行黑调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逮捕了王久成。逮捕行动开始前，调查组一再向李震申辩：怀疑石磊与闻伯俊杀人没有根据，王久成到辽阳搞“黑调查”没有查对核实。这时，李震却一改原来不了了之

的态度，不顾调查组的申辩，强令执行，决定另行成立“干校军管组”和“石磊专案组”，对所谓嫌疑人严刑逼供。

康生、曹轶欧利用了中央政法干校归属公安部领导的特殊条件，借口“防止案情扩散”，把“石磊专案”交给当时由公安部负责的“中央专案三办”代管，并指令政法干校军管组组长兼任“石磊专案组”组长，实际上是直接对康、曹负责。康生、曹轶欧把此案定性为“反革命谋杀”，多次在家中召见专案组负责人，当面作指示，逼令抓“凶手”。案件进行情况，“作战方案”，以及专案人员的变动，受审人员到医院看病，都要向他们汇报，经他们批准。用“专案组”负责人的话说，“是在康老关怀下，由曹大姐直接抓的”。后来有人讥讽说，这是康生、曹轶欧的“家庭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后，捕人越来越多。石磊的妻子谷敏是西城区月坛办事处的干部，竟以“群众专政”的名义，把她抓到政法干校院内，私设刑堂，单独关押了六年。闻伯俊的妻子吴群是个家庭妇女，不分青红皂白，也被逮捕入狱。1968年4月以后，又将政法干校另一副校长张效良，卫生科医生宋公田，公务员段学思等逮捕入狱。

北京医院的内科医生顾惜青（女），1967年4月6日碰巧在急诊室值班，参加了对苏枚的抢救工作。根据苏枚的症状和解剖化验的结果，从医生的职业道德出发，认定苏枚是自杀身死。为此，触怒了康生、曹轶欧，1969年11月11日以顾有“严重问题”，被捕入狱。

1968年1月，政法干校实行军管。在“专案组”迫害无辜的同时，按康生、曹轶欧的指示，政法干校的“文化大革命”围绕“谋杀苏枚案”进行，开展“大揭发”，“查凶手”，“追后台”，大抓“石磊一小撮”。曹轶欧再三强调，“苏枚被害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问题”，凡是对苏枚提过意见或对“谋害”表示过怀疑的，都被诬为“反康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遭到批斗和挨整。

这起“谋杀”冤案，遭诬陷迫害的多达99人。其中捕押在监狱的9人，隔离关在政法干校内的23人，逼死2人，逼疯3人，整成终身残废

的1人。公务员段学思的妻子国淑琴是个家庭妇女，曾与苏枚有过争吵，被当时干校内的恐怖空气吓得服敌敌畏而死。政法干校一时成了阴森地狱！

1968年9月，在刑讯逼供下，在一个受审人员的口里逼出了一套所谓石磊、闻伯俊、宋公田三人“谋害集团”的假口供，供后第二天就一再翻供。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一面向康生、曹轶欧邀功报喜，一面在狱中将此人反铐双手，戴上16斤重的脚镣，以致终身残废。曹轶欧欣赏逼出的假口供，特意写信给赵登程“并苏枚被害专案组的同志们，军代表们”说，“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你们致以亲切的同志式的敬意。”

刑讯逼供如此凶狠残忍，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康生和曹轶欧很不满意。李震和赵登程为此批评“专案组右倾”，“不如造反派有阶级感情”。责备他们“只查历史，不审现行，仗越打越远”。只要谁对“谋杀”有丝毫怀疑，就被指责为“政治上的动摇，是犯罪，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于是“专案组”又搞起车轮战来。1968年10月，经过连续三天四夜的逼供，又在另一个人身上逼出一套假口供。赵登程立即给曹轶欧写信报功。信中说：“此案领导小组抓的很紧，完全按康老的指示摆在议事日程前头。”“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现满怀信心，乘胜前进”。赵登程还总结出“逼供信”的四条“经验”：“办案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没有证据怎么办，要从犯人嘴里掏；棒子底下出材料，后半夜里出战果；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这些所谓“经验”，还于1968年11月在“中央专案三办”的“活学活用”会上介绍推广，真可谓荒谬绝伦。

曹轶欧对“专案组”刑讯逼供、以假作真的卑鄙行径极为赞赏，又写信，又送“语录”，一再表扬是“高举”、“活学活用”。在康、曹的鼓励下，刑讯逼供愈演愈烈。他们要攻破石磊这个“堡垒”，但直到最后还是连一根稻草也没有捞着。石磊同志是这一冤案的“首要分子”，关押了七年，受尽了种种酷刑的迫害，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九死一生，始终顶住了逼供，挺住了腰杆。

1969年11月17日，按照康生、曹轶欧的旨

意，公安部领导小组谢富治、李震、赵登程等制造了一份报送中央的假报告，以逼供出来的假口供为依据，加上拚凑捏造，硬把苏枚自杀说成是“谋杀”，诬说是石磊、闻伯俊、宋公田“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地谋害的”。谢富治等同康生、曹轶欧一样，最害怕他们所谓的“黑调查”，也就是害怕揭开苏枚历史上的谜团。说“黑调查”是对苏枚“进一步进行政治陷害，恶毒地攻击康老”，“其用心险恶，无以伦比！”总之，苏枚的历史是触动不得的。在“报告”中还说：“他们的黑后台还有待于深挖”。看来是想把他们要整治的更大的人物罗织进来，这才是真正的用心险恶！

但是，冤案毕竟是冤案，假口供不能当真。从1971年起案件实际上搞不下去了。康生、曹轶欧咬住“谋杀”不松口；对石磊等人则关而不放，折磨得浑身是病。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在押的人才陆续放出来。石磊是1975年3月2日放回政法干校的，但直到康生死后的1977年，“专案组”还在阻挠对此案做出平反结论。这年6月9日“专案组”给公安部负责人的信中说，苏枚是怎么死的，“这个结论不好作，也不能作。”“特别是结案过程中，康老曾指示，不要再为此案打扰曹大姐了”。“要给苏枚之死做结论，必须通过她，这对她身心健康是有害的”，云云。简直是一派胡言。后来还是胡耀邦同志的果断决定，公安部党组于1978年5月做出了《关于因苏枚自杀造成冤错案件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中央。石磊等同志相继于1978年10月得到平反。

冤案虽平，谜底未揭 回头再看苏枚的历史

这桩冤案的受害者是平反了，可是苏枚为什么要自杀，又恰恰在“文革”造反派组织“揪叛徒”的时候决心一死呢？这个最重要的疑问并没有得到解答。康生、曹轶欧又为什么这样性急，慌忙跳出来亲自导演了这一出恶作剧？颠倒黑白，刑讯逼供，用尽一切卑鄙手段，蓄意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这究竟要掩盖什么呢？

不久前，原在济南市公安局工作已经退休

的几位老同志向我提供了有关苏枚的一段历史情况，使我想得很多，不妨写下来供大家思考。

苏枚（曹文敏）1928年由康生介绍入党。1930年她和丈夫刘少甫被派到济南，刘任中共地下党山东省委书记兼团省委书记；苏在省委机关工作。她们的家在济南市内顺宫街一个居民院内，是省委秘书处的机关。这时曹轶欧的前夫李应臣（曾是上海地下党沪西区委书记，已叛变）也从上海来到了济南，一次路过顺宫街时，正巧看到了出门倒水的苏枚，当即密报给国民党特务机关，经过盯梢监视和密查，并派特务仲文焕带家属住到苏枚家隔壁严密监视。不久逮捕了苏枚与刘少甫。接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济南以至山东省内到处进行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相继被捕的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和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女革命家郭隆真等二十多位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这些党的重要人物，后来都被敌人残酷杀害，唯独苏枚一人出狱生还。苏枚出狱后不久，由康生恢复了她的党籍，分配了工作。

苏枚的这段历史，现在是没有人再去彻底查究了。但是，康生和曹轶欧把苏枚自杀硬栽成“谋杀”，用尽心计，制造冤案，残害无辜，究竟为的是什么，是为死者苏枚，还是也为他们自己，这难道不发人深思吗？

名为死者，实为自己 康生心怀鬼胎已久

还是让我们听听曹轶欧和康生自己是怎么说的。

其一，1967年6月29日，即苏枚自杀身亡后两个月又二十多天，曹轶欧在笔记中写道：“许多问题前前后后连系起来看，枚被害不是孤立的”，“枚被害也不仅限于干校一个单位，有远因、近因”。“远因：饶（漱石）、李（？）、杨（尚昆）、李（克农）”，“近因：（苏枚）分配到干校去是安子文、帅孟奇早已计划好的……”安和帅，一个是中央组织部长，一个是副部长。1968年7月，康生亲笔将两人列入“叛徒、特务”名单，进行诬陷迫害。

其二，1967年7月15日，即苏枚自杀身亡

后三个月另九天,康生与李震等人谈话,造谣刘少奇迫害他。又说:“苏枚同志的事,同罗(瑞卿)、杨尚昆、李克农有关。(公安部)五〇年档案中,有没有罗(瑞卿)、李克农陷害我的文件,找可靠同志翻一翻。”

康生与曹轶欧夫妻两人唱的是一个调,意思是说,“谋害”苏枚为的是“谋害”康生,是连系在一起的,并且把“有待于深挖的黑后台”(以上引谢富治等制造的假报告)都一一指明了。

康生、曹轶欧把刘少奇、罗瑞卿、杨尚昆、李克农等都牵进去了,是有一段历史背景的。下面,我将我所知道的康、曹历史上的种种异常表现叙述出来,为这两段话作一个注解。

1947年冬,康生率领土改工作团到达山东渤海区。先是参加该区的土改整党会议,第二年春,工作团和区党委的同志组合一起到阳信县搞土改。负责人是区党委的秘书长彭瑞林。曹轶欧和贾琏(高文华同志的夫人)与彭的夫人被分在一个村工作。因为工作中有些不同意见,曹竟借口彭夫人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诬陷她是“国民党分子”,“有政治问题”,“包庇村里的坏人”。还无理指责贾琏一道反对她,“包庇坏人”,是“立场问题”,在村里大闹了一场,她称病回到了区党委住地。曹轶欧大闹工作组的时候,康生和我正在西柏坡中央工委(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回到渤海,曹就向康生“告状”。康、曹要我转告区党委组织部长张晔查究彭夫人的“政治问题”。我不能鲁莽行事,先向中央工作团的几位同志了解情况,他们都不满曹轶欧的所为。张琴秋大姐说曹“太过分了”。徐冰同志说“曹轶欧政治上太狭隘”,要我不必管曹这桩子事。我觉得曹轶欧确实没理,也就没有再理会她。高文华曾经担任过白区地下党北方局和省委的领导工作,是一位很有修养的老同志,四五月间,在他与贾琏要回中央前,特意向康生道歉,说贾琏对不起曹轶欧。康生没有作什么回应。至于我的不遵命,康与曹当然很不满意,可我没有立时意识到。二十年后,我在北京秦城监狱受审时,审讯员说:康生、曹轶欧“在渤海区党委时就看出你不对头了”。我才明白过来。

1949年,康生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

10月间他病休去青岛。不久,他到北京查病路经济南。我当时在济南市公安局工作,特意去看望他。康生问我:“你对沙韬了解不了解?他在政治上怎么样?在社会部的表现怎样?”沙韬是一年多前应康生的要求从中央社会部调来给他当秘书的。康这一问来得很突然。我不加思索也回答得很爽利。我说:“沙历史清楚,政治上很单纯,整风审干中做有结论,工作表现也不错。”康面无表情地说:“那他为什么拆看曹轶欧给我的信呢?”这一问,出乎我的意外,我说:“可能是误拆吧。”他摇头表示不以为然。我又补了一句:“刚做秘书工作,没有经验,年轻不懂事也是可能的。”康生很不满意我的回答,默默地坐在那里不吭气,不再理我,我只好退了出来。后来我知道,拆信这件事发生在沙韬初到康生那里工作的时候,康在益都闵家庄中共华东局,曹在沂水中共鲁中南区党委,秘书每天收受的信件不是一封两封,又不认识曹的笔迹,完全是误拆,而且及时向康生作了检讨,说清楚了,按常理,何疑之有!但是,康生与曹轶欧对此事刻骨铭心,认定是故意偷拆信件,一直不肯放过,并且愈来愈严重,诬陷沙韬是有人指使的“特务行为”!这是后话。

1950年春,康生在青岛休养;曹轶欧时任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在济南。一天夜里,曹来到省公安厅副厅长季明(已故)的住处,胡说有人对她“搞阴谋”,她在山东分局“已被严密监视”。季明原是延安中央社会部的干部。曹找季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得到季的支持,并为她做些什么。季当然不能同意他的说法,一再解释不会有人监视她,好说歹说,把她送回了山东分局的住处。第二天,季明向主持工作的分局副书记傅秋涛作了报告。傅与分局其他负责同志觉得事出意外,对曹轶欧无中生有,凭空提出“搞阴谋”、“监视”这样严重的指责,极为恼火;但碍于康生的关系,处理上又觉得十分困难。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出于好心,认为曹是心神过于紧张,是病态的反映,考虑送去青岛又恐对康生养病不利,于是希望她去医院或休养所养息一段时间,但遭到曹的拒绝。不得已,他们希望把她接到我家来住几天,缓和一下她的情诸。开始我并

不愿意揽这桩麻烦事，后来分局作出决定并取得了曹本人的同意，我也就只好同意了。曹在我家住了三天，搅扰得我的全家不安，傅秋涛同志等分局负责人才同意我的意见送她去青岛。行前，傅还同她谈话，说了不少宽解的话。就是这么一回事，引来了曹轶欧对我们夫妇的刻骨仇恨。她到北京后曾对罗瑞卿造谣说，在山东济南的一个晚上，我们夫妇两人把她推进一间黑屋子里整她，企图谋害她。罗瑞卿同志是到了1978年才把这些话告诉我的。他说从来没有相信过曹轶欧这些鬼话。

1950年春夏间，华东局和党中央电告康生，从健康考虑，劝他离开青岛去杭州休养。康生犹豫再三，先是拟发了一个不同意去杭州的电报，交青岛军管会参谋长陈雷送机要译发，接着又要陈追回，另发一个同意去杭州的复电。这是多年后陈雷同志告诉我的。康生与曹轶欧去了杭州，心里是不满意的。过了20年后，即1969年，康在一个材料上批道：“饶（漱石）、傅（秋涛）、向（明）都想赶我离开华东”，就是指的回事。傅、向当时都是山东分局副书记。

康生与曹轶欧在青岛、杭州休养期间，一直诬指沙韬在监视他，说连他睡觉时“沙都坐在卧室门外监视着”。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康生常在被窝里抽烟，一次叼着烟睡着了，被子烧了个洞。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沙总要等康睡着了，检查过烟火才去休息。认真负责的工作，竟被诬为“特务监视”，可恶又可笑！是谁指使派遣沙的呢？康生最早指的是李克农，沙是从李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调去的。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康生又指向饶漱石，饶原是华东局书记。到了1969年，康生在一个材料上又批道：“当时我已看出沙是饶（漱石）、傅（秋涛）等人监视我的小走狗，故要沙走”。并且把矛头更指向了刘少奇。

康生和曹轶欧在杭州时出了苏枚跳楼事件，杭州住不下去了，1950年7月到了北京，康住进北京医院疗养。1952年初，我调到北京，在公安部工作。先是李克农对我说：“康生说沙韬有问题，沙有什么问题！”李又说，已经作了安排，“以后不要再让康生见到沙韬就是了”。公安

部的一些同志告我：康生到北京，罗瑞卿作为公安部长对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负有保卫责任，所以去医院看他，孰料事后康生说，罗瑞卿为什么来看我？对罗抱着疑问和很深的戒备。不少原是延安中央社会部的同志都知道，康生见不得中央社会部的人，也听不得人提起中央社会部和公安部。我问过徐冰同志，“康生究竟怎么了？”，徐说：康到北京，少奇同志见了他说他神情恍恍惚惚，康要求见毛主席。徐说：“康生是认为中央不信任他”。待到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我才确知，早在1950年康生在杭州、上海曾反复向饶漱石说过党对他不信任的话，饶曾报告中央。

1954年，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处理了饶漱石的问题后，人们发现六年没有工作，深居不出的康生，又在一些公众场合露面了。这时，他想起我来了，诬说我有“政治问题”，要求中央审查我。由于罗瑞卿同志和当时在中央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的明智，不相信他的诬蔑陷害之词，保护了我，压根儿连有这么一回事也没有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杀气腾腾，信口雌黄，任意诬陷迫害人，我当然在劫难逃了。他伙同谢富治，利用公安部的侦察、情报档案，采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卑劣手法，亲笔写下了许多批语，诬我为“叛徒”、“特务”，捏造了一个所谓“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内奸集团”。我为此坐了七年冤狱。二十多年间，康生、曹轶欧欲置我于死地未能得逞，这回他们自以为得偿心愿了。

沙韬当然也在劫难逃。1967年6月，康生从中央调查部“造反联络站”给他的报告中，得知沙韬改名张韬，在甘肃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并看到了1954年少奇同志在一个报告上的批示，大为恼火，怒气冲冲地批了一段话：“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改了名字，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起来的”，“这是刘、杨、李（克农）包庇之力，他竟然作了副部长”。原来在1954年11月间，沙韬所在组织为了澄清康生对沙的诬陷，曾将有关情况写了报告报送“李克农并尚昆同志”，后又转给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作了批示说：“怀疑沙韬政治上有问题，曹轶

欧和我谈过，他们是病时谈的，并且谈到其他的人，但没有谈到饶漱石，我不相信曹轶欧所说的。经过调查，沙韬同志和他的夫人是没有问题的。以上事实应同沙韬同志谈清楚，使他们放心。至于沙韬的工作，也不必因此调动，但也不要为此故意去刺激康生。”这个批示大概就是一度传说的：“少奇同志批示病人之言不可信。”康生怎肯对此甘休！1969年8月3日，先由曹轶欧写报告给康生，要求组成“沙韬专案审查小组”，“彻底搞清这一阴谋案件”。然后再由康生批：“同意这种处置”，并诬说这是“涉及刘少奇、饶漱石、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等叛徒集团的反革命阴谋问题”。从此，新的迫害开始了。从误拆一封信起，沙韬受康生、曹轶欧诬陷长达29年，“文革”中又被关押近八年，受尽了折磨摧残。

请看，1969年11月19日康生亲自拟稿，以曹轶欧、郭玉峰名义写给甘肃有关负责人的信中给沙韬罗织的六条罪名：一、加入兰衣社特务组织；二、伪造历史，混入党内的假党员；三、私拆信件，扣留文件；四、进行特务活动，侦察监视康、曹，残害苏枚；五、是饶（漱石）、罗（瑞卿）反革命指挥下的走狗；六、有大量材料证明刘少奇、杨尚昆、罗瑞卿、安子文、李克农等人隐瞒和伪造材料，颠倒黑白，有意包庇这个反革命分子。这六条有的是无证无据的卑鄙捏造，有的是捕风捉影的阴谋栽脏，总之，全都是诬陷。由此可见康生用心之险，手段之毒，可谓是无所不用

其极！

罗瑞卿同志于1978年5月10日给胡耀邦同志的信中说：“康也组织了一个所谓专案组整我，罪名两条：（一）包庇凌云，陷害他的贵夫人曹轶欧；（二）包庇沙韬陷害他，这不仅是无中生有，而且比海外奇谈还要高超得不知多少倍的怪论。这位沙韬同志，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说到“专案组”，罗在信中说，“如果说他们的恶劣程度，不在林彪、江青两个整我的所谓专案组之上，至少也不在它们之下”。

从1948年到1975年康生死，这近三十年的时间，纵观康生与曹轶欧的种种异常表现，应该有理由相信，他们确是在保护、掩藏着什么隐私，怕被人发现或被人抓住。在本文开头，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确实有理由的。在本文结束的时候，再引用一段从我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工作时记录下来的材料：

“1975年康生死前曾对人说过大体是这样的一段话：1920……1921……1922……，没有；1923，没有；1924，没有叛变；1925，没有叛变；1926，我没有叛变；1927，没有……接着说，江青是叛徒，她30年代在上海被捕过。”

康生吞吞吐吐，欲说又止，他心怀鬼胎，究竟想说些什么呢？康生到底是什么人？现在还是个谜，但历史总会进一步作出回答的。

（文中插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 方实）



1966年到北大煽风点火的康生

“文革”教训应继续探讨

● 季羨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点，但是还不够。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有什么人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了解，听讲“文化大革命”，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化大革命”，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宏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记得是在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化大革

命’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类人，既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想起了他们的历史和现状。在封建社会里，士列在士农工商之首。一向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样的知识分子，我没有见到过。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我是见到过的。不说别的，专就当时的大学教授而言，薪俸优厚，社会地位高。他们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必然的。他们一般都颇为神气，所谓“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情况大大改变。国民党统治已到末日，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教授实际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还是披着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的。

刚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样，兴奋异常，觉得自己真是站起来了，自己获得了新生了。我们高兴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们觉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红艳似玫瑰，光辉如太阳。

但是，好景不长。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在“中盆”里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觉得身轻体健，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头。可是后面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好像是有点喘不过气来。批判武训，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胡风，批判胡适，再加上肃反等等，马不停蹄，应接不暇。到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然没



季羡林教授

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间，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我顺便说一句，当时还没有发明“喷气式”，批判会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好看”——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里却逐渐升起了一片疑云：为什么人们的所作所为同在那前后发表的几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显得极不合拍呢？即使是这样，我对那一句最有名的话：是阳谋，不是阴谋，并没有产生怀疑。

反右以后，仍然是马不停蹄，一个劲地搞运动，什么“拔白旗”等等。庐山会议以后，极左思想已经达到了顶点，却偏偏要来一个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识分子一样，尽管天天饥肠辘辘，连半点不满意的想法都没有，更不用说怪话了。连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谁能说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呢？

1966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后连原新北大公社的东语系一个教员都告诉我说，我本来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的。但是，我偏偏发了牛劲，自己跳了出来，终于得到了报应：被抄家，被打，被骂，被批斗，被关进了牛棚，差一点连命都赔上。我当时确曾自怨自艾过。但是现在我却有了另一个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可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渐感到其中有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折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身上毛病不少，缺点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里呢？我当时认识不高，思考问题肤浅片面。我没有责怪任何人，连对发动这一场“革命”的人也毫无责怪之意。我只是一个劲地深挖自己的灵魂。用现在间或用的一个词儿来说，就是“原罪感”。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个词儿，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而已。

别的老知识分子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它表现在我身上却是很具体的。解放前，我认为一切政治都是肮脏的，决心不介入。我并不了解共产党，只是觉得国民党有点糟糕，非垮台不行。解放以后，我上面说到我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收获，其中心就是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肮脏的，共产党就不是。同时又觉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我自己却躲在万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业。我认为自己那一点“学问”，那一点知识，是非常可耻的，如果还算得上“学问”和知识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称自己为“摘桃派”，坐享胜利的果实。

那么，怎么办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发生一次抗日战争，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表现一下。我一定能奋力参战，连牺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我读了很多描绘抗日战争或革命战争的小说，对其中那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不怕牺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我自己

发誓向他们学习。这些当然都是幻想，即使难免有点幼稚可笑，然而却是真诚的。这能够表现出我当时的精神状态。

谈到对领袖的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这位“领袖”，九·一八事件后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见过，他满口谎言，欺骗了我们。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他的诗句：“看花难近最高楼”，可以为证。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回国以后，仅仅隔了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相同，我们那种兴奋、愉快，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当时每年要举行两次游行，庆祝五一和十一，地点都在天安门。每次都是凌晨即起，从沙滩整队步行到东单一带的小胡同里等候，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十点整，大会开始。我们的队伍也要走过天安门前，接受领袖的检阅。当时三座门还没有拆掉。在三座门东边时，根本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一转过三座门，看到领袖了，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声。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我在上面简短地但是真诚地讲了我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一滴水中可以见大海，一粒沙中可以见宇宙。别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同我差不多，至少是大同而小异。这充分证明了中国老知识分子，年轻的更不必说了，是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爱国主义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这是中国

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在梦觉方面智商是相当低的。一直到了十年浩劫，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拥护这一场浩劫的。西谚说：“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在这期间，我接触到派到学校来“支左”的解放军和工人。原来这都是我膜拜的对象。“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深信不疑，奉行唯谨。可是现在一经接触，逐渐发现他们中有的人政策观念奇低，而且作风霸道，个别的人甚至违法乱纪。我头上仿佛泼上了一盆凉水，顿时清醒过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我是明白的。可是这样的作风竟然发生在我素所崇拜的人身上，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们唯物主义者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花言巧语，文过饰非，是绝对不可取的。尽管我们知识分子身上毛病极多，同别人对比一下，难道我真就算是“臭老九”吗？

我在上面啰哩啰嗦讲了一大篇，无非想说，“文化大革命”整知识分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怎样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对广大的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过去。再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说了出来。可是我要问：有这种想法的难道就只有我季羨林一人吗？

这就联系到我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受害者舒愤懑了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回顾过去谈起。解放初期我和其他老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经写了一点，现在再补充一下，补充的主要是从海外归来的游子。远居海外的华侨，亲身感受到解放前后自己处境的剧烈变化。他们深知这一切都与祖国的解放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向爱国的华侨，现在爱国热情蓬勃激荡，为前此所未有。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他们同国内的知识分子一样，看一切都是红艳如玫瑰，光辉似太阳。愿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此外，一些在国外工作和讲学的中国学人，也纷纷放弃了海外一切优厚的生活和研究条件，万里归来，其中就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沉的老舍先生。他们各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认为祖国前程似锦，自己的前途也布满了玫瑰花朵。

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主要借口。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对比何等地鲜明！我亲眼目睹的这种情况可谓多矣。这对我们祖国有多么大的危害，脑筋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会知道的。被迫出国的人，哪一个不是满腔悲愤，再加上满腔离愁，哪一个儿女愿意离开自己的父母！然而他们离开了。

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知识分子，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

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由于每个人都不同的原因，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懑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是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我们不是十分强调安定团结吗？我十分拥护这个提法。没有安定团结，我们的经济很难搞上去，我们的政治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团结。在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还有一肚子气的情况下，真正的安定团结恐怕还难以圆满。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尽管许多知识分子的

愤懑未舒，物质待遇还只能说是非常菲薄，有时难免说些怪话；但是他们的爱国之心未减，“不用扬鞭自奋蹄”。说这样的人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完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却听说有人听了很不舒服。我最近还听说，有一位颇为著名的人物，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说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是帝国主义皮上的毛。这话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但是，可能性并非没有。说这种话的人，还有一点是非之心吗？还有一点“良知”吗？我深深感到忧虑。

如果这样的人再当政，知识分子无噍类矣。

我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

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如果把这个至关紧

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其中当然包括知识分子，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猗欤休哉！

我们既不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真话总比谎话强。其中有恶意的，怀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把一池清水搅混。虽然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毕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从？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为止。

我要啰嗦的也啰嗦完了。

（摘自作者《牛棚杂忆》一书，经作者同意在此发表。题目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 杜 晋）

治疗血液病的新进展

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一种非常难以根治的内科疑难病，据统计，全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患者死于此病。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环境污染（物理、化学）等诸多因素，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且多发于青壮年，危害性很大，一旦患病便一筹莫展，骨髓移植效果虽好，限于医疗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能接受这一高难技术治疗的患者十分有限，患者大多采用长期服用激素治疗，感染用抗生素，严重贫血者需输血。这样治疗虽能暂缓病状，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病人痛苦。

河南康复中心医院血液专科张问津主任，三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再障病的治疗和研究。他将祖国医学与现代医学相结合，吸取众家之精华，经过长期不懈的研究和临床实践，研究总结出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的再障病新疗法。张主任认为：再障病属于中医虚劳、亡血范畴。其出血，感染是由于阴虚生内热，血热妄行等引起。治疗应以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等控制症状；其全血细胞减少则是由于造

血骨髓脂肪化和水谷气血生化之不足所致，治疗以补肾健脾、化瘀生血、行血理气等为基本疗法；达到增强骨髓外脏器造血，改善脂肪化骨髓，重建骨髓造血微环境，增强多功能干细胞活性，恢复自身造血功能，从而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同时张主任还对缺铁性贫血，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慢粒、慢淋等病有深入的研究。几十年来，张主任成功地为全国各地患者解除了痛苦，使他们甩下了长期压在心头的包袱，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

张主任携科室全体人员愿所有血液病患者早日康复。

来诊、来函邮购药物需具备以下资料：近期骨髓象报告单，血常规单及病人目前自觉症状等。

地址：郑州市东风路7号河南康复中心医院血液病科

路线：火车站乘6路汽车到东风路口下车，向西100米路南即到

电话：0371—3940704 邮编：450002

一代师表季羨林

● 张彦

在当代中国有数的几位“学界泰斗”中，北京大学教授季羨林可算是佼佼者。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既有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根基，又具欧洲文化的素养，特别是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几种少有人能识的文字上的权威地位，使其成为“国宝级”人物。治学，他有“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的大师气派。他立论之高超，往往能将一代人引向新的思绪。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他常常是代表着中国、甚至东方高水平的引人注目的人物。

现在，季羨林已是 87 高龄的耄耋老人，却依然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每天清晨四时，他已经开始工作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所完成的工作量，令人难以置信。1997 年，他编完了 24 卷《季羨林文集》，已交付出版社；写了 21 万字的学术回忆录，80 篇散文、序言等作品；接待各种来访 2700 人次；参加了 70 多个会议，还不断到外地大学去讲学。一个已是功成名就年事已高的大学者，为何还如此执着追求？他说：“我现在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

第一次见到季羨林的人，都不免会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竟是令人景仰已久、誉满中外的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季羨林。因为，在外表上，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他中等个子，清癯的面孔，满头银发，永远都是那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这完全是一个普通北方农民的形象。

从农民子弟到学界泰斗

他在辛亥革命那年出生在山东一所破落的农民家庭，终年以高粱煎饼充饥。六岁时，被父亲送到省城济南去投靠叔父。叔父是个自学成才的人，非常喜欢他，决心要好好培养季家的这根独苗，诗书传家，要求极严。上初中后，叔父亲自为他讲课，还出钱让他下课后去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读《左传》、《战国策》、《史记》……晚饭后还要去一个学社学英语。叔父认为，《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都是“闲书”，禁止他看。大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小羨林却偷偷把这类中国旧小说，包括“儿童不宜”的《金瓶梅》，通通看个遍。放学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甚至晚上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总之，在叔父栽培下的这一段学习，毫无疑问为季羨林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一个早期的基础，尤其是从小培养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对于这个可尊敬的叔父，季羨林永远怀着无限感激之情。

上高中时，季羨林很幸运遇上的各科教师大都是出类拔萃的，在课堂上讲的“现代文艺”对他日后的发展颇有影响。同时，他对古典文学也产生了极大兴趣，自学唐宋时代几个著名文学家的作品。这时候，他已开始创作短篇小说，翻译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在报纸上发表。他承认：“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

第一。”由于当时山东还处于德国的“势力范围”，他在此期间也开始学了点德语。

这时正值中国十分动荡不定的时期，封建王朝虽被推翻，接踵而来的却是军阀混战。北伐革命军一度占领了济南，日本军国主义者趁火打劫，出兵酿成了有名的“五三惨案”。在日本人占领济南期间，学校不能开学，季羨林过了一段“临时亡国奴生活”。这在年轻的季羨林的心灵上注入了爱国主义的种子。

1930年，19岁的季羨林同时考上了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决定入清华的西洋文学系，专修德语。然而，大学四年，他受益最大的并不是正课，而是旁听许多名家的讲课中学到不少宝贵的知识。其中，朱光潜教授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教授的“佛教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实际上确定了季羨林后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佛教史、佛教梵语、中亚古代语言研究、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等。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许多散文，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陆续见诸报端。这时，正值国难当头，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铁蹄已经踏上我东三省，蒋介石却还在拼命先“安内”。爱国青年学生群情激愤要求抗日，季羨林曾经参加过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到南京去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同学中的左派对他有过影响，但他自称只能“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

1935年，季羨林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留学生，入哥廷根大学深造，从此开始了对他影响极深的留学生涯。他主修印度学，副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导师瓦尔特施密特(E. WALDSCHMIDT)教授，是当时世界知名的梵文和佛教文献专家。1941年，季羨林获哲学博士学位。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正炽，交通断绝，回国已不可能。于是，他只身滞留，一面在校担任汉语教师，一面进行对吐火罗语、吠陀语和佛教混合梵语的研究工作，写成了好几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在此期间，与国内的邮政亦已断绝，他无限怀念祖国、怀念家庭，以至导致失眠成疾。然而，留德十年中，季羨林在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至今他的一些论文仍作为重

要文献被人引用。直到战争结束以后，他才经过辗转长途跋涉于1946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时年35岁。

从这时候起，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担任新创建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执教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在教学与科研中，他总是勇于探索，不畏艰难，孜孜以求，终于在广阔学术领域内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他曾任北大副校长五年、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还被推选为许多全国性学术研究会的会长，包括东方文化研究会、亚非学会、外国文学学会、敦煌吐鲁番学会、民族文字学会、语言学会，还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与此同时，他还是德国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语词典》顾问，冰岛“吐火罗语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1992年，印度研究梵文的最高学府瓦拉纳西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褒扬奖状”。

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竟成为中国的“学界泰斗”，其奥秘何在？每当遇到这类问题，季羨林总喜欢给人复述鲁迅先生文章里讲过的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集市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包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他不对吗？不行，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没说。我的经验也可以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最足以说明问题的一个事例就是：即使在“文革”中他被惩罚去传达室看门，他也没有浪费一分一秒，而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长达7卷8册。

如今，季羨林这个名字，连一般中学生都知道，因为他的散文已被选入中学教材。但是，要问季羨林究竟是研究什么学问的？是个什么“家”？却难以作出准确的回答，因为他的研究范围太广泛了。一定要问，他曾经开玩笑说自己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如欲知详，只消翻一翻即将出版的24卷800万字的《季羨林文集》的“卷目”，就会为其涉及领域之广、之杂所叹服。然而，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还是集中在“中

西之间”，也就是对从中国、中亚以及南亚这一辽阔地带古代文化和文化交流的研究。敢于涉足这一学术领域的人不多，因为必须首先具备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还需要深厚的国学、佛学及中亚历史的功底。季羨林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至，作为研究东西方文化的权威，他近年来频频发表发人深思的见解。例如，他说：“从人类全部历史上来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从来如此，也决不可能永远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个论点一经提出，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响。因为人们知道，只有像季羨林这样的大师才有资格提出这样重大的预见，而他只是在言之有据、论之有理的前提下才会作出这样的科学论断。

人格的魅力

为祝贺季羨林的85岁寿辰，著名的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她说，她之所以对季教授如此敬爱，不仅是因为他的博学，也不仅是因为他的睿智，更因为他的人格。“他毫不追求权力、财富，或者是被人颂扬。他全身心地献身于他的国家中国和中国人民，还有他的不动摇的忠诚，对我们所有的人来，都是一个榜样。”这短短的几句评语，实际上反映了所有敬重季先生者的共同心声。先生门下弟子何止三千，无不以有此恩师为荣。在他们心目中，恩师不仅教他们如何治学，而且教他们怎样做人。

为了让季羨林身上所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美德得以发扬光大，两年前，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文集《人格的魅力——名人学者谈季羨林》。在这本书里，五十多位诗人、学者、教授、学生、邻居、友人、记者，写下了他们心目中的季羨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自肺腑之言的文章，着重写的大都是他的为人、他的风格、他的品德。

曾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过的女教授耿引曾，永远忘不了“文革”中季羨林对中国通史的错误陈列所表示的“无言的抗议”，那是1972年，

在“革命大批判”声中，中国通史陈列打破一向的王朝体系，不顾历史事实，一改而为“农民起义打头”。为了取得专家的“认可”，特别请了一批有关学者来参与“审查”。当时，季羨林虽已成为“批斗对象”，但鉴于他的学术地位也被请了去，希望以此“礼遇”来换得他的一张“赞成票”。谁知，他除了对中外关系的某些事实错误发表一些意见外，对“农民起义打头”的“革命口号”却有意只字不提，以沉默来表达他对歪曲历史的不满。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过的这一位女教授说，她和她的同事们对季羨林这种坚持真理、不赶潮流、不畏权势的精神敬佩不已。

季羨林的33年老邻居、北大前副校长张学书，对于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生活之俭朴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季先生“住的几间屋子除了书还是书，连一件象样的家具都没有，这两年才买了两个小沙发。房间一直没有装修，墙壁也好久没有粉刷了。（直到今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夕，由于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季教授发现太不象话，学校才赶忙给装修了那间接待客人的屋子，也仅仅是这一间。——作者）说到吃就更简单了，总是粗茶淡饭。但是，他却把节约下来的钱，设立了“季羨林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并以各种形式捐助了文化教育事业。张学书还注意到，季先生家里虽简陋，但却摆满了各种盆花，主人最喜欢君子兰，窗外还栽种了玫瑰、月季、白玉兰。楼前湖里的一池荷花，也是季先生用南方带回来的种子播种的，为他们所在的朗润园增添了幽雅和宁静。张学书认为：“季老爱花，尤其爱君子兰，爱玉兰，爱荷花，是他心灵的反映。人们常说‘文若其人’或‘字若其人’，以我之见，所爱之花也若其人也。”

东北大学的教授彭定安，从季羨林优美散文中领略其文章风采，因而“一向私心以先生为师，自许为‘私淑弟子’”。在他心目中，季羨林真正是个散文家。他的文字“都贯串着一种文如其人的平实素朴的风格韵味，有真挚之情，丰厚深沉，委婉细腻，然而却又深蕴浅露。”他认为，先生的散文“像日常言谈那样平易，然而思想情感与评议又是融会中西思想文化的，语言是经过加工锤炼的，而且，总是透着一种深沉不露的幽默感，这是

文章的吸引力源泉之一。这也是他对人间世事、人情世态参透彻悟后产生的一种思想的曲折而自然的表露。”

但是，季羨林绝不是一个不辨是非的好好先生，他对一切恶人恶事从不姑息迁就，有时甚至甘愿冒生命危险与恶势力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他的表现充分地说明了他性格中嫉恶如仇的一面。运动初期，他仅仅是被认列为“反动学术权威”，受批判，靠边站，本可以过一阵子逍遥日子。但是，当北大的“造反派”以“红色恐怖”统治学校，抄家、打人、骂人、脖子上挂大木牌子、头上戴高帽子，任意侮辱人，甚至用武器杀人。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季羨林再也沉不住气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自己跳出来”反对这种倒行逆施。结果，可想而知，他自己也被关进了“牛棚”，受尽了侮辱和迫害。尽管如此，他并不后悔当年由于“自己跳出来”而引来这场灾难。相反他认为能被关进牛棚目睹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种种丑恶现象，是他“三生有幸”。他有意识地注意观察、思考，并且尽可能把它记下来，记在脑子里或者白纸上。近年来，他吃惊地发现，“文革”过去才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遗忘了！同今天的青年谈“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怀疑你是在讲“天方夜谈”。这样下去，新一代没有思想准备，在气候适宜的时候，如果有人发疯，历史以新的形式重演，不是不可能的。为此，他忧心忡忡。

发人深思的是，季羨林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并非学术著作，而是他的《牛棚杂忆》。这是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如实地对“文革”所作的记录，自始至终句句都是真话。字里行间，激情喷发，但不是为了泄愤，而是希望读者通过回顾真实的往事从中真正吸取教训。在书的扉页上，他用秀丽的小楷书写下了他满怀深情的《祝词》：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今年庆祝北大校庆一百周年时，季羨林在《北大与北大人》一文中，更充分而深情地表达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这种赤诚：

我在北大这样一所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背后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学府，真正是如鱼得水，认为这真正才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身上的优点不多，唯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我将来变成了灰，我的每一个灰粒也都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责任编辑 刘家驹）



蹲“牛棚”时期劳动改造中的季羨林（中，抬筐者）

翁文灏

从秀才到博士

● 吴继路

翁文灏，字咏霓。20年代，曾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代校长。30年代后从政，先后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长、行政院长等职。全国解放前夕去法国，1951年回国，任全国政协委员。他是中国地质启蒙学者之一，创立了燕山运动学说，曾任地质学会会长。他于1971年去世。

13岁，他还是一个孩子，考中了秀才。那是最末一科秀才，延续了千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在新风渐劲的20世纪初被吹垮了。

十年之后，在比利时鲁汶大学，24岁的他获取了博士学位，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博士。

他的名字叫翁文灏，在本世纪中叶，这个名字在科学界、政治界都很显赫。他身上萃集了传统与新潮，中学与西学，最后与最先，而从秀才到博士的负笈求学历程，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观察新旧交替时代学子倚时而变、成长成才的佳例。

浙江鄞县石塘镇翁家，是远近闻名的豪富家族。创业人翁景和，在19世纪后半期，“五口通商”，洋机器洋货蜂拥挤进中国，上海成为重要商埠的情势下，靠买办、包销洋货发了财，因独家经营英国兰团龙牌漂白布的老字号“大丰洋布店”，人称“翁大丰”，驰名沿海内地各大商埠。翁景和的儿子运高中过举人，授内阁中书，成为朝廷要人。可是到了运高的

儿子辈：传洙、传泗，赶上维新时代，兴趣倾向洋务。传洙分家产得到银子二十万两，还有上海年收入几千的一家商铺。跟长辈不同，他爱好绘画、音乐，读新书，买过一艘洋式小火轮，往来宁波上海，惹人注目。人事难得圆满，家境富裕，但夫妻却失和，他妻子余宝玉23岁时愤愤自尽，撒手人寰，留下了一对儿女，儿子刚六岁，小女儿只有两岁。

这个幼龄失母的男孩就是翁文灏。他出生于1889年7月26日，谱名存璋，字永年。在还不太懂事的时候没有了母亲，不是一个悲惨遭遇，孩子的心灵创伤可以想见。可幸的是，此时一位贤淑秀惠的年轻女子来到翁家，她名叫叶秀芬，慈溪人，成为文灏和妹妹的继母。这个出身书香之家知书达理的母亲，对待文灏兄妹温慰慈爱，抚育教养无微不至。她对正在“开蒙”的文灏谆谆嘱咐：

“孩子，你要晓得，你们翁家世代代都是有出息有作为的人。你必得好好用功读书，一心上

进，绝不能给上辈丢脸哟！”

孩子因丧母失慈凝在心头的冰块，被这位继母炽热深厚的关爱完全融化了。小文灏在家塾跟胡谿堂先生读书，念《千字文》、《幼学琼林》，他铭记并且实行母亲的嘱咐，专意用功。

文灏十岁那年，冬季一个月黑夜，石塘翁家大院被包围，枪响人叫，强盗明火执杖打家劫舍来了。他生来第一次感受到惊慌恐怖。漆黑中听到了母亲的声音：“钱，财产，随他们拿，只要人平安”。跟着，他和妹妹被母亲紧紧偎抱，跌跌撞撞出后门，坐乌篷船逃难到了宁波。他们在江北岸的引仙桥货房住了下来。少年文灏深深感到了母亲的明智、沉毅和当机立断的性情。在新家，文灏跟当地名塾师史雋德先生继续读书。当时，母亲接受维新变法的影响，第一个提倡妇女放足。可是因为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她仍然尽力严格督导文灏“上进”，要取得功名。

13岁，文灏求学生涯一道跳龙门的考试临近了。家里人如临



翁文灏博士

战阵。一年来他废寝忘食，赴试那天，仆人提了装文房四宝的篮子和一应食物，陪了文灏早早来到县试院门口，听叫号进了自己的号房做起文章来。那时科举已经不考八股，题目出的是策论。考试时间三天三夜，有如蹲禁闭。好在文灏并没有太重的心理负担，加上少年气盛，才思敏捷，他拿到题目，打罢腹稿，奋笔疾书，一气呵成；第二天誊清，悠然余裕，只等交卷，他在号棚里先休息起来。

考试过后，全家人很紧张，却心照不宣，闭口不谈考试的事，不问答卷的结果。不久，鄞县本年生员科考的结果，在府学门口影壁墙上用黄榜揭示。那一次应试的生员有数万名，府学大门门庭若市，人头攒动。应考的人里有的已经三四十岁，身为人父了；大多也到了十八九岁。谁也没有把貌不惊人的十三岁的文灏放在眼里。大出意料，正是这个小家伙在榜上找到了自己的姓名，他情不自禁地跳脚叫起来，他名列县学附生，是地地道道的秀才了！

翁家大院张灯结彩，庆贺这件喜事。忽然县文书来通报：父母官黄士华知事要接见新科秀才。父亲翁传洙换了簇新礼服，也给儿子戴上崭新的雀顶帽，坐轿子进县衙，在后堂大厅拜见了县知事大人。

“啊，门楣生辉，门楣生辉！”黄大人爱才心殷，为本地异峰突起，冒出一位少年奇才十分兴奋。他把文灏拉到身边，转身从桌上拿起一部带封套的书：

“这部《焚余诗稿》乃家严在世时刻存，我时常披览习诵；现特赠翁公子，只期公子再接再厉，直上青云！”文灏躬身行礼，郑重接下赠书。

第二年秋季，文灏跟两位李姓表兄一道，又参加了三年一度的省府考试，夺取举人名额。文灏毕竟年幼，阅历不足，没有能考

中。回家之后，他拜文声蜚然的石廷燮先生为师，攻读经典，习写策论。但是就在那一年，皇帝颁布了停止科举考试的诏书，自此封建科举制度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有一些被旧习禁锢的读书人，因为废科举断了前途，呼天抢地，如丧考妣。父亲翁传洙对文灏说：“只读旧古董，不知新知识，闭目塞听，画地为牢，中国弄不好要亡国灭种的。世事前行，除旧布新是铁律。你去上海，去上震旦吧！”

当时，著名爱国教育家马相伯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新型大学，取址大山湾，原天文台，命名为“震旦学院”。“震”谐“秦”字音，隐指古华夏，即中国的意思，“旦”为晨光，合起来即“中国的曙光”。文灏遵照父亲指示，来到繁华的大上海。在这个他曾祖父为工厂建商栈的大都市，文灏要飞跃一个文化的新峰峦；此处高瞻远瞩，视界豁然。顺利考上了震旦，文灏和一批立志求新知的青年一起，学习全新的功课：致知（哲学）、象数、形胜（即包括物理、化学、地质、博物等自然科学课程）；学院第一年用汉语上课，第二年后，讲课、对话、答题全部用法语。考试既频繁又严格，仿效法国大学各项制度，学生的被淘汰率非常高。

文灏进震旦求学，对他一生事业与命运是关键一步。在学校由于年纪小，个子不高，又被同学指传为“宁波小秀才”，所以颇引人注目。他心里佩服总教习（校长）马相伯，特别喜欢听他音调铿锵、情词慷慨的训话。

“我堂堂中华，受制于肖小。甲午接战，一败涂地。朝廷军备废弛，外交陵替。一不知公法，二不事制造。欲振兴国族，全靠新人求新知，奋起救国，前赴后继。我与孑民先生（蔡元培）创此震旦，其旨在此，真大望在诸君！”

文灏跟同学好友谈心说：“马

教习的办校宗旨即我辈潜存的人生之目标！”他把志向作为勤奋修习的动力，为了补习外文，他抓紧每一刻零碎时间。功课之外，他还热衷读《新民丛报》，以及严复编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对西方的科学和进步思想他充满钦服和憧憬。他跟学友说：“优胜劣汰，固为宇宙万物法则。我不信有青史五千年的华夏，会永远就这么弱下去，劣下去，败下去。强国强种，匹夫有责啊！”

在震旦读预科的两年，文灏正血气方刚，壮怀激烈，不单在广泛涉猎新知识上，而且在人生观世界观上都给他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如他后来回顾这段学习生活时所表露的自重自豪心情，那是对一生有决定导向作用的时期的礼赞：

“我虽年少知自勉，须扶危弱佐中兴”（翁文灏《蕉园诗稿》）

一个人生难得的机缘，让有志者得展宏图的幸遇，倏然落到了青年翁文灏的面前，浙江籍旅沪学会，争取到官方一笔基金，选拔品学兼优的浙籍学生派往欧美公费留学。两处欲招的留学生只有20名。消息传开，响应者雷动，只沪杭两城报名者竟达五百名！

这是一场紧张激烈、撼人心魄的竞争。主持考试的提学使支恒荣，坐了八抬大轿，一路“肃静”、“回避”，被拥进了杭州府中学堂；各个试场被摩肩接踵的应试考生挤满，从前此处多次乡试举人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热烈场面。一间教室一隅的课桌后，坐着从容上阵应试的翁文灏。第一场考国文，试卷发下来，题目是《礼失而求诸野论》；嘘声叹气的、晕头转向的，望文生义瞎答一气的，考场上比比皆是，文灏一见题便知它是孔子的一个见解，语出于《汉书·艺文志》。古代

热心振兴我国 围棋的金明

● 郝克强

今年二月中旬,正值元宵佳节。在第五届炎黄杯敬老围棋赛场,高兴地看到85岁高龄的金明同志也来参赛了。

他是参赛者中年龄最大的,看上去虽较前清瘦许多,但精神依然矍铄。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一如既往地笑笑说“还好”。他每天上午两场比赛必到,坚持赛完全程,还参加了闭幕发奖仪式。

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后竟传来金老病逝的噩耗。听说他是在睡梦中离开尘世的,走得很安详。

金老是30年代初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历任党政要职。解放后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后任国务院秘书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金老虽然是位大忙人,但他爱好围棋,始终热心围棋事业。他与前国务委员张劲夫是我国高级干部中围棋下得最好的,在围棋爱好者中享有盛名。许多围棋高手都认识他,津津乐道他对围棋事业的支持。60年代他在中南局工作时,对广东、河南等省的围棋集训队颇多关怀;在河北省工作时,又积极支持建立河北省围棋集训队。70年代末他担任了中国围棋协会顾问,对我国围棋赶上日

本、对聂卫平等国手的成长极为关注。

1979年底,新体育杂志社与中国围棋协会联合主办第一届“陈毅杯”老同志围棋赛。金老是积极的策划者和参与者。从此,我得以与金老熟识,并成为他的一名忘年棋友。

金老下棋,总是正襟危坐,从容落子,对棋艺颇有钻研。1985年,旅居日本的一代围棋宗师吴清源应我国围棋协会邀请,第一次回到他阔别半个世纪的北京访问。金老自告奋勇担任陪同,亲自到上海去迎接,向吴大师求教。

金老认为围棋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几千年来历经兴衰,不绝如缕地相传至今。他告诉我,他下围棋竟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学会的。那是1933年至1937年间,他在济南被捕。他向同狱的一位教师难友学了围棋,棋子用剩馒头捏成、晾干,黑子涂上墨,用布画棋盘,就这样一下棋消磨漫长的铁窗时光。

抗日战争爆发后,金明同志被党营救出狱。他在淮海和苏北地区工作时,由于当时新四军领导人陈毅提倡,围棋成为军民的一项文体活动。他与

不少礼仪制度失传了,但民间可能有遗留,可以去访求研究。文灏奋笔疾书,他引古典证今事,洋洋洒洒,议论风生,第一个交了卷。

第二天考数学,第三天考物理、化学;第四天地理、历史;最后一天考外语(英法德语任择一种)国文外的答卷一律用外语,翁文灏过关斩将,所向披靡,他扎实的功课基础保证他考试成绩优异,游刃有余。

不久,录取榜单张贴出

来,20名赴欧洲留学生名榜上,第七名处写着:翁文灏。同时考中者还有两位同窗;胡文耀、孙文耀。三位才子被人们称作“震旦三文”。

“震旦三文”有幸同时出洋西进,赴比利时留学深造。翁文灏选了布鲁塞尔不远处有名的鲁汶大学。考虑到富国强种的急需和长远性,他选学地质学。经过四年多异域刻苦修习,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侯选学位;又经过艰苦

的实习考察,他完成了有独特学术价值的博士论文。论文受到专家重视,载在著名的地质学专刊上。翁文灏13岁考中秀才,到24岁,十年间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飞跃,他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地质学博士。

震旦震旦,文灏文灏,华夏大地,祖国母亲,她正在张开臂膀召唤你,欢迎你!

(责任编辑 洛松)



金明(右二)、聂卫平(右三)与本文作者

陈毅、黄克诚、叶飞、胡立教等新四军领导干部常常对弈。他说陈老总每次到淮海区去，总要找他下棋。解放后，在陈老总家，在北戴河等地，他常与陈老总手谈。

金老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陈老总提倡围棋的最大宏愿就是要赶上日本，我们一定要为实现这一目标奋斗不懈。我与金老的接触中深深感到，这几乎成了他晚年最为关注的一件事。

80年代揭幕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为国人广泛瞩目，尤其得到许多老同志的关怀支持。金老是最为倾心竭力的一位。凡是在北京举行的比赛，他都要亲临观看。每逢聂卫平、马晓春、刘小光等国手上阵出战前夕，他都要我陪他去看望他们，为他们加油打气。我当时是比赛的组织者，并担任中方代表团团长。我把热心而德高望重的金老视为最可信赖的依靠，时常向他汇报情况，征求他的意见，获益匪浅。

打擂台是胜负极严酷的比赛，对棋手的压力很大。那时，我国年轻的围棋骁将虽然不断击败日本九段名手，但仍有一定的恐日自卑心理笼罩棋坛。金老和方毅、张劲夫、廖井丹、唐克、宋季文等老同志，常帮助我棋手解除精神负担，指出日本棋手的包袱重，双方水平差距正在缩小，我方取胜的机会是存在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金老一再要求我方棋手一定要解放思想，破除对日本棋手的迷信，要增强自信心，敢于下出自己的棋。后来的事实证明，中日围棋擂台赛我方连胜三届，聂卫平、江涛久等年轻棋手表现突出，并有超水平发

挥。棋力的提高固然不容忽视，旺盛的士气也是绝对不能低估的。

还记得1985年8月底，当聂卫平在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首次战胜日本两位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和加藤正夫从日本归来时，金老和方毅、唐克、廖井丹等老同志，深夜主动到机场欢迎。当金老同我们握手时，我亲眼看见他眼里挂着泪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他只说了一句：“赢小林光一这盘棋，我憋的气太久了。”

为了备战与日本藤泽秀行这场最后的主将决战，金老毅然主张聂卫平参加新体育杯赛热身，他还亲

自到安庆赛场去为小聂加油。在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又一次看见他流出了热泪。他说，打败藤泽秀行，我们即赢得了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胜利。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棋手在决战中打败日本啊，可以说是陈老总的遗愿得到初步实现。他劝小聂既要战略上藐视，又要战术上重视，要认真准备这场决战，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聂卫平终于击败藤泽秀行，赢得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胜利，接着，又连胜第二届、第三届比赛。在后来风风雨雨，波澜起伏，牵动人心的擂台赛中，金老始终与我们共呼吸，同忧乐。1988年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在聂卫平与赵治勋激战前夕，金老带着小聂家乡深县特产大蜜桃，要我陪他去看望小聂，再一次为他助阵。

金老的心中始终关心着我国围棋事业的振兴，关心着我国围棋后继有人。早在80年代中期，他就和其他老同志一起提出要在少年儿童中培养好苗子。1987年秋，新体育杂志社与大庆市体委合办的又一届中华棋童系列赛事在大庆油田举行。金老不辞辛劳，兴致勃勃地前往观看。这次比赛由当时11岁的常昊和刘菁分别夺得冠亚军。金老特别高兴地为这些小棋手颁奖，勉励他们天天向上。

近几年，常昊等小将脱颖而出，连连击败日本名手，赢得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胜利。每当谈到这些，金老都面带微笑，不乏欣慰之情。

世间最贵是真情。金老在他去世前不久，仍然情牵我们的国手，热望他们奋进啊！

(责任编辑 舒元璋)

乌干达历险追记

● 徐明远

在80年代，人们往往把战乱和乌干达连在一起，甚至称乌干达为“战乱之邦”。我驻乌干达使馆的同志们在那战火纷飞的日日夜夜，为了祖国外交事业，不怕牺牲，团结战斗，较好地完成了战时的各项任务，受到外交部的称赞。

任人唯亲，祸起萧墙

1983年12月，一架乌干达军用直升机，在北部地区失事，乌军参谋长戴维·奥乔克遇难。围绕着谁来继任参谋长，在总统奥博特和乌军司令蒂托·奥凯洛之间展开了一场互不相让的争斗。他们都想借此机会安排自己部族的人充任参谋长这一要职。双方僵持不下，总统奥博特，为缓和矛盾，采取冷处理，曾把参谋长任命一事搁置了一段时间，但是最终还是任命了和他同一部族的史密斯为参谋长。随着新参谋长的任命，总统和乌军司令之间的矛盾，军内部族的矛盾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奥博特的人民大会党内部，为当年的乌干达大选，相互争权夺利的斗争和部族矛盾也在加剧。1985年5月13日，人大党总书记基伦达第一个遭到袭击。当他从政府大楼办公室下楼时，一颗手榴弹突然向他袭来，他年轻，动作快，未能命中。紧接着第二颗手榴弹又向他投去，他又迅速逃脱，幸免于难。此时，我驻乌干达大使馆文化处二秘王丽芸正在政府大楼的教育部办理乌留华学生事务。突如其来

的爆炸声，使整个政府大楼乱作一团。她随着拥挤的人群，从爆炸的烟雾中跑出楼外。接着军警包围了政府大楼，实行戒严。为王丽芸开车的张宝林同志，正在楼前停车场等候，忽听楼内发生爆炸，又见人群涌出，他先迅速把汽车转移到安全地段，然后又冒着危险，越过军警包围圈，回到大楼去接王丽芸，幸好很快相遇，二人便乘车安全返馆。

进入七月，奥博特总统与乔利军官的矛盾趋于公开，全面内战爆发迫在眉睫。

面对严峻的乌干达形势，使馆党委几次召开会议，安排了以紧密观察形势变化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并随时把形势的发展情况及时向全体同志传达，使每个同志心中有数。要求大家“提高警惕，沉着镇静，听从指挥，相互关照”。此前，英、美、法、意等国使馆已将妇幼撤离首都坎帕拉。

7月27日上午11时15分，美国驻乌使馆一秘赫尔利来馆匆匆告诉我：“北方旅昨日南下，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现已逼近首都。赫说，真想不到北方旅行动如此神速。很可能会明天即要攻打坎帕拉。”为了及时掌握情况的变化，我送别赫尔利立即驱车和新华社记者俞跃良进城内实地观察。我使馆与市区为一座名叫科洛洛的小山相隔，我们刚刚绕过科洛洛山，即看到城区上空飘荡着团团烟雾，激烈的枪炮声随之传来。再向前行驶不远，只见前往城

区方向的车辆有的停止，有的转向。不一会儿我才发现，那条通向城区的大道上，只有我开的车在继续向前。正是这时，由城区迎面而来的各种车辆和人群，如潮水般狂奔而出。枪炮声越来越近，子弹在车外呼啸着，与人们的呼号声、汽车的鸣笛声混成一片。路人告知：北方旅打进城来了！

我的汽车前进不得，后退也难。因为对面来的全是惊慌万状急驰而过的车辆，他们只顾逃命，绝不会停车让路的。既然已无法进城，我便冒着撞车的危险，迅速掉转头，加入了回程的车流，并寻机拐入小巷，找了个隐蔽处，停车观察。不一会儿，北方旅的军车也冲了上来。他们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并不停地盲目射击。接着，我停车的前后左右，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便开动汽车向新华分社方向转移。我们路过总理阿里玛迪的官邸时，那里已被北方旅占领。军人们在那里胡乱鸣枪，官邸里外散乱衣物已使这一豪华宅院面貌全非。我们到了新华社，在室内躲避了大约半个小时，外面枪炮声逐渐稀疏。我和新华社记者李炽良同志抓紧此时，各开一车直奔使馆。半个小时前还是那么拥挤混乱的路上，这时变得寂无一人，有的只是那些被毁的车辆和遗弃的尸体，以及乱扔的衣物。我和李炽良的车绕过这些障碍，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使馆。没想到，随着坎帕拉局势的突变，使馆院内也留下了

政变枪炮的斑斑遗痕。炮弹和子弹并不管你外国使馆有外交豁免权而任意“入侵”。树干被炮弹皮削断，树叶散落满地；一些建筑物上弹痕累累。同志们告我，两颗炮弹打进了使馆，其中一颗尚未爆炸，另一颗在距金伯雄大使数米处爆炸。当时，金大使正从食堂回宿舍。行进中，交火甚激，金大使急忙到一墙的拐弯处暂避。这时炮弹爆炸，幸未伤人。

7月27日这天上午，到市区观察情况的还有一秘曹乃琪同志。当他开车进入市区时，迎面开来一长队满载军人的卡车。开始时，人们还以为是政府军调防。突然间，军车上的士兵用冲锋枪向有奥博特总统像的宣传画扫射，人们这才惊慌地大叫“北方旅来了！”繁华的市区顿时混乱不堪，随之枪炮齐鸣，人们争相逃命。北方旅立即向电台、电视台和政府所在地的国际会议中心以及分散在各处的政府要员官邸发起攻击。曹乃琪的车子则不由自主地随着车流朝一个方向奔驰。他在市郊停了下来，进入一家小铺静观变化，并找到电话，把情况报告给大使。下午一时。当他看到有人为庆祝北方旅政变成功而载歌载舞时，他才开车绕道回到使馆。这时，使馆汇集了各方面得到的消息，立即把“北方旅政变得手，奥博特总统已于当日经东部出境逃往肯尼亚”这一重要情况及时报告给了国内。

政变这天，我馆还有张宝林同志，开车去东部我国援建的奇奔巴农场买大米，为馆内作战时储备。他返馆途中，正遇上由坎帕拉向东败退的政府军散兵游勇。一路上，他遇到了散兵游勇们制造的种种麻烦和危险，他都沉着镇静，以适当方法把他们对付过去。有一批散兵，用枪口对着小张，一定要抢走汽车，小张就是不交车钥匙，并向他们再三解释使馆车不能抢。散兵抢车不行，又向小张敲诈钱。他机智地从衣兜里翻出一张用过的飞机票。散兵们可能

以为是一张银行支票，便抢了过去，如获至宝地端详了一阵子，摆手把他放了。小张驰近坎帕拉地区时，又遇到了三五成群的北方旅的岗哨，严密盘查进城车辆，多少车辆被强迫征用。当北方旅的士兵要征用小张开的汽车时，他又费了不少口舌，最后商定让几个士兵乘小张的汽车进城。北方旅士兵上车后，倒是为小张进城提供了方便。遇到岗哨便发出他们自己明白的口令和暗号，使宝林的汽车一路上通行无阻。他把那些士兵带进城里，自己也安全返回了使馆。

坎帕拉惨遭洗劫 我人员同舟共济

7月27日政变的枪声自上午11时打响，至下午2时暂停。说来也怪，那天晚上10点钟前，坎帕拉变的死一样沉寂。往夜那些狼嚎般的狗吠和汽车鸣笛的喧闹一扫而光。但是，当夜10时10分，像统一执行了开火命令似的，整个坎帕拉沸腾了。那密集的枪声，犹如狂风暴雨；闷雷般的大炮射击声，剧烈的爆炸声，使人惊心动魄。我们使馆坐落在一座山坡上，几座建筑物呈梯形布局。由于没任何地下室，我们不得不组织大家从高处向较低矮的部位转移，全部集中在比较隐蔽的四号楼底层。大家靠墙坐着或卧在地板上过夜。第二天清晨，枪声渐稀，大家小心地走出室外，看到使馆院内不少门窗的玻璃被打得粉碎。由于停水断电，使馆里的汽油、水、粮食及蔬菜的储存有限，我们不得不从长计议，采取措施节约用水、油和食品。水箱存水只作饮用，洗澡暂停。每日三餐改为两餐。同志们决心同舟共济，度过难关。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了十余日。

7月28日，为了观察城内动向，并前往南郊看望我国在制冰厂的援外人员，我和经济参赞陈子斌

陪同金伯雄大使，在时紧时疏的枪声中乘坐挂着国旗的汽车出了使馆。一路是荷枪实弹的军人，没有行人。几乎所有路口，都有临时的战斗工事，架着轻重机枪和高射炮。途中不时看到被毁的汽车，被烧的房屋，被砸的商店。前政府机关和要员的官邸更是作为重要对象而被洗劫一空。

政变第四天，7月30日，政变当局宣布组成了以乌军司令蒂托·奥凯洛为国家元首的军政府，并于当日在议会大厦前举行宣誓就职典礼。议会大厦周围布满层层岗哨，周围的高层建筑物和制高点上都架着重机枪和高射炮。因为谣传逃跑的前总统奥博特要派飞机来轰炸。各级官员和应邀观礼的外交使节、外国记者被安排在大厦门前的石阶上。金大使和我出席了这次为时两小时的典礼。幸好，没有发生任何枪击事件，更无飞机来轰炸，坎帕拉安全度过了这一次政权更替的戏剧性时刻。

水火难容内战再起

北方旅取得政权并组成军政府之后，即提出了和平、团结、和解的号召，并于8月10日释放了120名前政府关押的政治犯。当时，乌境内有大大小小的六派武装，经过几番努力，五派武装（包括阿明残部）均和军政府达成和解，被编入新的政府军。只有抵抗运动仍在进行战斗，并趁北方旅政变后脚跟未稳，从西部的根据地发起攻势。几天工夫，占领了乌干达三分之一的国土。这时，双方虽都表示和谈愿望，并经多次会谈，终于在12月17日达成和平协议，但此期间，军政府和抵抗运动交火不断，首都坎帕拉仍处于战时状态，时常出现爆炸或“抵运”进城的谣言，市民惶恐不安，正常生活被打乱。后来知道，“抵运”方面有不少十岁左右的孩子兵，伪装成乞丐或学生，混进首都，或投掷炸弹，或传

播谣言,闹得军政府不得安宁。“抵运”在进行心理战的同时,没有停止过进攻城镇。由于“抵运”部队士气高涨,战斗力强,又纪律严明,深得人民拥护,到11月份已经攻占了国土的一半。进入12月,“抵运”的地下人员在坎帕拉的活动几乎接近公开,他们对军政府在首都的布防,搞得一清二楚。1986年元旦刚过,在首都以西约50公里的重镇米地亚那,双方发生了激战。接着“抵运”部队逼近坎帕拉,恰在这时,有一班信使抵达使馆。根据形势分析,坎市战斗在即,届时国际机场必将关闭。如按原定行程,必将误期,且对我信使文件带来严重威胁。经向外交部报告,当机立断,于1月24日由陆路送信使经东部边界出境去肯尼亚。我们调查了一路近二百公里的安全情况,出发前又派车到市近郊探路,金伯雄大使向负责护送的王云翔、曹乃琪、高连瑞等同志就途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和采取的措施,作了具体的交待。出发时,四辆小车挂了国旗,直向东部驰去。就在信使安全离开坎帕拉抵达内罗毕的当天夜里,坎帕拉又陷入战火,停水断电、交通、通讯全部中断。但我们也松了一口气,信使和信使文件总算提前脱离险境了。

奇奔巴战时显神威 保健康设法清腐尸

每次当地发生政变,作为大使馆,我们不仅安排部署使馆的安全,还要把在乌干达的五个单位一百余援外和经济合作人员的安全安排妥当,并不断给以关心。1月26日,抵抗军攻城后第二天,金大使由王善玉参赞和我陪同乘车先就近看望制冰厂和四川国际经济合作公司的同志们。我们是政变后第一批外出的,也是使馆第一批见到抵抗军的。只见他们一个个的右臂衣袖被脱下,斜塞在腰间。据说,这是攻城

部队的标志。一路之上,给我们的印象是,抵抗军纪律严明,名不虚传。不论公私财产,一律秋毫无犯。这和半年前北方旅政变时疯狂的抢劫,截然不同。我们慰问了在首都的援外和经济合作人员后,还需到150公里外的奇奔巴农场,多禾水稻技术组和金贾医疗队去看望同志们。出了首都约20公里处,忽见迎面一白人驾车急驰而来,并匆匆告知:散兵正在前方的小镇洗劫。于是,所有东行车辆掉头回奔,我们也只好返回首都。第二天,我们再次前往金贾和奇奔巴。出城30公里,沿途不断出现被打坏的汽车和尸体。我们在小镇上遇到约一个排的士兵,示意停车盘查。因他们不懂英文,我们也不会乌干达语,拿出外交官身份证,他们也看不懂,硬是不让我们通过。正当双方因语言不通犯难时,蓦然间,不知什么灵感促使我们几个人从嘴里蹦出了三个字:“奇奔巴”。这还真灵,只见那些威武的抵抗军战士,马上一个个满面春风,非常友好地挥手放行,有的还向我们举手敬礼。这时我们也乐了。中国援建的奇奔巴农场在乌干达的名气和影响之大,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万

万没有料到,在战乱期间的关键时刻,奇奔巴的名字,比外交官身份证的作用还要大。

抵抗军攻克坎帕拉后,许多天市区内外还留有战斗的创伤。就在我们使馆附近有两具无人认领的尸体。一具紧靠我使馆的储水箱;另一具离我馆宿舍数米,离食堂仅二十余米。在赤道骄阳暴晒之下的尸体,早已腐烂不堪,臭气冲天,苍蝇成堆。如等待军方收尸,还不知要等多少时日;如找政府,又是刚刚政变,无政府可找。正当使馆领导为此商议处理办法时,商务处三秘姚忠同志挺身而出,同雇来的当地人一起,好不容易才把腐尸清除掉,给全馆同志消除了一块心理负担,保护了大家的健康。

我离开乌干达已经多年了,但乌干达的富饶和美丽,人民的善良和友好,却依然记忆犹新。曾被称为“非洲的明珠”的乌干达,70年代以来战乱的频繁,使这颗明珠变得暗淡无光。1986年1月“抵运”取得政权后,局势逐步稳定下来,“非洲的明珠”正在恢复她的光芒。

(责任编辑 文 贤)



乌干达农村习俗:有酒同饮

杨朔离去 留冤魂

● 韩毓丽



杨朔在朝鲜

我的二舅杨朔死于1968年8月3日一个暴风雨的夜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但是这一夜我和母亲都几乎彻夜未眠，我们期望着，期望着他能有一线生机。天亮时传来了他夜里辞世的消息，近在咫尺却无法相救，甚至说不上一句安慰的话。悲愤、无奈之情难以形容。多少年来他的死象恶梦般压在我的心头……。

前些年我有机会去美国，参观了华盛顿图书馆。据说这是世界上藏书最全的图书馆之一。我带着好奇，试着请管理人员替我找一找是否有杨朔的作品，哪想到他一下子为我查出了三十多本，其中不仅有他早期的作品，甚至还有抗美援朝时期的作品，如《三千里江山》。我的心为之一动，脱口而出说：“讲朝鲜战争的故事，你们也都保存吗？”那人说：“杨朔是世界著名作家，我们不管他的政治观点。”那人绝不会料到，他这样一句口气平

常的回话，竟会惹起我心中波涛般的翻滚。其它国家的人民尚且如此珍惜他的作品，而在“文革”时代，在那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却连他本人也容不下呢？我和我的丈夫马甲都是在杨朔身边成长起来的，我们更有责任为民族、为后代、为中国文学史，留下杨朔辞世前的一些真实情况。

“文革”初期对杨朔的冲击主要是他单位的造反派。到1968年初，杨朔已经“站出来工作”了，一天，他到小牌坊胡同化工部宿舍来看我们。舅舅还买了些水果给我女儿。可惜我不在家，休假在家的马甲告诉我：舅舅身体不好，但情绪、精神尚佳。

到6月份马甲从三线回来去看望他时，他已经搬进一黄姓人家，因说话不方便，他便在所在单位亚非和平理事会（简称“和大”）的街口等马甲，在马路上，说了一会儿话。他告诉马甲

他遇到耿彪同志，互相说“老了，经不起折腾了”，又告诉了一些家务事。到7月中旬，马甲出差路过北京，又去看他。人没有找见，却引来“与杨朔什么关系”的追问。马甲感到情形不妙，就背着小女儿在台基厂“和大”路上等舅舅，等了几个小时也没等到。马甲刚走没几天，我女儿发烧，我送她到医院输液，两天没有回家。回来后邻居王兰翠家的老妈妈告诉我，头天二舅在她家等我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我想一定有急事，急忙去探听，舅舅这时已被隔离反省了。我不明白这时各单位已进驻军代表了，怎么又整起人来？

据说要审查他的历史。自从他走上革命道路，总是战斗在第一线。抗日战争中，他在前线。外婆与舅妈（杨朔原配夫人抗战胜利前病逝）多年不知他的消息。她们很喜欢我，为解思念之苦，在我只有八个月的时候，就把我抱养在身边。我小的时候

候没有见过舅舅，只是听外婆说，家里卖掉部分家产支持他去投身抗日，组建了北雁出版社，后来他去了抗日前线。他那时所经历的生活，所参加的斗争，最早还是从他送给我们的短篇小说集《大旗》中了解到的。《月黑夜》里的老村长；《霜天》中的农村妇女妞子；《麦子黄时》中的农民狗剩一家都是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普通而又伟大的人物。

1945年冬，杨朔舅舅陪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来到宣化庞家堡龙烟铁矿参观访问，尔后便留下来体验生活。在这里他认识了只有11岁的童工马甲，马甲的父亲是位老矿工，也是老抗日游击队员。舅舅喜欢马甲，与他们一家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一年舅舅一边参加刘冬同志领导的反对封建把头的斗争与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等工作，一边写出了中篇小说《红石山》。书中人物胡金海的原型便是龙烟铁矿著名的英雄人物何金海。至今龙烟铁矿的老工人不仅怀念何金海，也常常怀念杨朔舅舅。舅舅在世时，矿山上的老领导、老工人都是家里的常客。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了。舅舅带着马甲去晋察冀前线，做为一名新华社随军记者活跃在战斗的第一线，他们从宣化出来，坐在《晋察冀日报》拉设备的汽车上，舅舅曾被电线绕住了脖子，差一点送命。关外的深秋已经很冷，路上飘起了雪花，二人只穿着单衣，车到涞源，都要冻僵了。从涞源出发，一路大部分时间是步行，翻山越岭，途径易



杨朔(右)与马甲在宣化

县、涞水，千辛万苦才到了河间冀中导报社落脚，并以此为基地去各战地采访。这时才有了马匹和枪(后来知道枪是杜导正同志所赠)。马甲和舅舅是单独行动，哪里战斗激烈就到哪里去。攻打正定、清风店战役及解放石家庄等，他们都是随着第一梯队冲向火线。在甲家湾战斗中，他们与战士们一道坚守炮兵阵地一昼夜，靠喝水坑里的污水止渴……战斗过后，战士们休息了，舅舅更忙，他要采访，找战士谈话，还要找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谈话，然后，要将采集的情况汇总整理，或写出新闻通讯发表，或写成简报报告上级。整个解放战争中，舅舅活跃在战场上，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

1948年天津解放后，我与母亲住在天津，看到“天津日报”上有一篇舅舅的文章《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当时只有10岁的我，奉母之命前往报社，留下我

们的地址，舅舅才找到我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舅舅，他高个头，文雅而又充满活力。

新中国成立后，舅舅是全国铁路总工会写作班子负责人，他带着马背上东北、去南方、深入到工人阶级中体验生活。这段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有《北黑线》，写的是东北铁路工人为支援全国解放，克服种种困难修复铁路的故事。也就在这时，他接来了外婆和我，在北京史家胡同铁道部宿舍安下了家。在这里我过得很快活，一直住到1955年他从朝鲜归来。这里来过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丁玲、康濯、菡子，而印象最深的是与舅舅同在一个写作班子的关露阿姨，她爱孩子，帮助我种花，给马甲补衣服，送给我一本她写的儿童作品《苹果园的故事》，和舅舅一样叫马甲是“小鬼”，叫我是“小丫头”。那时还有一个阿姨，是舅舅的女朋友，一所大学的教师，她待人亲切，相貌文静，对舅舅特

别好，马甲经常给他们来回传信，看样子好像要准备结婚了。可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舅舅做为新华社特约记者又要上前线了。外婆希望他结了婚再走，可他说：“不好，万一自己‘光荣’了，让人家当寡妇。”马甲剃了光头，闹着要跟他去朝鲜，他却坚决不同意。他说马甲是个苦孩子，跟他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了，该叫他补习功课，进学校学习，照顾这个家。

舅舅在朝鲜的几年中，我和外婆天天挂念着他。朝鲜战场紧张激烈时，外婆就彻夜不眠，直到舅舅的文章见了报，才放下心来，因为知道他活着。曾被中学语文选作教材的《平常的人》，就是这一时期他从朝鲜战场发回来的。

舅舅一去就是四、五年，从朝鲜归来，那位与舅舅要好的阿姨也成了家。他打算再下去写工人，便和学习毕业的马甲又去了龙烟铁矿深入生活，准备写《红石山》第二部。这时中央一个电话，将他召回了北京，周总理派他去亚非拉作外交工作，从此舅舅便常年在海外。我在天津大学上学时，他经常自国外给我和马甲写信，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信中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祖国、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这一时期，他利用外交工作之余，写了不少散文，文章中到处洋溢着那份对祖国、人民真诚的爱。在散文《茶花赋》中，开头就说他想画一张画，画出祖国河山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

在十年动乱的年代里，我还是个参加工作不几年的年轻人，怎么也理解不了斗争的复杂

性。我认为舅舅不可能有历史问题，等几天就会出来。于是我照样在实验室里做我的科研，突然家里来了电话，说他在北京医院病危，我急忙赶去，门口却不让进。这时出来两个人，一个又高又黑；一个矮个白脸；矮个儿粗暴地说：“他是自杀，不许看，他有历史问题。”我坚持要进去，高个儿那人态度较温和地说：“看也没用，他昏迷着。”我认定舅舅不会有历史问题，也许是给打昏了呢！我还是想冲进去、溜进去，传达室出来一个人把我揪了出去。捱到天黑，我也没能进入病房。传来却是他去世的消息，此时我已经是昏头胀脑，呆痴了一般。

舅舅到底犯了什么罪？当时天安门及“和大”门口的大标语写的是“打倒三反分子杨朔”。“打倒丁陈反党集团的黑干将杨朔”。我忙跑到舅舅家。老保姆常大娘告诉我“和大”两个人押舅舅回家来拿东西，并把他的书摔在地上说：“这是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舅舅当时脸色苍白，走时对其弟杨毓玮的二女儿说：“告诉你爸爸妈妈，我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常大娘是如此悲愤，痛心地说“就这样这个入就没有了吗？”就这样一夜之间，与我们曾朝夕相处的杨朔舅舅离开了人间。我从三线叫回马甲。他不吃不睡，一个星期中竟生出了白发。在枪林弹雨中，他曾全身心地保护了舅舅的安全，而在和平环境中舅舅却倒下了，而他却无能为力，这怎能叫他不伤心呢？！

后来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舅舅杨朔临死前的情况：

那天批斗他，说他有历史问

题，说他反党，是丁陈反党集团的黑干将，他回答说：“我爱党还爱不过来呢，怎么能反党呢？”斗到最后，他的身体已支持不住了，说“你们要折腾死我了！”为这一句话又多斗了一个小时。下午又押他回家取他的作品，以便进行批斗。也就在这时，杨朔舅舅拿走了安眠药。晚上九点钟，他写条子要求与军代表谈话，说他不是丁陈反党集团的人，但是在与这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犯了错误，军代表对此并没理会。半夜12点钟，他洗了一个澡后在隔离室伏在桌子上昏迷过去，桌上的纸上写了一句话：“我是个犯错误的干部。”估计他是在洗澡前后服下大量安眠药的。

多少年来我总是天真地想：如果那晚我在家，能了解到杨朔舅舅处境的困难，我也许能想法把他藏起来、救出来。可是时间就这样错了位，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啊，舅舅！您临危之际来找我，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有什么话要对马甲说，是要诉说您的委屈、愤怒、还是要说外婆的安排，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秘密，这全成了千古之谜。多少年来，我真希望有灵魂，总希望舅舅能来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但是常人我梦中的舅舅却总是忽隐忽现，找得我好累啊！

到底为什么要重点审查杨朔舅舅，他去世后专案组几次通过派出所把我母亲叫去问来问去地审查舅舅的历史。舅舅单位也有人找到我们家，叫马甲交待杨朔在国外有什么特务活动。战士出身的马甲瞪起眼来回答：“他是中央派出的，我怎么知道。”

舅舅突然走了，我和马甲一直心中不安。1972年我们在邯郸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小家之后，就开始给周总理写信，说杨朔死得不明，我们作为他身边长大的外甥女和外甥女婿，要求总理过问此事。两个多月后接到“和大”回信，内容如下：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五日你给周总理的信已转到我会。现将杨朔同志自杀经过和审查结论转告与你：

一九六八年春，我会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杨朔被当作重点进行审查。同年七月二十三日，部分群众把他隔离起来，并进行小会批斗。七月卅一日，他看到在“和大”院内地上写出“打倒丁陈反党集团黑干将杨朔”的大标语后，表示不安，遂当夜服安眠药自杀。经送北京医院抢救无效，于同年八月三日身死。”

经审查，杨朔历史是清楚的。他参加革命三十年来表现基本是好的。但由于其世界观未很好改造，在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而自杀身死，决定以政治错误结论。

此复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革命领导小组(章)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经查明此结论是1972年8月17日经中共中央外交部核心小组审干组审批下来的。

舅舅到底为什么自杀？真的是他“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呢，还是因为受严酷迫害，而以死抗争呢？1974年我趁回京治病之机，在朋友的帮助下，得以看到了杨朔的病历。请看我的摘录：

1968年5月3日，低烧37.8℃，

医生开病假，半日工作两周，机关来人谈过，如病情可能，要求其上全班，（这是）运动需要。

1968年6月4日，仍低烧37.5℃，单位来人联系：本人未报名参加下乡收麦。如本人提出要求请假，则不予考虑。

1968年8月1日，机关送来患者，现被隔离交待，中午回家取东西后，夜间12点洗澡，1点钟发现叫不醒。肺部正常，诊断为眠尔通及巴比妥中毒。

1968年8月3日，肺部锣音加重增多，体温上升，8月3日夜里10点40分，呼吸困难，突然停止呼吸。

从病历记录看出，舅舅长时间忍受着“运动”与“疾病”的折磨，如此虚弱的身体，还要求必须参加“运动”及强体力劳动；医生要不要开假条，还要由医院外的某些人来定，这不是迫害是什么？

我认为舅舅是怀着极大的悲愤自杀的。关于他对“自杀”的看法，有两件事可以告诉大家。一是我的母亲曾为忍受不了婆家的封建礼教，自杀遇救。事后满城风雨，母亲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这时舅舅从延安来信，信中说：“小妹有勇气，敢于以死反抗封建礼教，了不起。快到延安来吧。”肯定了我母亲的斗争精神。另一件事是在我上中学时曾与杨朔舅舅讨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时，我问他：“这么富有激情的坚定的

革命者为什么要自杀？”他说我还太小，不懂，说那时有个团伙，在马雅可夫斯基周围破坏他的名声，贬毁他的作品，他只能以死反抗……

杨朔舅舅就这样，也是在尊严被肆意凌辱的情况下，选择了以自杀来反抗残酷迫害这条路的。

舅舅走了，给我们留下的是无法报答的爱，我们真不知还能为他做些什么。他没有骨灰，我们把他延安时代的自制军毯，与外祖母的骨灰埋进家乡的大地。宣化龙烟铁矿——红石山这座古老的苍山，它曾是解放区第一座矿山，为抗日战争，为新中国的解放与建设贡献了它一切的财富。如果有一天这里变成展览馆或旅游点，我将把舅舅装文件的马褡子、军用饭盒送到那里。我知道那是舅舅心爱的地方。

杨朔舅舅曾在散文《荔枝蜜》中赞扬那辛勤的小蜜蜂，当为人类贡献了一切之后，不麻烦任何人，默默地死去。我曾想当舅舅选择了“死时”，是否也这样想过呢？

1980年，我和马甲又一次写信给中央，给胡耀邦同志，要求为杨朔召开追悼会，让所有家属参加。1980年9月15日，召开了所有亲属参加的追悼会。在悼词中重新确定杨朔同志是被迫害致死，并肯定了他对革命的贡献。我站在杨朔生前的战友当中痛哭了一场，过后，心头久久萦绕着这八个字：壮哉诗魂，悲哉冤魂！

（责任编辑 洛松）

白石弟子篆刻家刘淑度

● 牛欣芳

我国第一位女篆刻家刘淑度女士，离开我们已有十二年了。她生前刻的最后一方章，是“牛耕之印”。牛耕系我的笔名，每当我整理旧物或用这枚章的时候，总要想起这位老人。

刘淑度名师仪，山东德州人，父亲是工程技术人员，祖父是个老秀才，家里有不少字画。耳濡目染，她对字画发生了兴趣，尤其喜爱画中的印章，虽然还是个孩子，有时一看就是一二小时，祖父喜爱孙女，发现她有这个爱好，更是高兴，于是给她买了刻刀石章，给她讲解篆字笔画，这是她从事篆刻的开始。

她1925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老师有钱玄月、董鲁安等人。恰好钱、董都是篆刻行家，在师生关系上又多了一层共同的爱好，于是向她讲述篆刻渊源，介绍有关的篆刻书籍。渐渐地老师们发现刘淑度的刀法近于白石老人时，便建议她拜白石老人为师。当时白石老人已年过七旬，自从收于非闾这位弟子后，已宣布不再收弟子了。但是白石老人看了刘的作品之后，又欣然接纳了这个学生。

有了白石老人的指导，刘淑度学习更加刻苦，进步非常之快。白石老人经常表扬这位弟子，“刀法大方，朱文印，即吾之作，不过如此而已”，白石先生为刘淑度女士印谱作的序言中说：“从来篆刻之盛，本属士夫……门人刘淑度女士……篆法刀工无女儿气，殊为

特书也。”1934年第二期的文学季刊上有陈汉第、顾颉刚、黎锦熙、朱自清、董鲁安、郭绍虞、许地山、俞平伯、叶圣陶等人联合签名推荐刘女士篆刻的文字，称她的篆刻“铁笔刚劲，深得齐白石翁之传”。琉璃厂的清秘阁挂出了刘淑度的笔单。但并不是有钱刘淑度就给刻印，她公开提出两不刻。“非其文不刻；非其人不可”。即文的内容不好不刻；人的品德不好不刻。清秘阁虽按笔单收来刻章客户，由于有这两不刻，退回者居多。但对朋友邻居，只要提出刻章的希求，有求必应，甚至不求也应。她住西城大茶叶胡同时，同院东厢房邻居是一个工人，一天正好来了汇款单，当时规定收汇款单必须盖章，签字也不行。而这位工人哪里有图章？正犯难时，刘淑度告诉送汇款单的人：“你明天再来一趟，他就有图章了。”刘淑度找出一块石头，便为这位工人刻了一枚图章。她有个脾气，不论给谁刻章，名人也好，普通人也罢，都是一丝不苟，从不凑合。她曾为鲁迅刻鲁迅，旅隼两章，为郑振铎、周建人、冰心、叶圣陶等都刻过章。

我认识刘淑度老人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调到《红旗》杂志当编辑的时候，刘淑度的得意弟子闫静石，经常谈起刘老师。他钦佩老师的人格，也同情她的境遇，就成了我们闲谈的话题。闫静石告诉我，解放以后刘老师去南京教书，突患中风，右半身行动困

难，只好病休。北京是她的第二故乡，她思念北京心切，1958年她已是65岁高龄了，办了退休手续，回到北京。在北京连个住处也没有，只好借住在外甥女家中。她以学习篆刻的精神，锻炼身体，她坚信有志必成。苍天不负苦心人，居然她又能握刀篆刻了。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忽拉起来了，外甥女家被“扫地出门”，刘老师也就没有了栖身之所。刘老师在南京时的一位好朋友王庆淑，伸出了友谊之手，把住锅炉工的房子腾出来，供她使用。

“文化大革命”多数人都都在惶恐之中，所有和文化沾边的东西几乎都成了“四旧”，篆刻更没有了地位。刘淑度一生独身，有限的退休金开始能维持自己生活，还能请一个保姆，随着以后物价的上涨，保姆也请不起了。

多亏了闫静石这位大弟子，他虽也生活拮据，经济上帮不了老师的忙，但他的妻子李漾代丈夫去照顾刘老师。李

漾下班以后帮刘老师买菜、做饭、洗衣。俨然亲生儿女一般。

其实，她若想改变经济上的困难是容易的。他和著名画家李苦禅，既是山东同乡，又是同学和至交。李苦禅先生曾为刘淑度作过许多画，只要卖一些画，生活条件马上就会改观。不少人出高价要买这些画，但刘老师宁可受穷，坚持不卖朋友送的画。刘老师逝世之后，按她的遗嘱，画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奖金捐给了德州儿童福利会，此乃后话。

我很同情刘老师的境况，也崇敬她的为人，1982年《红旗》杂志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40周年，准备发表一系列文章。我当时是红旗出版社的主编，提出发表几方刘淑度印章的建议，立刻得到了有关负责人的首肯。刘淑度身体羸弱，经常卧床，只好先找闫静石商量。我认为发表她旧作的同时，还需有现实意义的新作。请闫静石转告。大约两三天，闫静石告诉我，

刘老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而且已经动手治印了。

1982年第10期《红旗》封三，发表了整页刘淑度七方印章选登，除新刻的“绿化祖国”和“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外，尚有“鲁迅”、“旅隼”、“勿以善小而不为”、“清风劲节”、“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并附有简单介绍，“八十四岁的刘淑度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女篆刻艺术家。她的篆刻章法严谨，浑然一体，深得汉印神韵。”

闫静石告诉我，刘老师看到《红旗》发表的作品和对她的简介，非常高兴，说这是对她一生劳作的肯定，她高兴得像个孩子，马上拣了一方石头，很快刻下了送给我的印章，还落上边款“壬戌夏仲刘淑度”

刘老师的身体继续走着下坡路，尔后就再也没有拿起刻刀了。

(责任编辑 吴 思)

本 刊 启 事

凡延误订阅的读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邮购，每期定价4.80元。补购季度、半年、全年均可。

本刊现仅有1997年合订本（精装每套54元，简装每套49元）及少量1996年合

订本（精装每套52元，简装每套49元。）创刊至1995年历年合订本早已告罄，欲补单刊者，请来函说明所缺期号，若有存书当即寄去。以上均免收邮寄费。

另，本刊自1994年——

1997年每年出学术增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一册，1至4期均有存书，每册包括邮费9元，欲购请直接汇款。

本刊地址：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6407.2452 或 64031144 转 2004

联系人：谷世章

挣扎奋斗 不肯倒下的白薇

● 白 岩



白薇总算是一个不肯倒下去，而在长期挣扎中奋斗的一个女性，多年来也是在我们影响下的一个朋友……

——摘自邓颖超 1949 年 12 月 17 日给周扬的信

在 30 年代的文坛上，曾以《打出幽灵塔》、《革命神受难》、《炸弹与征鸟》等作品闪过光、发过亮的女作家白薇，于 1987 年 8 月 27 日走完她 94 年的人生历程。她抗争的一生、追求光明的一生留给人们无限的怀念与崇敬。

白薇自幼就喜欢读书，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常常在课余时间翻看父亲的藏书，每当看到威武悲壮的故事就肃然起敬，看到正气凛然、刑场就义的情景就为之悲伤流泪。有一天，她翻看一本《法国革命史》，读到法国 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走上断头台的章节时，禁不住流下同情的眼泪。此后她凭臆想画了一幅穿白衣、披长发的妇人像，视为罗兰夫人。一天傍晚，母亲四处找她吃饭不见，最后找到空楼上，无意中掀开一只大甌的盖子，发现白薇正襟危

坐在甌底，手捧画像在默念、抽泣。白薇幼小的心灵中，已深深埋下了爱憎分明、崇尚正义的种子。

白薇一生坎坷，她在少女时期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而冲破重重阻力只身东渡日本谋生。在异国漂泊 9 年，贫病交加，受尽屈辱。她曾在英国传教士家里栽花、除草、打扫教堂；也曾在美国人家里当过佣人，喂兔子、烧饭、洗尿布、擦皮鞋，从早忙到晚，吃不饱饭，人瘦得皮包骨。她当过咖啡馆的女招待，后发现老板对她存有歹心，愤然离开咖啡馆。在那漫漫的黑夜里，她曾徜徉在郊外的铁路上、大海边，面对冰冷的现实，她终于没有绝望，她决心要走一条抗争的人生之路。她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在码头一担担挑着从轮船卸下的货物。她边挑货物边学日语，终于以优异的成绩

考取了东京的女子最高学府——女子师范。

她学的是生物，飞鸟走兽，形形色色的自然界，给了她许多欢乐。然而显微镜、手术刀不能解剖人类社会。有一天，田汉先生辅导她学英文，课文是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剧中通过女主人公娜拉和她丈夫的家庭生活，揭露了资产阶级婚姻及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当娜拉认识到自己的玩偶地位时，便毅然地出走了。

白薇静静地聆听着田汉先生讲的课文，她的心颤栗了：她不正是从封建势力桎梏下挣脱出来的娜拉吗？在日本的下层社会里，她所遭受的苦难和凌辱，更加深了她对富人的愤恨，对穷人的同情。她终于找到了一种武器，解剖人生的不平，解剖人类的痛苦。她的心像爆发的火山，反抗的烈

焰冲冒出来，“我要学文学”，“我要宣战”。从此，她和文学结了缘。

她如饥似渴地读着一本本世界文学名著。三个月后，她的处女作三幕剧《苏斐》问世了。这是一出反映追求爱情、揭露恶势力图财害命的剧本。这个剧一问世就显示出她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才华。她自编自演的这个戏在留日学生赈灾义演时获得成功。

1926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感召下，白薇毅然放弃还有两年读官费研究生的机会，回到祖国投身革命，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当译员，仅仅半年时间，国共合作破裂，革命走向低潮。她愤然辞职去了上海，在中国公学任教授。后因患喉病不能继续任教，又开始了穷愁潦倒的生活，晚上睡在一个文学会堂的地板上，有时几天吃不上一点东西，冬天没有棉裤，就在单裤里面缝上一层层五颜六色的破布御寒。她不畏饥寒，坚持用笔对革命叛徒进行挞伐，三幕剧《打出幽灵塔》、独幕剧《革命神受难》、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都是这个时期写就的，先后发表在鲁迅先生主编的《奔流》、《语丝》、《北斗》杂志上。这些作品主题鲜明，颂扬在封建桎梏下受难的妇女的反抗精神。王瑶教授在《中国文史稿》中说，《打出幽灵塔》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一样，正是一种叫醒那些沉睡在家庭中作傀儡的不幸妇女的声音。独幕剧《革命

神受难》寓意深刻，无情地挞伐了反革命势力。这个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对发表这个剧本的《语丝》杂志提出了警告。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白薇时，曾风趣地说：“你在白区写的作品像炸弹，炸得反动派惊恐不安，蒋介石可恨你白薇喽！”

白薇的作品，始终是为被压迫阶级说话，始终是把同情人民的疾苦、妇女的疾苦放在首位。她写的被压迫者抗争的剧本和小说十分深刻，受到社会的欢迎，她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受到鲁迅先生的器重。

白薇是“左联”和“剧联”的早期成员，一直得到鲁迅先生和“创造社”成员的影响和关怀。1930年，国民党实行高压政策，明令取缔“左联”，通缉“左联”成员，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白薇勇敢地 and 冯雪峰、阳翰笙等十几位作家一起坚持在文化阵地上。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三省，白薇目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白薇义愤填膺，愤然离开病榻，一连写出剧本《北宁路某站》、《敌同志》，小说《受难的女人们》，诗歌《火信》等一批抗日作品，成为最早写抗日作品的作家之一。她不顾孱弱的身体，在坚持创作的同时还不断地深入到学校、工厂，帮助学生和工人排演抗日戏剧。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高潮中，她表现出非凡的斗志，在当地工人、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白薇以笔为刀枪，日夜奋战，而她的健康却每况愈下，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董竹君、郁风、沈兹九等19位妇女界知名人士联合登报为她募捐治病，而她则在报上发表声明婉谢援助，但已阻止不了一批批的工人、学生到医院看望她，并送上自己省下的早点钱助她治病。最让她感动的是一群女警察化装成学生，手捧鲜花前来慰问，她们握着白薇的手，述说她们的仰慕之情。

白薇的出名，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北平的汉奸报纸不断登载她的消息。她旧日的一位女友，以月薪360块大洋的高报酬请她给日本人当翻译，遭到白薇的严词拒绝，她宁愿冻饿而死，绝不当汉奸。

到延安去，是白薇多年的夙愿。1938年初夏，她终于得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应允，做好了去延安的准备。一个细雨迷蒙的早晨，白薇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等待起程，恰在这时，周恩来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但他不是来送行，而是劝阻她：“你有病，不要去延安了。”白薇感到突然，辨白说：“我没病，我能去。”周恩来指着栗明瑜大夫说：“你有病，还能瞒过大夫，大夫说你周身呈现许多紫色斑块，这是微细血管破裂所致。去延安路程远，要乘汽车，经过长时间颠簸震动，有可能导致你全身微细血管破裂，不能冒这个险。”周恩来接着告诉她：“我们已决定派你去广西，作《新华日报》的特派记者。”听到这里，

她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她太感谢周先生给予她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了。尽管她去延安的心愿未了，但她敬服面前这位杰出的共产党人，愿意听从他的安排。

白薇到桂林的第一件事，是把周恩来、叶剑英共同签署派她为《新华日报》特派记者的公函交广西省主席。从这位省主席冰冷的面孔上，白薇预感到有许多的麻烦在等待着她。果不其然，她废寝忘食为《新华日报》采写的一篇又一篇通讯稿投寄后，竟无一例外地杳无音讯。为了证实她的怀疑，她把刚脱稿的一篇通讯托友人带到重庆，不久《新华日报》便在头版上登出了。事情很清楚，她的稿件统统被邮局检扣了。桂系反动派玩了小动作还不够，随之而来的是在当地报纸上公开发难，对她在《新华日报》上发的通讯大加挞伐，耸人听闻地扣她“叛国”的帽子。进而采取更为卑劣的手段，在白薇住所周围布下便衣特务，日夜监视她的行动。一天早晨，由特务带领一帮警察闯进白薇住室，宣称她是日本间谍，给她戴上手铐，推推搡搡带往警察局，警察局长请示他的上司后，神情颓丧，语无伦次地说：“唉，误会，误会。”白薇发出藐视的笑声说：“骗鬼去吧，你们破坏团结抗日是真真切切的，还说什么误会？”警察局长点头哈腰，喝斥他的喽罗“还不快点卸下手铐！”铁骨铮铮的白薇，绝不屈服于反动派。

白薇是在重庆迎来抗战胜利的。在欢庆声中得知毛泽东要到重庆来谈判，她万分欣喜。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招待妇女界代表的那天，白薇应邀到会，她想直接走到毛主席身边去，可是女同胞们里外三层地把毛泽东包围了。到散会时，听得毛泽东大声发问“白薇可来了？”白薇走了过去，毛泽东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此时，白薇一直渴望见到的这位伟人就在眼前，多少心里话要说，却什么也说不出，好不容易说了一句：“毛主席，我是落伍者！”毛泽东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大声说：“不，你没落伍。”毛泽东的话像一股温暖的热流，融暖了她的全身，久积心头的冰霜化解了，坚强自信的白薇更加斗志昂扬了。

1947年冬，白薇回湖南资兴老家为父亲料理丧事。不久她和当地的湘南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尽管她出过国，留过学，当过教授又是著名作家，但和这些乡下人组成的游击队一接触，便有旧友重逢的感觉，当然她就正式成为游击队的一员，在总部担任宣传股长。在那段时间里，白薇没日没夜地为游击队起草《湘南游击队宣言》，《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告三湘父老兄弟书》，赶写策反、瓦解敌军的宣传材料。她和游击队共同战斗，一连解放了几座县城，1949年秋天和第四野战军会师。这期间她还利用战斗空隙创作了一些思想性很强的诗歌。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派人把白薇接到北京，出任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主席多次用车接她到中南海，亲切地称她是“我们湘南游击队的女英雄”。邓颖超、周扬、阳翰笙都很关心她的身体，安排她在北京颐养天年，可她总想为新中国的建设讴歌，坚持要去北大荒投入生产建设第一线，体验工农生活，她说：“纵然我浑身是病，我也要去北大荒，冻成冰棍也罢，埋在雪里也罢，被狼吃了也罢，我都无怨无悔。”

白薇终于去了北大荒。当时北大荒是一片荒凉的土地，气温零下四十几度滴水成冰，生活艰苦至极，可白薇不怕艰苦，她深入到一个又一个农场，和青年男女工人一同战天斗地，一同播种收割。她爱北大荒的地，她爱北大荒的人，她在北大荒呆了整整7年，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写了不少赞美北大荒的诗篇。她虽然年近古稀，身体多病，周恩来总理几次催她回京，她却从北大荒又转移到新疆，她说她要把新疆大草原看个够。她骑在马上，诗兴昂扬，在《路过大草原》诗中唱道：

我，来自大度巅下的莺，
看到这辽阔的美景，
激发快乐的心情。
兴致勃勃，
只想尽情放歌……

这是白薇对祖国的热爱，这是白薇对祖国的深情，人们将永远铭记这位不屈的女作家——白薇。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台静农与启功的 笔墨情缘

● 罗会祥

香港《名家翰墨》月刊推出《台静农·启功专号》，在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书法界引起极大反响。台静农被日本书道学会誉为台湾“最著名的书法家”，与于右任齐名。启功先生在中外书法界的知名度也是如雷灌耳。香港翰墨轩主人许礼平先生独具慧眼，为这两位书法大师合出专号，堪称两岸书法艺术交流的一件盛事。

书法界人士普遍认为，《台静农·启功专号》是大陆与台湾书艺最高水准的首次“交流”。其实，台静农与启功的书艺交流，早在

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

30年代初，21岁的启功初出茅庐，到北平辅仁大学附中教初中一年级的国文。此时，台静农已是辅大的副教授兼陈垣校长的秘书，他比启功大10岁，是启功到辅仁以后结识的大朋友。台静农由于参加创办“未名社”出了违禁的书刊，加之和鲁迅先生交往密切，曾三次陷于牢狱之灾。启功在辅仁与台静农相处期间，正是台静农在政治上遭受重创的多事之秋。在启功的眼里，身处逆境的台静农非常之超脱，平时谈笑如常，对他这

个小弟弟既关怀，又鼓励。

辅仁大学设有美术系，陈垣校长不拘一格用人才，他聘请清朝皇族子孙溥雪斋任系主任。溥雪斋是一位全能的画家，山水、人物、花卉乃至画马，无所不精，在北平画苑享有盛名。其实，他并没有进过洋学堂，更不曾教过书，他接受聘请以后，第一次到辅仁来看看是个什么光景，由校长秘书台静农作陪。溥雪斋走到教室外面的廊下，看见屋子里坐着许多人，都在屏声静气地听讲台上的一个人站在那里讲话，非常好奇地问，“这是干吗的？”台静农简言相告，为雪斋“启蒙”，雪斋未上任，倒先给自己补了一课。

启功是雍正五子弘昼之后，其曾祖爱新觉罗·溥良当过礼部尚书，他与雪斋同宗。启功酷爱书法，当时正师从雪斋临摹赵子昂（松雪）。台静农那时已是颇有影响的青年小说家，他对书画艺术特别的嗜好，在书画鉴赏方面有着相当深的功底，平时喜爱收藏字画。所以，他和启功于教学之外，又多了一种共同语言。闲暇之时，他们常在一起谈诗论文，切磋书艺。台静农话语平易，但轻松的评论中常常蕴含着“深意的指教”，启功初听总觉得不很理解，待日后细加品



台静农在书房挥毫

味,才豁然开朗:台静农关于一首诗或一件书画的见解,完全是有意为他而发的“耳提面命”。在与台静农的交往中,启功深切地感到,投师不如访友,他把台静农视为平生交游中并不多见的师友。

当时,北平画苑还有一个皇室画家,比溥雪斋的名气还大,他就是溥儒(字心畲),别号西山逸士。溥心畲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奕訢之孙,他与溥雪斋是同祖兄弟。溥心畲早在三四十年代就享有“南张(大千)北溥(儒)”的盛誉,诗文书画无一不通。他的画在琉璃厂挂价高,一些小画店也有他的画,都是他家的佣人拿出来的,售价要便宜得多。台静农曾在一家小画店买过两张溥心畲的画,后来又在同一家画店买到他的一幅元人笔意的山水小品。经辅大专门讲授“书画题跋”的前清翰林袁玉生鉴定,台静农买的几幅画,确为溥心畲的真迹。

启功见台静农如此仰慕溥心畲,就自报奋勇,带他到恭王府去登门拜访。台静农自然感激启功的一片盛情,去的时候,他还特意邀上几位崇拜溥心畲的朋友,一道前往。恭王府庭院深深,气派宏大,海棠花开得灿然生辉,这里的海棠在全北平都是出了名的,溥心畲就在花前摆出清茶,热情相待,相谈甚欢。后来,溥心畲也去了台湾,与在台湾大学执教的台静农重叙旧情,彼此交往甚为密切。

1935年8月,台静农第三次被捕出狱以后,在北平呆不下去了,经胡适的介绍,他被私立厦门大学聘为教授。出发之前,朋友们为他饯行,启功见他大碗喝着绍兴黄酒,盛赞他在北大的教师沈尹默的书艺,毫无沮丧之情,惜别之心稍稍得到一些宽慰。赴厦大不久,台静农回北平接家眷,启功闻讯去看他,已是下午,台静农还

在喝酒。启功问他,怎么这个时候喝酒,他说“麻醉”。直到许多年以后,启功才理解了台静农那个时候的心境。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有见面。

台静农于1946年秋由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应聘去了台湾大学,海峡之隔,天各一方,相别半个世纪,台静农与启功互不通音讯。若干年来,启功一直思念着远隔天涯的老朋友台静农,渴望着能有聚首之日,然而,天苍苍,海茫茫,北京与台北的民间交往虽已解冻,但他与台静农仍无缘再相逢。

1985的春天,一位友人给启功先生带来一本《静农书艺集》,启功先生如获至宝,“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对他来说,这不是一般的书法集,而是老友台静农与他相别50年的半生写照。这本《静农书艺集》,是台静农在台湾大学的女弟子林文月与她的夫君郭豫伦合编的,由台北华正书局印行。当时,两岸的文化交流渠道不畅,内地读者能看到台湾版《静农书艺集》的人极少。《静农书艺集》给启功先生带来了莫大的欣慰,见其字如见其人,老友的精神面目跃然纸上。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一任主席,启功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他怀着兴奋的心情,撰写了《读〈静农书艺集〉》一文,交由北京的《读书》杂志发表。接着,他又挑选了台静农的5幅行草篆精品,推荐给中国书协主办的《中国书法》杂志。该刊辟出专栏,发表了台静农的书法作品,还把启功的《读〈静农书艺集〉》和台静农的《我与书艺》两文附在后面。这是内地最早对台静农书法艺术所作的比较概括的介绍。

198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台静农书法选》,也是由启功先生题签并作序。

启功先生对台静农的书法极为推崇,他在《读〈静农书艺集〉》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台静农的书。他认为,台静农是“一位完美的艺术家”,在他看来,台先生“隶书的开扩,草书的顿挫,如果没有充沛的气力是无法写出的”。他甚至不明白,“谁知从来没有疾言厉色的台先生,而有这等虎虎生气的字迹。”因而他认定:“猛志固常在,又岂止陶渊明呢?”自抗战期间避乱于四川之时,台静农便开始临写明末书法家倪元璐(鸿宝)的真迹,他写倪字写了大半生,深得倪字神韵。张大千曾说,“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而已。”香港大学教授牟润孙与台静农和启功都是北平辅仁大学时期的老友,他说,纵使与台静农不相识的人,也能从他书艺的气韵看出,“他的为人、风骨、品格有异于一般庸俗媚世之人”,“他的书艺充满超逸之气,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意味,不可以常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去揣度。”启功也看出了台静农书艺的内蕴,称他的行书“下笔如刀切玉”,“一行之内,几行之间,信手而往,浩浩落落。到了酣适之处,真不知是倪是台,这种意境和乐趣,恐怕倪氏也不见得尝到的。”他还特意点明,与其说台静农是写倪字,不如说是写倪的感情,“一点一划,实际都是表达情感的艺术语言”。由于敬重台静农的书艺,启功先生谦虚地说,“如果见到他,绝不把我的字拿给他看!”

为了表达对老友的相思,启功托友人把他已出版的诗作送给台静农,以作纪念。台静农不仅认真地读完了启功先生的诗,还托友人把他的“读后感”捎给启功,说“他(指启功)还是那么淘气。”诗言志,言为心声,启功的诗不仅写出了他的真性情,而且写出了鲜明的个性,不然,台静农不会从古稀之

年的老启功的诗作中，一眼就看出了 50 多年前那个小启功的影子。

这次，台静农还送给启功一幅手卷，是临苏东坡的二首苏州寒食诗，卷末有一跋云，苏字真迹已为台北故宫重金收藏，故临此卷以相赠。启功得此卷喜不自胜，直叹“这是苏东坡，还是台龙坡（台静农在台北居龙坡里台大宿舍，斋名为‘龙坡丈室’，且有‘龙坡小民’这笔名。——笔者注）”故精裱以备珍藏，且乐得以为仿佛“比故宫还富了许多”。

1990 年，春节刚过，台静农因饮食吞咽困难，被儿女送进医院检查，结果确诊为食道癌，不得不住院治疗。晚年的台静农时时渴望渡海北返，但面对从大陆赴台探望他的亲人，他发出沉重的叹息“我不行了，走不动了。”他在为他的学生洪素丽散文集《浮草》所作的序言中，写下过这样深情的句子：“无根的异乡人，都忘不了自家的泥土……中国人有句老话‘叶落归根’，今世的落叶，只有随风飘到哪里便是哪里了。”卧病以后，台静农思念故土之心更切，越加怀念大陆的亲友。他托友人把自己的三本书法集和论文集带给启功，在每本的扉页上都亲笔题下“永念”两字。启功从台静农那略显颤抖的字迹看出，老友的气力已明显地衰弱了，他拿到这三本书，仿佛捧着三块石头，心情沉重不堪，他深为老友的健康担忧。

不久，启功先生出访香港，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他仍然惦念着隔海相望却不能往来的台静农。他在好友家中，给台静农挂了一个越海电话，台静农正躺在病榻上，通话以后，两个分别半个多世纪的老友百感交集，即使只是几句简单的问候，也足以慰藉几十年的相思相忆之心。启功从电

话中听出台静农的气力尚很充沛，一直悬在心头的那“三块石头”，才算暂时放了下来。

台静农在病中作有一绝，诗云：“老去空余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此等渡海无望、思乡之心难泯的怅惘，启功先生是非常理解的，因此，他“衷心祝愿龙坡翁疾病速愈，福寿绵长”，以便有朝一日相会于北京或台北。孰料，启功先生发出这一祝福还不到一个月，台静农先生便在台大医院溘然长眠，享年 89 岁。本文开头提到的香港《名家翰墨〈台静农·启功专号〉》，本来是为了纪念台静农的 90 寿诞，想不到，刊出之日，台静农已骑鹤西去，他的老友们为此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启功先生捧读这期《专号》，自然难以排遣弥漫在心头的伤感。

台静农去世以后，他的次子台益公携夫人由台北专程赴北京拜望启功先生，带来一巨束台静农的遗墨，均乃台先生的梅竹花卉，其中，大都是未落款也没钤印的遣兴之作。启功先生赏罢台静农的遗墨，感叹不已，他认为，这些“如金的墨戏”，可“为文苑生辉、艺林增宝”。因而，他建议台益公夫妇，将其先父的遗墨影印，“以广流传”。

台益公遵从启功先生的嘱托，回台以后，即动手整理父亲的遗墨，并请启功先生作序，以《台静农墨戏集》为名，由台湾鸿展艺术中心出版。启功先生在序言中，从文学、史学、书法、绘画诸方面，对台静农先生毕生的成就给予了全面而高度的评价。

台静农与启功都是书法大家，为两岸书法界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墨宝为世人所珍藏，他们的友情也将为后人所传颂。

（责任编辑 舒元璋）



龙骨坡“母女”出山记

● 徐自强

文中所说的“母、女”，不是现在生活于龙骨坡地区的人，而是从200万年前龙骨坡遗址中出土的两件化石，一为老年个体，一为少年个体，故称“母、女”。

龙骨坡遗址，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骨苞西坡。此坡原无名称，是当地农民开垦的庄稼地。1985年，在该处发现人类化石以后，发现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史前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黄万波教授，将其地命名为“龙骨坡”；化石出土地点称为“龙骨坡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定名为“巫山人”。

(一)

我国老一辈的古人类学和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曾多次指出：根据中国的地质地理条件、生态环境、埋藏的人类化石将是很多的，尤其是青藏高原东部、长江中上游地区，很可能是亚洲和我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为此，裴文中教授于1981年的“五一”节，书写了“中国可以成为世界上古人类学的中心”的题词。这既是老一辈科学家的预见，也是对我们后一代工作者的希望与鞭策。

20世纪以来，我国大量出土的人类、巨猿化石、石器、骨角器和动物化石等遗物，也充分说明了他们的分析与判断是正确的。尤其是60年代以来，在云南出土的大量古猿化石材料，更出现了使这一预见变为现实的曙光。

在这些思想和现实材料的启迪下，1984年，由研究人员黄万波、钟志楷（重庆自然博物馆）、廖渝方（万县地区博物馆）等组成一支三峡考察队，根据当时四川省长江三峡地区新生代地层古生物考察计划，首先考察了万县盐井沟古生物化石出土地点，然后沿江而下直抵巫山县城。他们在该县文化局吴树业局长的指引下，去到庙宇镇龙坪村“龙洞”进行考察。考察结果：虽

发现了一些脊椎动物化石，但时代较晚，不是考察的主要对象。他们正在商议计划调查新的地点时，龙坪村中医牟之富提供了重要线索。他说：60年代后期，龙坪村民在龙骨坡挖掘出土了大量“龙骨”（实为古代哺乳动物化石），被当成中药卖给了药店。那里离龙洞不远，可去看看。

考察队听了高兴之至，当即移师龙骨坡，经过考察，果然大有收获。他们在废弃的石灰岩角砾和棕黄色粘土里，发现了近十种哺乳动物化石。其中保存较好的有：小猪獾、小种大熊猫、桑氏粗状斑鬣狗、云南马、山原獭等。鉴于这些材料与广西柳城巨猿洞动物群的同类标本十分相近，故考察队决定在该地作正式发掘。

1985年秋，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巫山县文管所组成的联合发掘队，在研究员黄万波、方其仁的率领下，在龙骨坡开始了系统、正规的考古发掘。首先，他们考察了龙骨坡地区现在的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现在的龙骨坡地区，位于重庆市巫山县长江南岸庙宇镇，东与秀峰、官渡，南与湖北建始，西与奉节等镇、县相接，为一个长方形的山间小盆地，面积约8平方公里。庙宇河斜贯其间，至西北隅核桃树，从泄水洞汇入长江南岸支流——大溪河。庙宇盆地海拔高750—800米，无霜期250天，气温平均14℃，年降水量1065毫米，土质为红色酸性土，植物为华南落叶阔叶林区。

龙骨坡遗址的位置是东经109°4′50″、北纬30°21′25″，海拔高830米，是一个垂直型溶洞，底部与地下暗河相通，无完整的洞顶，有岩厦式的洞壁。他们的发掘点最先就选在岩厦式洞壁的南侧，自东而西掘开两个工作面，即两个平台。一平台约15平方米，二平台约10平方米，两台高差为1—2.5米。两平台堆积物均为棕红色粘土，其中偶见砾石和石灰岩角砾。两平台衔接处，露出一块胶结坚实的“钙板”，厚30—70厘米。粘土和“钙板”中，都含有哺乳动物化石。

同年10月13日下午1点30分,在第二平台“钙板”下方粉砂质粘土凸镜体中,发现一段人的左侧下颌骨,带P4—M1(即第四前臼齿和第一臼齿)。与其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竹鼠、豪猪、步氏巨猿、豺(未定种)、小种大熊猫、更新大灵猫(新种)、桑氏粗状斑鬣狗、更新世猎豹、似巴氏似剑齿虎、杨子江中国乳齿象、云南马(近亲种)、爪兽(未定种)、山原猿(新种)、河猪(未定种)、小猪、祖鹿、湖鹿、野牛(未定种)等。其后,在含人化石的同一地层中又出土了2颗巨猿牙齿。

1986年秋,在南侧继续工作,在原第二平台上方,再揭开一个工作面,面积约30平方米。同年10月24日,青年民工龙文才在第三平台下部的粘土中找到了一枚人的上恒门齿,在平台中部“钙板”中发现一枚巨猿牙齿。次日,于同一地点又出土巨猿牙一枚。与其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十余种,同时还出土有人工痕迹的石片。同年,在龙骨坡遗址北侧,还开了新的工作面,由上而下,由东而西,循序工作。结果,在石灰岩壁的粘土中又发现2颗巨猿牙。

1987年秋,继续发掘。

1988年秋,又出土巨猿牙4枚、猴科牙2枚,哺乳动物化石40余种,其中小哺乳动物20余种,石器2件。

巫山龙骨坡遗址的发掘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停顿后,1997年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第二发掘阶段),在巫山县人民政府的资助与支持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黄万波、徐自强、长绍武、税明轩组成的发掘队,在黄万波率领下,重新开进了龙骨坡遗址,开始了第二发掘阶段第一次的考古发掘工作。

这次发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寻找人类化石、石器以及新的化石地点。工作方法,完全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地点,在南侧的第5—7层。经过32天的工作,在挖出的近30立方米的堆积层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和几十种化石,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意义十分重大。

(二)

现在,经过对以前工作出土的所有化石、石器等材料的整理分析,对巫山人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对龙骨坡遗址中发现的老妇和少女,可以进行某些概念的记述和论证了。

首先,龙骨坡遗址中的巫山人化石有两件。一件为左侧残破下颌骨,带第四前臼齿(P4)和第一臼齿(M1),出土于第8层。一为上内侧门齿,出土于第7层。根据对这两件人化石特点的分析,和与比他们早的古猿、和与比他们晚的直立人的比较,可以得出下面的看法:两件巫山人化石为同一种人,和东非早新世人处于同一水平上,故研究者将原定的直立人(*Homo erectus*)修订



黄万波教授向萧克同志汇报巫山龙骨坡发掘情况

为能人(*Homo habilis*),简称巫山人(Wushan Man)。

(三)

生活在这个洞穴中的,由龙骨坡母、女等组成的巫山人,由于是从刚学会直立行走的古猿中脱离出来的,故其智慧有限,只能制做原始粗糙的石器。现在,从其生活的文化层中,已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在第一发掘阶段和第二发掘阶段中,初步整理出的标本已达二十余件。这些石制品经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有关专家、学者审视,最后经中科院贾兰坡院士鉴定,均认为其中不少是有古人加工痕迹的石制品,从而再次肯定了龙骨坡遗址有了早期人类的足迹。这些石器虽然简单、粗糙、原始,但它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文化遗存,故黄万波教授据其综合特点,将其命名为混沌初开的第一个文化——“龙骨坡文化”。同时,龙骨坡的巫山人,还会加工一些最简单的骨料当工具使用。

(四)

与龙骨坡巫山人共同生活的,还有一批一批的动物群化石,经过初步整理、修复、鉴定,共有120种动物。其中爬行类动物1种、鸟类2种、哺乳动物116种(包括25个新种),分属8目29科74属(包括3个新属)。其中最多的动物种属为草食性动物,约占总数的1/2以上。这说明,在早更新世早期(距今200万年左右),草食性动物在这个地区是处于优势的物种。

在这些动物群中,特别是“巫山剑齿象”、“山原猿”等物种的出土和与龙骨坡巫山人的共生状况,说明当时在动物和人类深化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时

代特征明显。

(五)

龙骨坡“母、女”出山以后，他们生活的地点、使用的工具、共同生活的动物群，已如上述，那么他们生活的时期，对我们当今来说，又相距多久呢？

对于龙骨坡母、女生存的年代，是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的。首先，在发掘工作的过程中，就注意搞清各种化石、石制品的相对关系，认准出土地层的先后次序；然后，根据各层出土的化石，尤其是动物化石的特征与国际上肯定了年代的同类动物，例如欧洲维拉方期动物群相比较，两者同为 MN17，即距今 200 万年左右。

其次，经过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对遗址地层进行古地磁法测年，其结果是：龙骨坡含母、女属位的年龄距今 201~204 万年。再请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进行氨基酸年代测定结果：为早新世早期。又经北京大学考古系用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结果：龙骨坡遗址的第2——第5水平层为 130~190 万年。5 层以下各层，只能比这更早。

90 年代初期，再经美国、加拿大有关学者，对在考察中自采标本的测定结果，1993 年底宣布为：龙骨坡遗址第5层年代，大于 100 万年，依此类推，巫山人化石——龙骨坡母、女出自第8层，年代会更早。

研究者的最后意见是：龙骨坡母、女生活的洞穴遗物的年龄可分为三个时代，母、女生活时期为 200 万年左右；其上层比他晚者为 180——167 万年；下层比他早者为 248 万年。

(六)

通过上述年代的测定，我们还可以对龙骨坡母、女生存期有关当地的生态环境，概括地描述如下：

由于庙宇镇龙骨坡地区，北与华北区（古北界）、南与华南区、西与西南区相邻，因此，其动物区系的构成，具有三个过渡区的特点，尤其更倾向西南和华南两区特点。具体说：

1. 巫山人——龙骨坡母、女生活时期，长江三峡一带的气候，远较目前湿热，森林更加茂盛；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温带动物的南迁以及西部高山和亚高山地区灌丛草原动物的东移，又反映其间还有相对干冷的时段，有一定范围的灌丛草地存在。

2 地形是影响气候的一个重要因素。自新第三纪晚期以来，青藏高原的隆起改变了亚洲大陆的大气环流状况，从而导致了东亚季风气候的逐渐形成。上新世以来，云贵高原的迅速升高，阻滞了强大的西南季风向东北方向推进的势头，从而导致一些属于印度——马来动物群的成员，逐渐从中国华中地区向西南方向隐退。受其影响，秦岭以南的山川平坝由湿热向温暖略干

的亚热带疏林转化。这样多变的生态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制约着生物界的演化和发展。自然条件的改变，对形成中的人类来说，他们也不得不改变运动方式、活动半径、以及自身的体质结构。云南、川东、鄂西、陕南、渝东北等地，多次发现古猿及直立人化石，就是这种由平衡生态向不平衡生态发展的佐证。

巫山人生活的第四纪时期，云贵高原还未最后形成，因此，目前生活于热带和南亚热带的动物能够分布到目前属于北亚热带的长江三峡地区。另一方面，当时的秦岭——大巴山也未达到目前的高度，恒亘于祖家西南的巫山、荆山一带的地势起伏不大，因而当西北季风强盛的年代，能够影响到巫山地区，从而导致温带草原动物的南迁。巫山人生活的时期，其地理概貌十分类似于现代淮河流域的动物区系——过渡区的面貌，地势较低，便于南北动物的游动。

3 目前的长江对于动物的迁徙，显然是一天然屏障，特别是华北草原性动物，要达到长江南岸是十分困难的。巫山人生活时期，相当数量的温带动物的存在表明，当时的长江还未形成，所以，对动物的迁徙没有障碍。

4 巫山人——龙骨坡母、女生活时期，绝对年代为距今 200 万年左右。当时的沉积物河相为主，也是一个多雨时期。但从哺乳动物化石分析，其中又明显存在一个相对干冷的时段。这还可以从前述有相当数量华北动物的侵入中得到证明。特别是草原动物的存在，可以证明当时有一定范围的草原。

此外，再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古植物研究室进行孢粉分析结果认为：龙骨坡剖面从晚上新世到早更新世，经历了暖湿——冷干，再暖湿——再冷干的两个变化旋回。暖湿期植被可能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而冷干植被可能为稀疏的针阔混交林。化石点出土的人类、巨猿和其它哺乳动物化石，主要生存于早更新世的第一个温暖、潮湿的时期。

根据对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尤其是其中之云南、渝东北、鄂西等地，或者说长江中上游地带的地质地理条件、地貌特征的分析材料，将其与东非裂谷地带，即出土直立行走的古猿和古人类地区比较的结果，有很多相似点，而出土的有关材料线索，也说明这种分析、比较和判断是有一定根据的。

因此，我们相信：只要加倍努力，不断工作，持之以恒，在这块神州大地上找出更早的古人类和可以直立行走的古猿（化石）是大有希望的！我们一定会在亚洲、世界人类起源的研究中，作出我们的贡献。

（作者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史前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考古学教授）

（责任编辑 洛松）

古人拒贿诗四首

● 陆茂清

贿赂者，私赠财帛以行请托也。它污染风气，败坏吏治，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格格不入，历来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古往今来，不少重品节、轻钱财的士大夫挥毫作诗，以明不受贿、不行贿的高洁心志。

不受外国馈赠

明朝建立以后，与交南（今越南）友好往来，并常有使者互访。一年金秋，明太祖派翰林院侍讲刘璟出使交南。

刘璟访问结束辞归时，交南国王赠给珍珠、犀角、象牙等稀世宝物，意在使刘璟在明太祖面前多多美言，以不受大明这个天朝大国的侵扰，保边境安宁。刘璟一物不受，辞谢道：“奉命出使，唯在为两国交好，馈赠之物不敢妄取。”

刘璟走后，国王长吁短叹：“我一国安宁，只在刘公口中，他空手而归，恐有不利我国言论，如何是好？”有一大臣献计一条，国王连称“此计甚好。”

再说刘璟将到边关时，两个交南大臣拦住马头，捧上礼盒说：“国王有令在先，如不能使刘公受此薄礼，我俩将受严惩，求刘公垂怜。”说着跪倒在地，不肯起来。随从在旁劝说道：“大人就拣一物受之，以免两位受罚。”刘璟摇头不迭：“受礼纳贿，有丧人格，受外国馈赠，更有丧大明国格。”他想了一阵，在礼盒上写了《初入关》诗一首，付与交南大臣：“回去将此诗呈献国王，必不致降罪于两位。”诗云：

咫尺天威誓肃将，
寸心端不愧苍苍。

归装若有交南物，
一任关神降百殃。

两袖清风

近代民族英雄于谦为官一生，清廉不贪，寸礼不纳，不仅不受，而且不送，真正做到“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任山西、河南巡抚时，正值宦官王振专擅朝柄，气焰日炽，不少投机钻营之徒奔走门下。一次，于谦奉召入京议事，启程前夕，友人前来话别，劝他带些金银财宝送给王振，以图日后有个照应。于谦只是摇头：“此非正人君子所为，不敢苟从。”友人复又劝道：“值钱的东西不送，送些绢帕，麻菇，线香之类的土产也好，多少能联络感情。”

于谦淡淡一笑，站起身来将两袖一甩：“此次入京，如同既往，一物不带不送。”言毕，曼声长吟《入京》七绝一首：

绢帕麻菇与线香，
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
免得闾阎话短长。

自后，“两袖清风”成了官吏清正廉洁的典故。

“金绳铁矩”

清朝康熙年间，有“天下第一清官”之称的张伯行，以政绩斐然升任福建巡抚，总揽一省军政大权，可谓位高而权重。

到任伊始，门生故吏，亲宾姻客多有携礼来拜者，名曰庆贺，自然也都各有巴望依靠。张伯行不改常规，或婉言辞谢，或直言回绝。为了杜绝纷至沓来的送礼人，他效法先贤司马光的《客位榜》，拟就了《禁止馈送檄》一纸，张贴在府门旁：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膏脂。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送礼者满怀希望而来，看了此文，或有所感动，或不敢自讨没趣，咸携礼而归。《禁止馈送檄》不胫而走，老少争诵，被赞誉为不贪不受的“金绳铁矩”。

考官夜拒赠金

自隋一代开科取士后，科举考试成了读书人跻身仕途的必由之路，因考试事关终身荣华富贵，故而舞弊成风，不肖之徒往往向考官贿以黄金白银，以求金榜题名。

明朝时，李汰受命主持福建乡试，选拔举人。考试前一天深夜，有考生贾秀才求见。贾秀才进门后，见室内别无他人，便从怀内取出黄金一锭，开门见山道：“学生自付翰墨欠精，疏漏必多，求大人多加照应，得中之后，再有厚报。”

李汰听了，也不答话，从笔架上取过狼毫，展纸挥写。

义利原头识颇真，
黄金难换高儒贫。
莫言暮夜无知者，
怕塞乾坤有鬼神。

贾秀才也算是个识相的，斜眼偷看了李汰的诗，又羞又怕，慌忙收起金锭溜之大吉。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关于《重读 1940 年延安一次大会的名誉主席团名单》的两封信

(一)

收到《炎黄春秋》6月号,首先拜读了于光远同志的《重读 1940 年延安一次大会的名誉主席团名单》。名单中的个别人,正好我有些印象,试作补正求教。

其一、关于张一麐。张一麐,字仲仁,江苏吴县人,1867年生,1943年去世。1915至1916年间曾任段祺瑞内阁的教育总长约半年,是当时鲁迅的顶头上司。1917至1918年曾任冯国璋任内的总统府秘书长。抗战开始后,张在苏州曾和马相伯、李根源等老一辈人物倡议组织“老子军”,号召老年人都来支持抗战,在当年报章上传播一时。后遭到蒋介石的电阻而被迫中止。郭沫若于1937年7月下旬由日本回国,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9月郭去前线劳军,其间专程到苏州拜访了张一麐和李根源,盛赞“这张、李二老,在抗战坚决上,值得称为‘天下之大老’”。张有复蒋介石电,由郭取走,要拿到《救亡日报》发表,也许可以找到的吧。郭有《在轰炸中来去》一文,其中曾记此事。

其二、关于孙科。于文把孙和邵力子、于右任二位并列为“国民党元老”,似不妥。按:孙科生于1891年,比于右任小12岁,比邵力子小九岁;而且他是孙中山的儿子,1940年时还不到50岁,怕不好称为“国民党元老”的。但他是1935年成立的中苏文化协会的会长,当时的名誉会长有蔡元培、于右任

等。抗战时期中苏文协是重庆的三大左派组织之一。孙仍任会长,邵力子曾任副会长。但孙只是名义上的会长,最主要的实际负责人是国民党的左翼社会活动家张西曼,而其中许多主要干部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如屈武、王昆仑、王炳南、戈宝权等。中苏文协成为党在重庆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当时王昆仑就是分工负责帮助孙科的。这在阳翰笙、屈武的回忆文章里,有所记述。

王景山 1998 6 15

(二)

读了你刊今年第6期于光远同志的《重读 1940 年延安一次大会的名誉主席团名单》后,我想作点小补充。此文看似无所谓,但它反映了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广泛团结国内外各方面力量的思想,同时把中共的人物全部放在最后,也表示一种谦虚精神。当然,在国内方面,团结面似还不够广。不过,既是“名誉主席团”,在社会声望方面就不能不十分注意,当时要增加一批中间性的人物似也有困难。

文中提及我,是由于光远同志打电话来问我知不知道名誉主席团的张一麐、多罗利斯二人。特借贵刊一角简述如下:

一、张一麐。1936年11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七君子被捕关押狱中时,张一麐义务出面全力为他们辩护,也与宋庆龄等一同发起“爱国入狱”运动(表示愿与沈钧儒等七君子同“罪”),一时成为

苏州以至全国著名的抗日救亡领袖之一。

二、多罗利斯。我以为此人很可能就是当时西班牙共产党的著名领袖“桃乐丽丝·伊芭露丽”音译的前半。多罗利斯与桃乐丽丝显系同一词的音译。这位老女革命家是西共德高望重的领袖。在1936—1939两年多西班牙反抗德意法西斯及其在西班牙的代理人佛朗哥的战斗中,桃乐丽丝常到前线对反法西斯的政府军(包括由外国人组成的反法西斯“国际纵队”)作热情洋溢的宣传鼓动讲话,她满头银丝,十分美丽,被广泛地誉为西班牙的“热情之花”。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失败后,她长期旅居苏联,她的一个儿子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光荣牺牲了。

所以把这样一个老革命家列为“名誉主席团”成员之一,是很可能的。

三、潘汉年。将潘列入这张名单,看来是对潘在文化战线的历史功绩的充分承认,其实那时潘已改行快十年了,而且他本人也已去了港、沪。因为潘是20年代后期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是“左联”成立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又同时是其他一些左翼文化团体的重要领导人。从潘之列入这一名单,可见中央当时承认潘是党在文化战线出类拔萃的一个领导人。

曾彦修 1998 6 8

《谢王炎午生祭文》系后人假托文天祥之作

1998年第2期《炎黄春秋》发表林峰《王炎午撰文祭生者，文天祥答谢后人》，所抄录的所谓文天祥《谢王炎午生祭文》不是文天祥所作，而是后人假托文天祥名义写的“游戏文章”。理由是：

其一，自元明以来的多种版本的《文天祥全集》和别集，都未载过该文。王炎午的《生祭文丞相文》及他的另一篇《望祭文丞相文》都被列入过明《文山先生全集》（见其卷二十《附录》）。宋以后，尤其明代，多人到处搜集文天祥文稿，与文天祥有关的文稿也以文集《附录》形式刊入，以供人们研究文天祥之用，独不见《谢王炎午生祭文》。

其二，《谢王炎午生祭文》最早发表在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三月，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的《南国红豆楼戏墨》卷九《祭读》篇内。“戏墨”是当时一些文化人玩的文字游戏，常假借古代名人名义撰文，当然其中不乏得体的好文章。《谢王炎午生祭文》就其本身来说，从思想内容到文体词藻，可以说是篇好文章，确能体现文天祥民族英

雄形象。但这是另一回事，将文章列入文天祥原著之中就不行了。

其三，文天祥研究专家刘文源先生编著的《文天祥研究资料集》

（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广收文天祥佚文及与文天祥有关的诗文多篇，而不录《谢王炎午生祭文》。在他主编的《吉安历史名人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刊其本人撰写的《生祭文天祥的王炎午、王幼孙》一文中，断定《谢王炎午生祭文》是民国时期“好事者”的“游戏文章。”

耿艳鹏

关于“陈毅亡妻肖菊英之死”的作者答疑

转来的汪世扬同志对我写的《陈毅赋诗悼亡妻肖菊英》一文中有关肖菊英牺牲情节的质疑，收悉。现将有关情况简答如下。肖菊英烈士是我的亲表姐，她聪慧秀丽，生性好强，深得家人及其姑父即我的父亲的钟爱。有关肖菊英的生平轶事，我主要是根据母亲、舅母、表哥和钱益民（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菊英的同学和战友）等革命老同志提供的片断情况整理的。

肖菊英牺牲时的背景是：1931年7至9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与此同时，赣南苏区的红军队伍里，“左”倾路线盛行，“肃反”抓“AB团”不断扩大化。1926年年仅15岁参加革命的肖菊英，经历多年革命斗

争磨炼，她相信陈毅，始终坚定地与陈毅战斗在一起。不幸的是，第三次反“围剿”将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恰在一次陈毅外出开会未归，驻地遭到敌人突然袭击，她与战友们奋勇抵抗，寡不敌众，她身上多处负伤，毅然跳井殉节。不久，陈毅化装到信丰岳父母家报告菊英壮烈牺牲的噩耗。

过去曾有几书刊说到革命前辈的婚恋时，写了陈毅与肖菊英。对肖菊英牺牲的情节有多种说法，其中主要的一种，是根据对陈毅悼念亡妻肖菊英的诗词内容的领悟而发挥的，侧重刻画陈、肖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和肖菊英的才貌及柔弱多情。

陈干群 1998.6.29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出版发行

《炎黄春秋》创刊七年来在国内读者中享有较高声誉，在海外也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很多新订户要求购买前几年的刊物，但1995年以前的存刊除少数几期外，已全部售完。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编辑部组织力量，从1995年以前45期的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这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欲购此书的读者，可直接向我社发行部汇款邮购。各卷定价分别为：

《历史迷案揭秘》定价22.00元

《政坛高层动态》定价23.00元

《名流写真》定价23.50元

《血荐轩辕》定价23.80元

《重大决策幕后》定价23.80元

全套116.10元。另加书价的10%的挂号邮费。

本社地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101)64072452

联系人：谷世章

中华文化通志

这是一部对中华文化由古至今、分门别类进行全面系统概括的巨型著作。它阐明了中华文化的总体结构、历史沿革和重要特征；它描述了中国各地域、各民族古文化上的贡献及其融合互化的过程；它说明了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及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它根据志书体例，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进行设计，在充分研究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以简洁明了的文字，准确地说明历史事实；它是中国第一次运用竞争机制，采取招标方法，集中海内外专家学者合作的系统学术工程；它是中华文化研究标志性成果，是传世的佳作。

百卷本
四千余万字



谨以此书奉献给
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

《中华文化通志》十典主编的话

历代文化沿革典 李学勤教授:本典对中国文化悠久绵长的演进历史,从纵的剖面作综合论述。全典十志,对历史各个大的段落中文化的诸种领域,都有系统扼要的介绍、详细深入的分析;强调中国文化多民族、多区域的特点;剖析文化传统历经沧桑而终能绵延不绝、发扬光大的原因;说明中国文化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贡献。

地域文化典 宁可教授:汉族文化最早由黄河流域多种古代文化融汇而成,不同地域仍旧保留有各自的若干特色。此后,汉族文化扩展到更广泛的地域,并包容了当地的原有文化。北方民族不断地进入黄河流域乃至更南的地方,与汉族融合,也给汉族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因素、政治格局、经济发展往往有所差异,从而在具有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呈现了各自的特色。“地域文化典”选择十个在历史上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进行阐述。

民族文化典 王尧教授: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我国各民族是这一整体的有机部分。悠悠历史岁月,各族人民生活、劳动、栖息在亚洲东部这一块幅员广阔、资源丰富、山川壮美、气候适宜的大地之上,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唇齿相依、血肉相连,共同缔造了绚丽多彩、丰富瑰伟的中华文化。本典十志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中心,系统而概括地进行叙述、论证,反映我国民族文化的特色,同时雄辩地说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层面和背景。

制度文化典 刘泽华教授:制度是文化的凝结、社会的规范、组织人群的法条和惯例、人们的行为准则,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完善而细密,难以尽数。本典择其荦荦者,分为十志,曰:宗族志、土地赋役志、工商制度志、社会阶层等级制度志、中央职官志、地方行政制度志、选举志、社团志、法律志、兵制志。本典各志用文化制度化和制度文化化的视角,把握历史,还其原委,条贯古今,成一家之言。

教化与礼仪典 孙长江教授: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有其源远流长的传统。其中,一个十分古老而又具永恒生命力的内容,便是教化与礼仪。中国是教化之邦,又是礼仪之邦。这教化与礼仪,曾经是为二千年封建统治服务的精神绳索,同时又发挥了凝聚中华民族的作用。这便是人们常说的传统文化的封建性与人民性的矛盾。汲取其活在人民心的资源,包括为中国人民长期接受的教化与礼仪,这便是我们编纂《中华文化通志·教化与礼仪典》的初衷。



学术典 庞朴教授:学术是文化的灵魂,它给文化带来生命,学术是文化的花朵,它使文化灿烂芬芳。学术典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对中华文化的一个方面作了探讨。它包括:经学志、诸子学志、哲学志、史学志、语言文字学志、政治学志、经济学志、法学志、教育学志和军事学志,凡十卷,三百多万言。



科学技术典 陈美东教授:中国科学技术有漫长而灿烂的历史,它是在中国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人们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创造发明的独特的知识系统,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本典对中国科学技术作了系统性、综合性的概述和总结,既阐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讨论它与社会诸因素及其他文化形态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外科学技术的交流、融合与互动;又从历史的辉煌和近代的落后的强烈对比中,引发读者的深思。



文艺典 刘梦溪教授:此典由文艺理论志、诗词曲志、散文小说志、戏曲志、美术志、乐舞志、曲艺杂技志、新闻志、典籍志、景观志共十志组成,是中华文化积淀中最富绚丽色彩的部分。作者大都是本专业领域研究有素的专家,辩章学术,推竟源流,物则兼顾,宜有可观者。



宗教与民俗典 汤一介教授:本典所包含的佛教志、道教志、伊斯兰教志、基督教·犹太教志、民间宗教志、饮食文化志、服饰文化志、婚姻文化志、丧葬陵墓志、民间风俗志等各志,对历史上和现实在我国流行的各种宗教和民俗以丰富的材料为基础,并用生动而准确的文字写出来,对我们了解它们的历史和现状、它们的社会作用以及在文化上的意义,是非常必要的。读者在读了本书后,将会对我国的宗教与民俗有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了解。



中外文化交流典 姜义华教授:本典分别考察中国与周边地区及世界其他地区文化上的双向交流,并专门叙述了海外华人文化发展的情况以及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勇于并善于吸收和利用人类文化的各种优秀成果,推动自身的创造与发展。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演进中,也给予世界其他各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以广泛的影响,成为人类文明的瑰宝。



炎黄春秋



冯玉祥李德全夫妇与女儿女婿冯理达、罗元铮



季羨林教授在书房

台静农与启功的笔墨情缘

挣扎奋斗不肯倒下的白薇

龙胃坡“田女”出山记

翁文灏从秀才到博士

杨朔离去留冤魂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 元